

冬天小语

冬天潜藏着春天的信息、苦寒酿造出梅花的幽香，苏轼《梅花》诗云：“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

遍地的茅草、丛生的灌木、纵横的荆棘，蔓延在幽寂的山谷、陪衬出蜿蜒的清溪、纠缠着俏丽的梅花。梅花光亮，鲜明，清丽，灿然，欣然，傲然，在空谷里、在溪水边、在草棘间，幽独自处、把酒自慰、孤芳自赏，与潺潺的流水、簌簌的春风、断魂的诗人邂逅。

“借问落梅凡几曲，从风一夜满关山。”（高适《和王七玉门关吹笛》）关山梅花，落地有声，从遥远的唐朝触动诗人的神经在《正月二十日过关山》的春风岭。强劲的春风、淅沥的夜雨、飞落的梅花犹如《梅花落》笛声婉转、低徊、凄凉、忧伤的旋律。困顿的诗人匆匆着、踉跄着、执著着度越关山、超越自我、穿越时空。

苏轼

研究 SUSHIYANJIU

2010 年第 4 期（总第 23 期）



目 录

□特 稿

- “东坡文化国际论坛”黄冈宣言 /4
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刘善桥/5
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曾枣庄/6
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总结报告 涂普生/7
人间绝版苏东坡 刘雪荣/10

□苏学论坛

- “赤壁何须问出处”
——中日韩赤壁之游 曾枣庄/18
《雪堂记》与苏轼黄州“适意”的贬谪生活 杨胜宽/24
东坡符号 刘清泉/31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为“东坡”寻注求解 江澄格/36
黄州，东坡亭文化之奇葩 吴继路/42
由苏轼《琴诗》引发的美学论辩 涂 途/47

- 编辑出版：《苏轼研究》编辑部
□主办单位：中国苏轼研究学会
□协办单位：四川省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四川省眉山三苏祠博物馆
四川省三苏酒业有限责任公司
□主 编：张志烈
□执行主编：周成仕
□副 主 编：宋明刚 蔡心华
□编辑部主任：刘清泉
□编 辑：唐雅兰

地址：四川省眉山市三苏纪念馆三楼 308 室
邮编：620010 电话：(028) 38299092
网址：<http://www.3sw.com>
邮箱：sushiyanjiu@163.com
准印证：四川省连续性内部资料出版物
准印证第 03—006 号
设计：上观设计
印刷：四川省南方印务有限公司
出版日期：2010 年 12 月

（内部资料 免费交流）

□顾问：蒋仁富 李 静 苏 灿
(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马兴荣 孔凡礼 王水照
刘乃昌 朱靖华 刘尚荣
邱俊鹏 周先慎 曾枣庄

□编委：(以下按姓氏笔画排列)
王影聪 王希龙 王晋川
方永江 刘川眉 孙开中
张志烈 张忠全 杨胜宽
杨常沙 陈 弼 宋明刚
何家治 周成仕 周裕锴
涂普生 熊 英 蔡心华

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 彭 华/50
试论苏轼对于杜诗的艺术批评与接受 李 新/57
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 方永江/60

□诗文鉴赏

幽梦惊断，寄慨万千
——苏轼词《永遇乐》读解 汪光大/64

□新书序评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苏轼全集校注》编辑札记 王书华/65

□苏学专家

潜心研究，独出奇谈
——赖正和先生研究苏东坡的艰辛历程 柳 絮/68

□研究史话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五) 池泽兹子/71

□景苏札记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七)
——吏之不正，政之不行 雷金贵/73

□读者来信

王世德教授来信 王世德/77
从“权发迁”谈到东坡宠妾 郑秉谦/78

□苏学动态

《苏轼全集校注》简介 王书华/封二
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召开 流水/79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社科优秀成果丰硕 白水/79
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创作研讨会召开 流水/80
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征文启事 /80

“东坡文化国际论坛”黄冈宣言

2010年10月26日至28日，来自国内外的苏学专家、学者和特邀嘉宾齐聚古城黄州，共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盛会。在论坛期间，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苏轼生命历程城市的学术团体和国内外的苏学专家、学者，在交流论文的同时，还围绕“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打造东坡品牌”的主题进行了讨论，取得共识，并发表如下宣言：

一、要全方位、多层次地加强东坡文化挖掘研究。进一步聚集苏学专家、学者和社会各界的力量，系统地发掘苏东坡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教育、科技、艺术、医药、美食等各个领域的丰富文化资源，力争多出成果、快出成果、出好成果，不断推出东坡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不断扩大东坡文化研究的影响力。

二、要进一步加强东坡文化研究的交流合作。一方面，要继续采取以国际论坛、学术讨论、纪念活动、文化节会、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开展国际间的学术交流与沟通，以此广泛传播东坡文化和不断整合研究力量。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强苏轼生活、工作、游历过的城市之间的合作，鼓励城际间开展各种项目的合作。。

三、要努力做好东坡文化研究成果的转化工作。坚持“弘扬苏学、打造品牌、服务社会、回馈人民”的理念，把东坡文化研究与地方经济、社会事业的发展和城市建设紧密结合起来，大力发展东坡文化产业，并逐步实现东坡文化产业的集约联盟。要积极争取当地党委、政府的重视与支持，物化东坡文化研究成果，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为推进地方经济和社会事业的发展作出应有的贡献。

我们坚信，在苏轼遗址遗迹地党委、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正确领导和大力支持下，以这次国际论坛为契机，坚持全方位、多层次地开展东坡文化研究，东坡文化研究一定会出

现一个崭新的局面。

本宣言于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通过。

2010 中国·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全体代表
二〇一〇年十月二十六日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秘书长蔡心华宣读《黄冈宣言》）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讲话）

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上的致辞

刘善桥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

今天，我们很荣幸地邀请到各位专家、学者聚首黄冈，共同举行东坡文化国际论坛，这是黄冈市第一次为苏学研究搭建的国际交流平台，这对于发掘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在此，我谨代表中共黄冈市委、黄冈市人民政府，对本次论坛的召开表示热烈的祝贺！对各位专家、学者和各位来宾的光临表示最诚挚的欢迎！

930年前，我国著名的文学大家、世界“千年文化名人”苏轼因“乌台诗案”被贬谪黄州，“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苏轼因此在黄州居住了四年零四个月，五个年头。谪居黄州的五年，是他文学创作巅峰的五年，是他实现了苏轼向苏东坡的人物嬗变的五年，也是他精神世界由失落而日益升华的五年。五年来，苏东坡在这里写下了《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千古名篇，创造了光耀千古的东坡文化。东坡文化已成为黄州的文化符号，黄州也成为苏东坡的精神地标，成为东坡文化重要发源地。本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由国家红办、国家林业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由湖北省旅游局、湖北省林业厅、黄冈市人民政府同中国苏轼研究会承办，由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参办。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共同研究和探讨东坡文化的渊源及其影响，把黄冈城区建设为东坡文化名城的构想”。围绕这个主题，全国各地、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100多名专家、学者提供了106篇论文，各抒己见，各显其谋其智，提出了很多的建设性、可操作性的见解。黄冈市委、市政府感谢你们！黄冈市730万老区人民感谢你们！我们相信通过论坛的举办，中国苏学研究，特别是东坡文化的研究将呈现出一个崭新的大好局面。

黄冈古称黄州府，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名城。黄冈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之一，6000多年前就形成了长江文明。黄冈孕育了“四大发明”

之一的活字印刷术发明人毕升，医圣李时珍，地质科学巨人李四光，诗人、学者闻一多等灿若繁星的科学文化巨匠；走出了2位共和国主席，3位中共一大代表，230多位开国将帅；留存了佛教祖庭四祖寺、五祖寺，驰名中外的东坡赤壁等辉耀古今的文化遗产和历史名胜。黄冈还是黄梅戏的发源地，是国家命名的诗词之乡、楹联之乡、武术之乡、农民绘画之乡。以黄冈中学为代表的基础教育享誉全国。红色革命文化、绿色生态文化、历史人文文化、佛教禅宗文化、地方戏剧文化、民间艺术文化孕育出了黄冈厚重的人文历史。近年来，黄冈市委、市政府围绕打造东坡文化品牌、提升黄冈文化软实力，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我们逐年扩大了东坡赤壁文物保护范围；投资近3亿元建设了苏东坡主题公园——遗爱湖公园；大力促进东坡赤壁诗社、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弘扬和研究东坡文化；倡导和支持市内乃至跨省之间东坡文化景点的联点、联线、联网；物化东坡文化研究成果等。应该说，我们在进一步挖掘东坡文化资源、打造城市文化名片方面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借此机会，诚邀各位专家、学者到黄冈各地走一走、看一看，为进一步挖掘东坡文化资源出谋献策，为把黄冈建设成中国东坡文化名城出智出力。

各位专家、学者，女士们、先生们，今天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仅仅是我们真诚交流的开端。希望我们以后在更广的空间、更高的层次进行交流与沟通，为苏学研究，为弘扬东坡精神作出更大的、更卓越的贡献！为黄冈这块东坡文化的精神地标带来更新、更大的影响力！

最后，我预祝本次论坛取得圆满成功！预祝各位专家、学者身体健康、生活愉快、万事胜意！

2010年10月26日

（中共黄冈市委书记、黄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

在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的讲话

曾枣庄

尊敬的刘善桥书记,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

今天,由国家有关部门和湖北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由黄冈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共同承办,由光明日报《光明讲坛》参办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在黄冈宾馆隆重开幕了。我受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委托,向参加“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国内外学者,表示热烈的欢迎!向承办“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黄冈朋友们,表示衷心的感谢!

今年8月在苏轼故乡眉山举行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纪念活动,现在又在堪称苏轼第二故乡的黄冈举行“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欣喜之情,无以言表。30年来,苏轼学术活动形成了前所未有的热潮。1982年全国第2届苏轼学术讨论会,就是在黄冈举行的。在全国苏学研究方面,四川眉山、湖北黄冈都发挥了先导和引领作用。28年过去了,我们高兴地看到黄冈以崭新的面貌迎接来自海内外的老朋友、新朋友。30年来,苏轼学术活动取得了卓有成效的经验。其中最重要的三条为:一是有一批著名学者的积极参与,有国内外苏学爱好者的积极参与;二是有苏轼遗址地党委、政府的积极支持;三是大批苏轼研究成果的涌现。30年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对促进东坡文化宣传、研究和运用,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

黄冈即黄州,在苏轼的生命里具有里程碑意义。

其一,名号的里程碑意义。苏轼在黄州东坡作陂种稻、身耕妻蚕、躬耕自食,自号东坡居士。从此苏轼、苏东坡之名、号不分伯仲,闻名于世。

其二,精神的里程碑意义。在现实的困境和生命的绝望中,他融合儒释道的合理内核,从而实现内心的自我超越和外表的旷达自适,在人生历程中展现了“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潇洒姿态和无畏精神。

其三,文学的里程碑意义。苏轼在黄州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达到了他个人和宋代文学词、赋创作前所未有的高度。其他作品如《卜算子》(缺月挂疏桐)、《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浣溪沙》(山下兰芽短浸溪)、《临江仙》(夜饮东坡醒复醉)、《记承天寺夜游》、《答李端叔书》、《方山子传》等都是脍炙人口的名篇。苏轼书法、绘画的艺术成就,也以黄州时期为高,被誉为“天下第三行书”的《黄州寒食诗帖》,就是这个时期的作品。

其四,人生的里程碑意义。苏轼《自题金山画像》:“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此诗作于建中靖国元年(1101)六月游金山龙游寺时,离七月二十八日逝世仅仅两月有余,可谓绝笔。苏东坡虽然在这些地方,没有实现自己“致君尧舜”、“建功立业”的理想,但是他的君子之德、绝妙之文,却受到百姓、士人的推崇、追捧。

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苏轼爱国爱民的崇高理想、辉煌千秋的文化精神、卓然独立的文学作品、宦海沉浮的传奇人生和遍及全国的遗址遗迹,正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宝贵文化资源。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各位朋友: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而立之年,在祖国建设转型的重要时期,在学会全体同仁的共同努力下,我相信,东坡文化的宣传普及、挖掘研究、转化运用必将受到更多的关注,必将掀起更高的浪潮,必将取得更大的成绩!预祝大会圆满成功!

2010年10月26日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

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总结报告

涂普生

10月25日至10月27日，凭借中国·黄冈大别山旅游节这个平台，由国家红色旅游协调工作办公室、国家林业局与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由湖北省旅游局、湖北省林业厅、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同黄冈市人民政府承办，15个国家和地区的苏学研究专家、学者聚首古城黄州，举办东坡文化国际论坛。这是我市首次举办的苏学研究和探讨的国际论坛。这个国际论坛的开办，是中国东坡文化研究进入了一个更高、更大的空间和层面的重要标志，是将中国东坡文化推向世界的一个重要步骤，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一、特点鲜明，盛赞有加

我们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共收到国内外专家、学者提供的论文106篇，经过精选，收录入2010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文萃《东坡说东坡》的论文52篇。参加本次国际论坛的专家学者118人，其中有来自国内各省、市、区，各大专院校和科研院所的，有来自西班牙、英国、日本、新加坡、加拿大、巴基斯坦、俄罗斯、中非、美国、西班牙、韩国、印尼和台湾、香港等14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20名。新加坡、英国、西班牙、印尼、日本、香港等国家和地区的相关单位或知名人士分别发来了贺信、贺电。一致认为，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具有六个特点：一是首开用国际论坛形式开展苏学交流、研讨新局。二是主题集中，重点突出。本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主题，就是东坡文化在黄州的发生、发展及其影响，以及如何把黄州打造成中国东坡文化名城的构想。三是东坡文化研究首次进入了中国在职领导干部乃至在职高级领导干部队伍中，并且取得了一定的富有影响的成果，湖北省黄冈市委书记刘善桥先生亲任东坡文化研究会名誉会长，亲自参加论坛并且致辞；湖北省黄冈市委副书记、市长刘雪荣先生所撰写和提交的论文《人间绝版苏

东坡》，便是代表。四是在黄冈看到了东坡文化研究成果物态化，并已进入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主战场，成为当地经济，特别是旅游经济的新的增长点。五是苏轼研究队伍的新的格局和架构基本形成。参加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专家、学者中，既有耄耋老人，也有中青年专家；既有离退休干部，也有在职在岗干部；既有科研院所的砥柱人物，也有社会上的自由职业者，这对于苏学研究在更广、更高层次上兴起和发展，都是大有意义的。六是这次论坛共有30位国内外专家、学者在大会或分组会上发表了论文。其发表论文的形式多样，生动活泼，有交流，有沟通，有对话，有辩论，有商榷，发表论文方式进行了成功的改革，与国际论坛实行了有效的接轨。

与会国内外专家、学者普遍对本次论坛赞誉有加。一致反映，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阵容宏大，层面很高，内容丰富，气氛活跃，组织有序，安排精当。来自常州、儋州、徐州、武汉大学、山东济宁学院的代表说，黄冈市办出了这么个高规格、高格调、强阵容、高层次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使我们大开了眼界，学到了很多平常不易学到的东西。将来我们办会要求就更高了，要超越就很困难了。来自新加坡、巴基斯坦、加拿大、日本的专家、学者说，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办得这么好，出乎我们的想象，我们看到了黄冈的领导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视，体验到了黄冈领导人很高的领导能力和组织能力。还有不少的国内外专家、学者说，中国黄冈通过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成功地向中国和世界一些国家和地区展现了东坡文化的魅力，同时也展现了中国黄冈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的决心和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的战略构想，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我们要刮目看中国黄冈了。

二、求同存异，成果丰硕

通过自由阅读论文、大会安排 13 位专家学者发言、17 位专家学者自由发言、小组发言，各位专家、学者围绕本次论坛的主题，畅所欲言，各抒己见，热烈争论，求同存异，在以下几个问题上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1. 关于东坡文化这一文化概念建立的问题

多数专家学者认为，经过三十多年的研究和探讨，在我国历史文化长河中，苏轼文化，也有的称之为苏学，有了其独有的文化价值、审美价值和崇高地位。而作为其重要的组成部分的东坡文化，是苏轼文化，或叫苏学中影响最深远、价值最重大、光芒最耀眼的，且具有黎庶情结、创新精神、思辨智慧和多元包容的一种文化流派。东坡文化也属于贬谪文化，但与传统意义上的贬谪文化有着本质的不同；东坡文化也属于苏轼文化，但它又是苏轼文化中的标杆性文化，是苏轼在黄州向苏东坡人物嬗变的结晶，是苏轼创新理论与实践的结晶，它们之间的关系是种属关系。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不完全同意上述观点。他们认为，苏东坡即苏轼，只不过是同一个人的名和号的问题，东坡文化即苏轼文化，是同一个文化概念的文化。

2. 关于东坡文化发源地的的问题

有些专家、学者认为，黄州是东坡文化的发源地。不仅如此，还是东坡养身文化、东坡贬谪文化，东坡文化和黄州赤壁文化的发源地。东坡文化是苏轼被贬谪黄州后，经过艰难困苦的磨练，经过几种理论、思想融合，在苏轼躬耕东坡并自号东坡居士之后，创建和发展的一种文化。其代表作有二赋一词等。经过 900 多年历史的扬弃和沉淀，黄州已成为苏东坡的精神所在，东坡文化成为黄州的文化符号和特色鲜明的地标。苏东坡在金山看到自己的画像后也颇有感触地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说明他是很看重自己在黄州的建树的。

也有的专家、学者认为，东坡文化也好，苏轼文化也好，都是出生在眉山的、苏洵的长子的一个符号。有了这个人才有这么个文化。他的发源地应该是在眉山。再往上追溯，发源地应在河北栾城。还有的专家、学者认为，黄州只是东坡文化发源地之一，或者是东坡文化重要发源地之一。凡是苏轼生活、学习、工作、历练过的地方，都是东坡文化发源地。这样来确立概念，有利于团结和组织多方力量，共同研究苏东坡，共同开发东坡文化资源，

共同打造东坡文化品牌。

3. 关于东坡文化研究成果物态化，进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

普遍认为，在当今社会，经济建设是中心。东坡文化研究只有紧密围绕这个中心，积极融入这个中心，才能有力推进、有效发展，才能传承和弘扬东坡文化，才能打造东坡文化品牌。湖北黄冈在开发东坡文化资源方面下了真功夫，取得了真成效。东坡文化主题公园的建设和使用；东坡文化产品，如东坡菜、东坡酒、东坡食品的开发和产品化；东坡文化旅游线和网点的开发和建设，都有力地说明了这一点。黄冈市的“政府主导、多方投资、重在建设、惠及民众”开发东坡文化资源，培植新的经济增长点的经验和作法，值得各地借鉴。一些专家、学者还倡议：成立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联盟，进一步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

4. 关于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的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建议，湖北黄冈应该率先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他们认为，从现在的情况来看，黄冈已具备了一定的条件和基础，特别是党委、政府重视，民众基础深广，东坡文化底蕴深厚，应该乘势而上。一些专家、学者建议，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要利用本地资源，打造本地特色，不能一哄而起，一哄而上。

5. 关于东坡文化在国外、境外影响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认为，苏东坡既是四川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东坡文化是黄冈的，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苏东坡被评为上个千年世界千年英雄便是力证。东坡文化研究遍及东南亚各国和地区，并逐步发展到了欧美国家和地区。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举办，英国、俄罗斯、日本等 15 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踊跃参会，新加坡、西班牙、日本、英国、印尼、香港等国家和地区发来贺信、贺电，说明东坡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是巨大和深远的。不少专家、学者指出，国际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对东坡文化的研究达到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加强国际间、地区间的合作，共同推进发展，这是时代的要求。

东坡文化国际论坛还一致通过、发表了《黄冈宣言》。这也是本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一项重大成果。《宣言》表达：要进一步加强东坡文化国际间的研究和交流；要进一步加强苏学研究文集的编辑出版工作；要进一步加强苏学研究成果的物态转

化,服务于经济建设中心,惠及社会 and 人民大众;要树立建设的观点,创造条件,开发和开辟东坡文化旅游线,催生新的经济增长点等等,这些意见都有一定的创见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对于进一步推进东坡文化研究和发 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的圆满成功,原因是多方面的。最主要是凭借了湖北省人民政府和国家有关部门举办的中国黄冈大别山旅游节这个层次高、场面大、影响好的平台。特别是论坛得到了中共湖北省黄冈市委、黄冈市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与大力支持。中共黄冈市委书记、黄冈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顾问刘善桥先生,亲临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开幕式,并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致辞。在致辞中,他高度概括地表述了本次论坛的重大意义;具体翔实地介绍了黄冈市开展东坡文化研究的情况,以及黄冈市厚重悠久的历史;高瞻远瞩地提出了深入开展东坡文化研究的战略构想,为我们今后进一步开展苏学研究提出了极为可贵的、可供借鉴的经验。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刘雪荣先生亲自安排和督办论坛的筹备工作,并且亲自为论坛提交论文,亲自为论坛提供良好的条件。加上与会专家、学者经春历夏,撰写论文,亲莅论坛,献智献策,这些都是本次论坛举办成功,取得成果的重要原因。

三、真诚建议,需谋需为

在 2010 中国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不少国内外专家、学者对东坡文化的薪火传承问题;东坡文化研究成果转化为新的经济增长点、转化为生产力问题;提升东坡文化影响力问题,等等,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十分真诚的建议,很值得市委、市政府重视,很值得市委、市政府进行谋划,并且创造条件,逐步为之。

1. 关于黄州城区东坡遗址、遗迹修复的问题

许多专家、学者提出,苏东坡是黄州的文化标识,黄州是苏东坡的精神地标。黄州应该成为中国的东坡文化圣地,成为东坡文化研究的大课堂。但令人遗憾的是,我们想要拜谒的东坡遗址遗迹,比方说定惠院、临皋亭、雪堂、竹间亭、东坡等,荡然无存,真叫人扼腕痛惜。日本东坡文化研究专家内山精也教授建议,现在要求在原址上照旧貌旧制修复恐怕很困难,也没有必要。但是,可不可以经过研究,经过大体确认,在遗址遗迹地上竖立一个石碑,刻上名称,供人瞻仰、追思呢?我们认为,

专家学者的建议是很值得考虑的。有鉴于此,我们建议,由黄冈市城建部门、规划部门、园林部门以及市东坡文化研究会、市赤壁管理处,组成专班,对有关苏东坡的重要遗址、遗迹进行考证、研究和认定,然后确定具体地点,确定风格模式,确定规划架构,并做出专项规划,经过征求社会和专家的意见后,列入城市建设整体规划,逐步进行修复。对于不适宜于修复的遗址遗迹,有如日本学者所言,竖立一个碑,供人瞻仰追思。

2. 关于在黄州城区大、中、小学生中传承东坡文化的问题

日本、新加坡、加拿大等专家、学者说,苏东坡遗胜地的人民群众,特别青少年学生是传承东坡文化的中坚和主力,应该在苏东坡遗胜地的 大、中、小学学生中进行这方面的递火传薪。日本学者在发言中讲述了这么一件事:他的夫人的一位同事,是黄冈中学的毕业生。可是同他谈起苏东坡、谈起东坡文化,这位中国朋友居然说不很清楚。这位日本学者说,这不能不说是黄冈中学这么一所著名的学校的一个缺失。联想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同志晋谒东坡赤壁时的指示:要在我们有一定文化基础的干部中,特别是领导干部中,在我们的青少年学生中,倡导学习苏东坡的文章。我们建议,采取适当的方式,在干部中倡导学习国学,倡导读点苏东坡的作品,大体了解一下苏东坡;在大中小学学生中,倡导结合课标,组织兴趣小组,利用课外活动时间,学习国学,学习苏东坡的诗、词、文、赋等,倡导他们利用可以利用的时间,以活动为载体,组织东坡赤壁游,感悟东坡赤壁游,等等。

3. 关于黄冈市更名为黄州市的问题

一些专家、学者,特别是来自江苏省徐州市的专家、学者建议,将现在的黄冈市更名为黄州市。他们说,黄冈,顾名思义,不过是个黄色的土冈而已。而黄州则是历史悠久的千年名郡,文化底蕴深厚,蜚声古今中外。特别是苏东坡被评为上个千年的世界千年英雄,黄州的附加值更是大大提升了。将现在的黄冈市更名为黄州市既是历史的要求,更是现代的需求。有鉴于此,我们建议:市委、市政府组织一个专班,对更名之事,进行专题论证,权衡利弊;将黄冈市更名为黄州市,将黄州区更名为东坡区,将团风县更名为黄冈县。

(下转第 49 页)

人间绝版苏东坡

刘雪荣

编者按：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刘雪荣先生，在繁忙的政务之余研究东坡，撰写的《人间绝版苏东坡》表现出很高的造诣，实在难能可贵。本文以数字来提挈苏东坡的人生轨迹，以作品来解读苏东坡的黃州岁月，以史实来诠释苏东坡的文化品格，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对于研究、宣传、普及东坡文化有一定启迪，为此特向大家推荐。

中国当代著名学者、《苏东坡传》的作者林语堂先生说：“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人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他还说：“我若说一提到苏东坡，在中国总会引起人亲切敬佩的微笑，也许这话最能概括苏东坡的一切了。”2000年，法国《世界报》组织评选公元1001—2000年1000年间世界级杰出人物，授予“千年英雄”称号，全世界一共评出12位，苏东坡名列其中，是唯一入选的中国人。

就是这样一位千年英雄、人间绝版的苏东坡，与黄冈有着千丝万缕、割舍不断的联系。苏东坡写过一首诗（《自题金山画像》），回顾自己的一生：

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我们所在的黄州处处都留下了苏东坡的足迹，我们呼吸的空气里还弥漫着苏东坡的气息，我们走过的街道、说出的地名、谈起的建筑都与苏东坡息息相关，我们正在建设的遗爱湖公园之“遗爱”也是来源于苏东坡的作品。东坡肉、东坡饼、东坡羹等名菜也都是苏东坡在黄州发明的。这些都是黄冈一笔巨大的精神文化遗产。作为黄冈的每一个市民，都应该学习苏东坡、了解苏东坡，弘扬苏东坡文化。我觉得，市长是一个地方文化最好的普及者、推广者。黄冈的文化底蕴十分深厚，文化资源非常丰富，所以我给自己确定的任务，就是“讲东坡、

论英雄、说禅宗、唱黄梅（戏）”。今天先从“讲东坡”做起。我不是一名学者，对苏东坡没有很深的研究，只是到黄冈工作以后，对苏东坡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读了一些关于苏东坡的书籍，有了一些感受和体会，今天向同志们作个汇报，希望引起大家对苏东坡文化的兴趣。既然不是学者，我的汇报就可能不够学术、不够严谨、不够科学，错误在所难免，请同志们批评指正。

一、苏东坡的数字人生

“数字某某”是信息社会的名词，苏东坡时代没有这个说法。我借用“数字”来概括苏东坡的一生。

第一组数字：8341。我用它来概括苏东坡从政的主要经历。“8”是“八州太守”。苏东坡先后当过密州、徐州、湖州、登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8个州的太守。徐州、湖州、杭州、扬州大家比较熟悉，密州在今天山东诸城，颍州在今天安徽阜阳，登州在今天山东蓬莱，定州就是今天河北定州。在密州、徐州、杭州的任期稍长，两年左右；最短的是登州，任期5天；其他地方都是几个月时间。“3”是“三部尚书”，先后担任吏部、兵部、礼部尚书，任期都不长，吏部7个月，兵部1个月，礼部9个月。“4”是“四处贬谪”，先后被贬到黄州、汝州、惠州、儋州，汝州还没来得及到任。“1”是“一任皇帝秘书”，正式职务叫“翰林学士知制诰”。这一职务都是由当时最有名望的学者担任，正三品。苏东坡在这一任上干了2年零6个月，起草了800多道诏书，干得非常出色。总的来说，苏东坡从政40年，在地方做官33年，在朝廷7年；执政28年，被贬谪12年，是一个典型的能上能下的“交流型干部”，交流的幅度和频率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

第二组数字：三起三落。苏东坡的人生跌宕起伏、极为坎坷，是特别夸张的戏剧人生。

一起：步入仕途。公元1057年，苏东坡22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一举成名天下知。他的“高考”限时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后来收入《古文观止》，使他一下子名震京师、脱颖而出。考中进士就做官。先到基层锻炼。第一个职务是签书凤翔府判官，相当于知府的助理，品级不高，从八品，扎扎实实干了将近3年。基层锻炼后，被召回朝廷，任职史馆（国家图书馆），在那里读了很多书。神宗熙宁七年（1071），下派到杭州做通判，通判大体相当于今天的副市长，干了2年9个月。然后到密州任太守（1074），当时38岁，是个“年轻干部”，就独当一面了。后来又转任徐州太守两年，湖州太守3个月。可以看出，苏东坡步入仕途后，一步一个脚印，一步一步被提拔重用。

一落：大难临头。1079年，因为“乌台诗案”，苏东坡被关在御史台审讯130天。乌台就是御史台。为什么叫乌台？唐朝时御史台内有几棵大柏树，乌鸦在上面筑巢，所以把御史台叫乌台，一直沿用下来。案件是因文字而起的，所以叫“乌台诗案”。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产生了新党与旧党之争。苏东坡反对变法，站在旧党一边，新党就找岔子整苏东坡。苏东坡到湖州上任后，按惯例给皇帝写了一篇谢表，其中说到：“知其愚不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新进”指在王安石变法中任用的一些官吏。“新进”李定和舒亶等小人岂肯放过他，就千方百计迫使宋神宗给他定罪。1079年7月，御史台差人到湖州捆绑了苏东坡，押往御史台进行审讯。怎么审？打！苏颂的牢房与苏东坡的只有一墙之隔，他写道：“遥怜北户吴兴守，诟辱通宵不忍闻。”日复一日、通宵达旦的刑讯逼供，苏东坡终于经受不了了，唯一的办法就是全部承认。政敌一心置他于死地，但神宗一时举棋不定，太祖早有誓约，除叛逆谋反罪外，一概不杀重臣、不杀士大夫。宋神宗又特别爱惜人才，所以就来了一个折衷的办法，贬。贬到哪里去呢？黄州。为什么是黄州？既是贬，条件就不能太好。黄州当时是下等州，贫穷落后。长江自北向南折向东绕城而过，巴河自北向南注入长江，长江和巴河一起把黄州围得象一口井，苏东坡说：“黄州真在井底”，相信是有感而发的。但苏东坡毕竟人才难得啊，宋神宗也不想太亏待他。好在黄州离开

封不远，基本生活还有保障，就把他贬到这里来了。

二起：东山再起。1085年4月，宋神宗驾崩，年仅10岁的哲宗继位，英宗皇后也就是皇太后摄政，尽废王安石变法，史称“元祐更化”。任用司马光为宰相，也使苏东坡青云直上。前任登州太守，到任5天，就被召回京城，官至翰林学士知制诰。短短17个月时间，苏东坡从戴罪之身的从八品升到正三品，跃升了12个官阶。

二落：知难而退。太后和司马光全盘否定王安石的新法，苏东坡坚持原则，反对全盘否定。因与太后和司马光政见不合，苏东坡觉得不开心，一再主动请辞外放。1089年7月至1091年2月，出任杭州太守1年7个月。

三起：再回朝廷。1091年3月回朝，当了7个月的吏部尚书，然后出任颍州、扬州太守，再任兵部尚书1个月、礼部尚书9个月。从苏东坡频繁的上下左右交流，可以看出朝廷极端矛盾的心态。一方面，太后对苏东坡极为赏识，希望他作为与新党制衡的政治力量；另一方面又恨铁不成钢，对苏东坡爱也不是、恨也不是。

三落：一贬再贬。1093年9月，太后驾崩，18岁的哲宗亲政。哲宗心灵已经有些扭曲，太后摄政时，他基本上是个局外人，大事小事与他无关，他很郁闷，一旦亲政，变本加厉地进行政治反扑，无情打击元祐党人。先把苏东坡降为定州太守，赶出京城。上任一个月就被贬到遥远的惠州，在那里住了2年6个月；再贬，贬到更远的儋州，就是今天的天涯海角。现在海南岛经济发达，古代却是极其落后、没有开化的蛮荒之地。贬谪至此，就再无处可贬了。

这就是苏东坡三起三落、跌宕起伏的人生。我们可以看出，有三人对苏东坡的命运起了主宰作用。一是皇帝，北宋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对苏东坡是爱恨交加、恩威并重；二是皇后，从神宗皇后起，历任皇后都非常关照他；三是小人，御史中丞李定母亲死了不回去服丧，被苏东坡批评，于是怀恨在心，报私仇、泄私愤。还有见风使舵、反复无常的舒亶等等小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第三组数字：123456。这一组数字反映苏东坡的主要社会关系。

“1”：一位如雷贯耳的伟大父亲。苏洵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养育了苏轼、苏辙两个惊天动地的儿

子。朱德委员长游眉山三苏祠作了一首诗：“一家三父子，都是大文豪。诗赋传千古，峨眉共比高。”《三字经》有几句是写苏洵的：“苏老泉，二十七，始发奋，读书籍。”

“2”：两位情同手足的兄弟。苏轼、苏辙是中国历史上感情最好的兄弟。他们是兄弟、是师生、是诗词唱和的良友、是政治上荣辱与共的伙伴、是精神上相互勉励安慰的知己。政治上互相支持，同朝为官；生活中互相照顾、关怀备至；艺术上比翼双飞，互唱互和。

“3”：三位红颜。第一任妻子王弗。她去世10年后，苏东坡在密州为官，写了一首催人泪下的《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记梦》：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尘满面，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正梳妆。相顾无言，唯有泪千行。料得年年肠断处，明月夜，短松岗。

王弗去世后，苏东坡又娶了第二任妻子王闰之，即王弗的堂妹，死后与苏东坡合葬在河南郾县。第三位王朝云。她一直跟随苏东坡，终身相伴，生死相依，死后葬在惠州。苏东坡为她写了一幅楹联：“不合时宜，惟有朝云能识我；独弹古调，每逢暮雨倍思卿”。

“4”：四位名垂青史的关门弟子。苏门四学士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在中国文化史上赫赫有名。苏门四学士固然以自己的成就出名，但是做苏东坡的关门弟子，无疑使他们名气大增。

“5”：五位恩威并重的皇帝。苏东坡公元1036年12月19日出生，1101年7月28日去世，享年66岁，一生经历了北宋5任皇帝：仁宗、英宗、神宗、哲宗、徽宗。仁宗，在位40年，爱惜人才，殿试选了苏轼、苏辙两兄弟，非常高兴，回去对皇后说：“我今天为子孙选了两位宰相。”英宗一登基就想提拔苏东坡，但当时宰相韩琦认为不合适，最后把他放到史馆里。英宗英年早逝，在位仅4年。神宗是一位有雄才大略的皇帝，雄心勃勃，想干一番大事业。神宗对苏东坡又爱又恨。爱他的才，恨他不听话、反对变法。神宗吃饭的时候，常常一手拿着筷子，一手拿着苏东坡的文章，边看边点头，说“人才难得，人才难得呀”。哲宗是一个呆子，心态有点扭曲。他在位期间对苏东坡一贬再贬。徽宗是北宋的亡国之君，与他儿子钦宗一起当了金人

的俘虏，受尽了非人的折磨。徽宗不适合当皇帝，但他是一位出色的艺术家，创造了书法的“瘦金体”。他继位后大赦天下，把苏东坡从海南岛赦免回来，只可惜苏东坡在返回途中殁于常州。

“6”：六位肝胆相照的人生知己。苏东坡的朋友很多，各行各业、各个层次的朋友都有。我只列举6位代表性人物。文学上的恩师欧阳修。苏东坡科举考试时，欧阳修是主考官，看到苏东坡的考卷《刑赏忠厚之至论》，大为赞叹，以为天下只有他的学生曾巩会写出这么好的文章，本应评为第一，但为了避嫌，把这篇作文抑为第二。公布后发觉不是曾巩所作，后悔不迭。欧阳修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也。”政治上的盟友司马光。此人就是“司马光砸缸”故事的主人公、《资治通鉴》的作者。他是反对王安石变法的代表人物，苏东坡与他同属“元祐党人”。书画界的知己米芾。米芾是北宋著名书画家。北宋四大书法家“苏黄米蔡”，即苏东坡、黄庭坚、米芾、蔡襄。米芾性痴，苏轼性豪。隐士里的知己陈季常。陈季常归隐在麻城的岐亭。苏东坡在陕西凤翔当签判时，陈季常的父亲陈希亮任太守，两人合作不太好，但这并未妨碍苏东坡与他儿子陈季常的感情。苏东坡从开封来黄州路过岐亭时遇到陈季常，在他家住了几天。在黄州4年多，苏东坡去看过他5次，陈季常来黄州看过苏东坡7次。苏东坡为他写了著名的《方山子传》。有一个典故“河东狮子吼”就是从他这里来的。苏东坡写了一首诗说陈季常：“忽闻河东狮子吼，拄杖落地心茫然。”由于文学上的偶然，陈季常俱内的名声竟流传千古。佛门里的密友道潜。也叫参寥，是杭州的一位大和尚。苏东坡在杭州为官时，就与他结下深厚的友谊。苏东坡被贬黄州后，他千里迢迢专程从杭州来看望，陪苏东坡住了1年时间。道潜是佛门里唯一受到苏东坡牵连的人。朝廷勒令他还俗，这是对佛门之人最重的处罚。说明他和苏东坡关系非同一般。官员里的手足徐君猷。苏东坡贬谪黄州时，徐君猷任黄州太守。这个人苏东坡太好了。苏东坡说：“始谪黄州，举目无亲。君猷一见，相待如骨肉。”苏东坡在黄州生活无着，徐太守给他划了一块坡地耕种，竟使“东坡”名扬四海。徐太守要调走，苏东坡代巢元修写了《遗爱亭记》，专门纪念他，称他是“遗爱”官。

二、苏东坡的黄州岁月

黄州对苏东坡太重要了。在苏东坡的仕宦生涯中，在一个地方生活时间最长的是在黄州，有4年2个月；艺术上的顶峰是在黄州，文学上的代表作“一词二赋”、书法上的代表作《寒食帖》都作于黄州。所以当代文化学者余秋雨在《苏东坡突围》中写道：“苏东坡成全了黄州，黄州也成全了苏东坡”，“苏东坡在黄州写的那些杰作，既宣告着黄州进入一个新的美学等级，也宣告着苏东坡进入了一个新的人生阶段，两方面一起提升，谁也离不开谁。”他说苏东坡到黄州“完成了一次永载史册的文化突围。黄州，注定要与这位伤痕累累的突围者进行一场继往开来的壮丽对话。”

（一）从苏东坡在黄州住处变化看其心路历程

苏东坡在黄州住了3个地方，定惠院、临皋亭、南堂。按照3个住处，我们姑且把他的心路历程划分为3个阶段：第一阶段痛苦孤独，第二阶段自省彻悟，第三阶段超越旷达。

第一阶段（定惠院阶段），痛苦孤独。因“乌台诗案”，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苏轼携长子苏迈在御史台差役的押解下离开京师，凄凉就道，在路上整整走了1个月，二月初一到达黄州。余秋雨说：“苏东坡在示众，整个民族在丢人。”来到黄州，苏东坡首先住进了定惠院。定惠院是一座寺庙，遗址大体在黄冈军分区原教导队、现在的工商局职工宿舍楼、黄冈中学老校区操场看台后面的高地上。从元丰三年二月一日至五月二十九日，苏东坡在此住了4个月。刚刚经历了一场巨大的人生转折，来到一个举目无亲的偏僻地方，他的痛苦孤独是可想而知的。他在给朋友的信中说：

黄州僻陋多雨，气象昏昏也。鱼稻薪炭颇贱，甚与贫者相宜。然某平生未尝作活计，子厚所知之。俸入所得，随手辄尽。……见寓僧舍，布衣蔬食，随僧一餐，差为简便。

这段时间，他写下了著名的《卜算子》：

缺月挂疏桐，漏断人初静。谁见幽人独往来，缥缈孤鸿影。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

苏东坡描绘了一个非常凄冷的艺术境界。孤鸿惊慌失措，不知道哪里是出路，寂寞、孤独、彷徨，但不改高洁的品性。苏东坡的弟子黄庭坚对此评价“若非胸中有万卷书，笔下无一点俗气，孰能至此？”定惠院东边的高地上有一株海棠。海棠原本生长在蜀地，苏轼在黄州见到海棠，感到无比亲切，

“已五醉其下矣”。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于是到黄州的当月，他就写下了：

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

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

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

天涯流落俱可念，为饮一樽歌此曲。

第二阶段（临皋亭阶段），自省彻悟。元丰三年（1080）五月二十九日，苏轼的家人来黄州，定惠院住不下了，就迁居临皋亭。专家称，临皋亭大体在黄冈中学老校区进门左侧高地，现在是教职工住宿楼。从元丰三年五月到元丰六年五月，苏东坡在此整整住了3年。这时家人来了，朋友来了，环境慢慢熟悉了，生活慢慢习惯了，心情也逐渐好起来了，开始自省彻悟。这时他的作品表达出来的既有豪放旷达的一面，又有人生如梦的叹息，还有对广阔宇宙惆怅迷茫的心态。他写了《与范子丰二首》（之二）：

临皋亭下，不数十步，便是大江。其半是峨眉雪水，吾饮食沐浴皆取焉，何必归乡哉！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后来又写了《临江仙·夜归临皋》：

夜饮东坡醒复醉，归来仿佛三更。家童鼻息已雷鸣。敲门都不应，倚杖听江声。长恨此生非我有，何时忘却营营。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苏东坡说他喝酒醉了醒、醒了醉，半夜三更才回来，家童都熟睡了，敲门也不答应，他就拄着手杖站在门口听江声。这时他想想自己当官倍受磨难，真想驾一叶扁舟顺江而下，了却一生。第二天这首词就传遍了全城，人们传说苏东坡乘小舟不知去向了。太守徐君猷听后大惊失色，因为他有责任看管苏东坡。急忙来临皋亭探望，看到苏东坡还在睡觉呢。住在临皋亭这一阶段，苏东坡想归隐又不甘。这时候，伟大的作品诞生了，一词二赋：《念奴娇·赤壁怀古》、《赤壁赋》、后《赤壁赋》。我们先欣赏一下《赤壁赋》。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凭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这是一个多么美妙空灵的境界啊。文章的高潮部分又说：

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三个月后，苏东坡再游赤壁，又写了后《赤壁赋》：

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过黄泥之坂。霜露既降，木叶尽脱，人影在地，仰见明月，顾而乐之，行歌相答。已而叹曰：“有客无酒，有酒无肴，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

多美的文章啊。进入那种艺术境界，感受到人生是多么美好。这样的文章是值得背诵千遍万遍的。

苏东坡在这段时间里，遍访黄州名胜之地，饱览鄂东美好自然风光，不断有佳作诞生，而且大多清丽阳光。他到浠水的清泉寺，写了一首《浣溪沙·游蕲水清泉寺，寺临兰溪，溪水西流》：

山下兰芽短浸溪，松间沙路净无泥，潇潇暮雨子规啼。谁道人生无再少？门前流水尚能西，休将白发唱黄鸡！

不要说我老了，你看门前兰溪的河水还能往西流呢，谁说时光不再？全词洋溢着一种向上的人生态度。经过美食美景的调适，他的心态变得从容洒脱。

第三阶段（南堂阶段），超越旷达。元丰六年（1083）五月至元丰七年（1084）四月，苏东坡搬家至南堂，又住了1年。南堂在临皋亭南侧，也在黄冈中学老校区附近。黄冈中学一带当时叫夏澳。北宋明道元年（1032），黄州刺史夏竦凿江边水道藏船，因为地势是凹进去的，所以取名夏澳，大致是在黄冈中学老校区校门至操场一带，现在操场后面还可以看到古江堤的痕迹。江边岸上，往南依次是临皋亭、南堂、定惠院，再往南就是安国寺了。为什么今天黄冈中学是全国普通中学的一面旗帜？应该是有历史渊源的。从苏东坡以来，这里崇文重教，千年文气，一脉相承。苏东坡搬到新家，家人都来了，朋友很多了，生活习惯了，气候也适应了，他也有了积极、向上、乐观的心情，这时他的作品明显让人感觉到阳光灿烂、超越旷达的一

面，还有浓浓的禅的味道。他在《南堂五首》之一里写道：

江上西山半隐堤，此邦台馆一时西。

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

南堂离大江不远，卧在堂中就可以看到江上帆船上下往来。还有一首写得比较浪漫：

扫地焚香闭阁眠，簟纹如水帐如烟。

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这时候又有一篇伟大的作品诞生了，就是《记承天寺夜游》。承天寺遗址据称也在黄冈中学老校区内。

元丰六年十月十二日夜，解衣欲睡，月色入户，欣然起行。念无与为乐者，遂至承天寺寻张怀民。怀民亦未寝，相与步于中庭。庭下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松柏影也。何夜无月？何处无竹柏？但少闲人如吾两人者耳。

这是历来为人们争诵的名篇。全文仅85字，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勾勒出空灵清幽静雅的意境，可比陶渊明“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

在南堂住到元丰七年（1084）四月，朝廷下诏，苏东坡“量移汝州”，实际上不改贬谪的性质，只是让他离开封近一点，改善一下他的条件而已。就要离开黄州了，就要离开朝夕相处的父老乡亲了，苏东坡感慨万千，填了一首词《满庭芳·归去来兮》：

归去来兮，吾归何处？万里家在岷峨。百年强半，来日苦无多。坐见黄州再闰，儿童尽、楚语吴歌。山中友，鸡豚社酒，相劝老东坡。云何！当此去，人生底事，来往如梭。待闲看秋风，洛水清波。好在堂前细柳，应念我，莫剪柔柯。仍传语，江南父老，时与晒渔蓑。

他说，到哪里去呀？我的家在万里之外的岷峨。来黄州4年多了，生活习惯了，孩子们都学会说黄州话了，我也是50来岁的人了，不想走了，可是身不由己啊。感谢黄州父老的深情厚意，我走了之后，帮我照看好雪堂前的柳树，不要去剪那柔嫩的枝条。还请带个口信给江南武昌、樊口的乡亲，请他们经常把我打渔用的蓑衣拿出来晒一晒，总有一天，我还会回来的。这是多么纯真朴实的依依之情啊！

定惠院、临皋亭、南堂，3个住处的变化，3个不同的阶段，苏东坡经历了从黑暗、到黎明、到天亮的心路历程。

（二）苏东坡在黄州的生活方式

苏东坡在黄州 4 年 2 个月，每天都干些什么呢？大体上是 4 件事：躬耕东坡、放浪山水、修身养性、激情创作。

躬耕东坡。为什么要躬耕东坡？初到黄州，收入没有了，家里人口又多，生活十分贫困，日子过不下去了。元丰四年（1081），他到黄州的第二年，徐太守在城外东坡划了一块“故营地”给他耕种，让他“自己动手，丰衣足食”。东坡在什么地方？有专家说在今天体育路黄冈师院老校区后门附近一带。苏东坡在《东坡八首》的序言中说：

余至黄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予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

东坡是营地，长期无人耕种，是瓦砾之场，不适合耕种。又因当年大旱，从未躬耕的他饱尝了开荒种地的艰辛。但他仍然很乐观。一个月夜，苏东坡拄着拐杖，走在东坡的田间小路上，诗兴大发，写下著名的《东坡》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
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

放浪山水。贬谪是坏事也是好事。仁者乐山，智者乐水。文人都是喜欢山水的。苏东坡说：

得罪以来，深自闭塞，扁舟草履，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辄自喜，渐不为人识。

他到了哪些地方？可以说足迹遍布黄冈各地，大别山南麓，长江中游两岸，北面到麻城岐亭、杏花村，南面到鄂州西山樊口。那时候江面应该有三四公里宽，波平浪静，水光接天，驾一叶小舟就划过去了。他还到了黄州附近的禹王城、团风、阳逻、沙湖，去了浠水的巴河、兰溪、麻桥、清泉寺、绿杨桥，到了黄石的磁湖、西塞山，到了黄梅的五祖寺，到了江西的庐山、石钟山。

修身养性。苏东坡集儒教、道教、佛教于一身。黄州那时寺庙很多。苏东坡初到黄州，住在定惠院，隔一两天就到附近的安国寺焚香默坐，深自省察，物我相忘，身心皆空。与安国寺的方丈继连和尚谈禅，交往甚欢。有一天，他与即将调离黄州的徐太守及继连方丈等人在安国寺的亭下饮茶，有感于太守的为政之德，写下了著名的《遗爱亭记》：

何武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

物而作，物去而复，夫何赫赫名之有哉！

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每岁之春，与眉阳子瞻游于安国寺，饮酒于竹间亭，撷亭下之茶，烹而饮之。公既去郡，寺僧继连请名。子瞻名之曰“遗爱”。

随着禅宗随缘凭命思想的传播、老庄淡泊无为思想的复归，苏东坡的人生态度日趋沉静、旷达和超脱，刚柔相济，进退自如。

苏东坡还是一个养生专家。他对饮食、药膳、保健有非常深的研究，既会写诗又会炖猪肉，不炖则已，一炖就炖出了著名的东坡肉。他将东坡肉的烹调方法和美味写成了一首打油诗：

净洗锅，少著水，柴头罨烟焰不起。待他自熟莫催他，火候足时他自美。黄州好猪肉，价钱如泥土。贵人不肯吃，贫人不解煮。早晨起来打两碗，饱得自家君莫管。

他还有著名的《节饮食说》。为什么要节饮食呢？他自言有三养：

一曰安分以养福，二曰宽胃以养气，三曰省费以养财。

还有《漱茶说》：

吾有一法，常自珍之。每食已，辄以浓茶漱口，烦腻既出，而脾胃不知。

激情创作。黄州优美的山水风景，特殊的人生经历和境遇给了他无穷的创作源泉。问渠哪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谪居黄州期间，苏东坡以挥洒自如的笔力，创造了具有新的生活、新的意境、新的情趣、新的形象的艺术世界，冲破了樊篱和框框，开拓了诗、词、歌、赋、文反映现实的新路，产生了他一生中最为得意之作和辉煌的成果，形成了他一生创作的顶峰。数量上，在黄州写了 753 篇作品，其中诗歌 214 首，词 79 首，散文 457 篇，赋 3 篇，平均每 2 天一篇，每周 3.3 篇。质量上，苏东坡最有影响的作品多产生在黄州。我手上有一本《唐宋八大家文章精华》，收入苏轼作品 26 篇，其中写于黄州的就有 9 篇。

三、苏东坡的文化品格

苏东坡是一个好人：好兄弟，好丈夫，好朋友。

好兄弟。苏轼、苏辙兄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奇观，是中国历史上感情最深的兄弟。苏轼写给苏辙的作品有 104 篇，苏辙和答的有 130 篇。著名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就是苏轼怀念他的弟弟写的。

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无尽的思念，殷殷的祷告，流溢着手足深情。

好丈夫。第一任妻子王弗死后，苏东坡在她埋骨的山头种了3万棵松树苗，把自己的相思化作3万棵万古常青的松树。第二任妻子王闰之陪他宦海沉浮、东奔西走25年后病逝，苏东坡感情重创，誓言生则同室，死则同穴。侍妾王朝云与之生死相依，被视为人生知己。苏东坡有一天吃完饭，摸着肚皮笑着问周围的人，肚子里是什么，周围的人都说：先生一肚子学问。唯有王朝云回答：“学士一肚子不合时宜。”苏轼捧腹哈哈大笑。朝云死后，苏东坡一直鳏居，没有再娶。

好朋友。苏东坡朋友良多，“群众基础”很好。他说：“吾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卑田院乞儿。眼见天下无一个不好人。”他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命运坎坷却矢志不移，身处逆境却不失豁达，生活艰辛却不改乐观，热爱生活，满怀激情，刚正不阿，光明磊落，胸怀坦荡。这是一位多么优秀的先生啊！难怪有一位当代女学者发自肺腑地喊出了她的心声：来生便嫁苏东坡！

苏东坡是一个好官。

首先，他的执政理念“民为邦本”具有现代精神。他的“高考作文”《刑赏忠厚之至论》，就阐述了他的民本思想。他认为民众是国家的根本，要施仁政，帮民富，民众富强，国家就富强了。他说：“位之存亡寄乎民，民之生死寄乎财。故夺民财者，害其生者也；害其生者，贼其位者矣。”如果失去民心，国家就会灭亡。他的执政理念与王安石的变法产生了深刻的矛盾。北宋积贫积弱，王安石想通过变法强国强兵，主要通过强化中央集权，增加财政收入来实现，这就势必与民争利。苏东坡要求国家首先要富民，改革要渐进。

其次是扎扎实实为民办实事。他走到哪里，实事就办到哪里。他办的实事多是水利工程。这也难怪，智者乐水，诗人与水都是有灵性的，是有共同语言的。苏东坡在杭州当通判时，组织民众治理“六井”，建成了杭州“安全饮水工程”。后来当杭州太守，又实施了西湖“综合整治工程”，于是就有了

千百年来让人们津津乐道的苏堤春晓、三潭映月。在徐州当太守时，遇到百年不遇的黄河决口，面对汹涌而至的滔滔洪水，苏东坡果断劝阻富人出逃，指挥民众筑堤护城，奋战70多天取得了抗洪斗争的胜利。我们回忆一下黄冈98年抗洪的情景，就可以想见苏东坡临危不乱的大将风度、应对有方的行政才干。在黄州拯救溺婴。黄州、鄂州一带有溺婴恶习，苏东坡因是罪人身份，“不得签书公事”，就组织社会救婴活动，动员社会捐助，自己带头捐款。在登州只当了5天太守，就做了两件实事，为民请命，请求免除盐税；建立登州水军，巩固登州海防。正所谓“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到了惠州，教农民种田，还把黄州的秧马技术推广到惠州。到了儋州，虽然“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堂，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条件极其艰苦，但还坚持自编教材办教育，培养了海南的第一个进士符确。“琼州人文之盛，实自公启之”。苏东坡为了百姓的利益，不计个人得失和个人安危，奔走呼告，慷慨陈词。他向皇帝上表：“臣顷知杭州，又知颍州，今知扬州，亲见两浙、京西、淮南三路之民，皆为积欠所压，日就穷蹙。”“臣每屏去吏卒，亲入村落。访问父老，皆有忧色。”“孔子曰‘苛政猛于虎。’昔常不信其言，以今观之，殆有甚者。水旱杀人，百倍于虎；而人畏催欠，乃甚于水旱。臣窃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余万虎狼散在民间，百姓何由安生？”这在我们今天看来，他都是一位让人震撼、让人感动的好官啊！

苏东坡是一个全才。

苏东坡集儒释道于一身，医学饮食天文地理皆通，诗词歌赋琴棋书画全能，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全能冠军”。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是个秉性难改的乐天派，是悲天悯人的道德家，是黎民百姓的好朋友，是散文作家，是新派的画家，是伟大的书法家，是酿酒的实验者，是工程师，是假道学的反对者，是瑜伽术的修炼者，是佛教徒，是士大夫，是皇帝的秘书，是饮酒成癖者，是心肠慈悲的法官，是政治上的坚持己见者，是月下的漫步者，是诗人，是生性诙谐爱开玩笑的人。”

文学上，“苏轼文章为天下第一”，苏东坡是万众仰慕的一代文宗。他走一路，写一路；写一路，火一路。一不小心，写出来就是千古名篇；一不小心，就为一个地方做了千年广告。在密州写：“明

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在杭州写“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濛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在庐山写“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在惠州写“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天涯何处无芳草”，“多情却被无情恼。”在黄州，写“一词二赋”，……写景、记事、议论，张口就是好诗妙文；夫妻情、兄弟情、朋友情，说出来就是人间真情。

书法上，北宋四大书法名家：苏、黄、米、蔡，苏东坡排名第一。他的书法代表作《黄州寒食帖》，被称为天下第三行书。第一行书是王羲之的《兰亭序》，第二行书是颜真卿的《祭侄稿》。《黄州寒食帖》原件千回百转，几经周折，现藏于台北故宫博物院。寒食节是清明前一天。苏东坡到黄州后，精神上寂寞痛苦，生活上穷困潦倒，他写道：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
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
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
卧闻海棠花，泥污燕支雪。
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
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
春江欲入户，雨势未止。
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
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
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
君门深九重，坟墓在万里。
也拟哭途穷，死灰吹不起。

《黄州寒食帖》正是在这种心境下写成的。开头几个字写得还很规则，逐渐就挥洒开来，神气充足，跌宕恣肆，飞扬飘洒。苏东坡将心境感情的变化，寓于点画线条的变化中，读来能感受到郁闷、牢骚、悲怆，富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名家评点这幅作品“绵里裹铁”，说它“江河渲泻，放逸不羁；环环相扣，气脉通连；千姿百态，美不胜收；生花妙笔，无二神品”。我们正在建设的遗爱湖公园进门的一块巨石上刻有《寒食帖》，下次大家到遗爱湖公园，不妨在碑刻前伫立10分钟，仔细品味、鉴赏。

中国古人的人格理想，第一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第二是“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这两个人格理想，苏东坡完全全、不折不扣地实现了。苏东坡的一生，不论遇

到多么大的挫折和困难，始终不曾放弃对国家、对百姓的责任感，始终坚持匡时救世的报国之志。苏东坡身上，有李白旷逸超凡的神仙气，有杜甫执着坚守的忠义气，有白居易穷达融通的从容风度，有陶渊明采菊东篱的悠然情怀。他的思想与人格，既是先贤圣哲传承而来的结晶，又是对所有传统的融汇与开拓。所以林语堂先生说苏东坡是“具有现代精神的古人”。他是一个会写诗也会炖猪肉的人。他和我们在一起，他就生活在我们中间。

千百年来，苏东坡备受推崇，是人们心目中永恒的丰碑。今天，在苏东坡经历的16个城市，到处都有苏东坡研究会，到处都有苏东坡纪念馆，到处都在打造苏东坡品牌。苏东坡可以说是妇孺皆知，雅俗共赏。明代董斯张写过一首很搞笑的诗，“大苏死去忙不彻，三教九流都扯拽”。就是说苏东坡死了还很忙碌，到处都拉他作广告，到处都拉他办事。对于苏东坡这么重要的黄州，我们能不说苏东坡吗？我们能不做苏东坡的文章吗？如果我们不说，将是这笔文化遗产的巨大浪费。天下之宝，当与天下共之。杰出的人物也一样，他们并不专属于某个地方，而是属于整个天下的；他们也不专属于某个时代，而是属于整个历史的。

最后我们作一个总体概括。苏东坡是一个乐观主义者，伟大的文艺天才，老百姓最亲密的朋友。他将勤政爱国、关注民生的执着精神，达观自适、超然物外的旷逸气质，热爱生活、诙谐天真的盎然情趣，闲适优雅、从容不迫的潇洒风度完美地结合在一起，终于成就了一个可爱的苏东坡、伟大的苏东坡，成就了一个千百年来在百姓心目中永恒不朽的苏东坡！

（中共黄冈市委副书记、黄冈市人民政府市长）

“赤壁何须问出处”

——中日韩赤壁之游

曾枣庄

内容提要：苏轼明知黄冈赤壁未必是三国赤壁之战的赤壁，真正赤壁之战的赤壁，一般认为在湖北蒲圻县。但苏轼故意把传说当作事实，借以抒发贬官黄州的感慨，所谓“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韩国和日本的文人也把他们国内的不少地方当作赤壁，举行赤壁之游，留下了大量诗文，把东坡赤壁和周郎赤壁联系起来抒发感慨。

关键词：苏轼 赤壁 中日韩

一、“东坡本是借山川”——苏轼笔下的赤壁

苏轼明明知道黄冈赤壁未必是三国赤壁之战的赤壁，其《念奴娇·赤壁怀古》①云：“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乱石穿空，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遥想公瑾当年，小乔初嫁了，雄姿英发。羽扇纶巾、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故国神游，多情应笑我，早生华发。人间如梦，一尊还酹江月。”“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的“人道是”三字表明，他明明知道这只是传说。其《与范子丰》②云：“黄州少西山麓，斗入江中，石室如丹。《传》云‘曹公败所’，所谓赤壁者。或曰：非也。时曹公败归华容路，路多泥泞，使老弱先行，践之而过，曰：‘刘备智过人而见事迟，华容夹道皆葭苇，使纵火，则吾无遗类矣。’今赤壁少西对岸，即华容镇，庶几是也。然岳州复有华容县，竟不知孰是？今日李委秀才来相别，因以小舟载酒饮赤壁下。李善吹笛，酒酣作数弄，风起水涌，大鱼皆出。山上有栖鹘，亦惊起。坐念孟德、公瑾，如昨日耳。适会范子丰兄弟来求书字，遂书以与之。李字公达云。”“传云曹公败所”，也表明苏轼知其为传说。真正赤壁之战的赤壁，一般认为在湖北蒲

圻县。葛立方云：“黄州亦有赤壁，但非周瑜所战之地。东坡尝作赋曰：‘西望夏口，东望武昌，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盖亦疑之矣，故作长短句云：‘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谓之‘人道是’，则心知其非矣。韩子苍知黄州日，闻贼起旁郡，有诗云：‘齐安城畔山危立，赤壁矶头水倒流。此地能令阿瞒走，小偷何敢下芦洲？’遂直以齐安赤壁为周瑜所战之地，岂非因东坡之语耶？”③清张德瀛云：“曹操入荆州，孙权遣周瑜与刘先主奋力拒操，遇于赤壁，操军败走，盖鄂州蒲圻县地。《水经》：湘水从南来注之。酈注谓江水右经赤壁山北，周瑜与黄盖诈魏武大军处所，即此地也。苏文忠《赤壁怀古》词，在黄州作。黄之赤壁，又名赤壁矶，非周瑜所战之地。公词云：‘故垒西边，人道是、三国周郎赤壁。’当日讹传既久，故隐约其辞耳。顾起元《赤壁考》，谓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皆有赤壁。属嘉鱼者，宋谢枋得犹于石崖见‘赤壁’二字。”④

但苏轼故意把传说当作真实，其下所写都是赤壁之战的赤壁。这是苏轼豪放词的代表作，是一篇气壮山河、寄慨万端的作品，充满了作者的美妙理想同可悲现实的矛盾。他本希望像“千古风流人物”和三国时的“多少豪杰”那样建立功名，特别是希望像“公瑾当年”那样少年得志。但是，可悲的现实却是“早生华发”，一事无成，反落得贬官黄州，于是发出了“人生如梦”的哀叹。他的《赤壁赋》（册1，页5—6）有“孟德（曹操）之困于周郎（瑜）”语，也是以传说为真实，借此以抒慨。全赋力图用老庄的听任自然、随缘自适、超然达观的处世哲学来解脱自己贬官黄州的苦闷。作者通过客人“如怨如慕”、“如泣如诉”的洞箫声，引出了主客间关于人生意义的一场对话，实际上都是作者的独白，是

他陷于深沉苦闷而又力求摆脱的矛盾心情的表露。作者通过客人之口说，像曹操这样不可一世的英雄，都被时间的流水洗尽了旧迹（“而今安在哉”），何况自己贬官黄州，已经“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麋鹿”，还能在历史上留下什么陈迹呢？“寄蜉蝣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人生太渺小了，太短暂了！作者又不愿沉浸在这种悲凉的思想中，于是搬出老庄的处世哲学来自我安慰说，要会想，从变的一面看，人生固然短促渺小；但从不变的一面看，“则万物与我皆无尽也”。高官厚禄既“非吾之所有”，就只好“莫取”了；而“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是“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可以尽情享受而又与世无争。这是一种无可奈何的自我安慰，掩藏着难以排解的苦闷。文天祥面临亡国之恨，更能理解苏轼所抒发的“人间忧患”，其《读赤壁赋前后二首》⑤：“昔年仙子谪黄州，赤壁矶头汗漫游。今日兴亡真过影，乾坤俯仰一虚舟。人间忧患何曾少，天上风流更有否？我亦洞箫吹一曲，不知身世是蜉蝣。”正如清人朱日浚《赤壁怀古》所说：“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

千百年来，以苏轼贬官黄州，夜游赤壁为题材的文学艺术作品数不胜数。在数以千计的歌咏赤壁的诗词中，绝大多数都是在歌颂东坡赤壁。后代诗人也将错就错，爱把东坡赤壁和周郎赤壁联系起来抒发感慨。元人陆文圭《赤壁图二首》⑥称苏轼文辞可敌周瑜武功，甚至超过周瑜武功：“公瑾子瞻二龙，文辞可敌武功。却怪紫烟烈焰，不如白月清风。”戴良《题赤壁图》⑦更笑赤壁图不写周瑜的赤壁之战，却写苏轼的赤壁之游：“千载英雄事已休，独余明月照江流。画图不尽当年恨，却写苏家赤壁游。”张之翰《赤壁图》⑧谓正是苏轼被贬，进一步成就了他的文学成就，我们才能读到《赤壁赋》和赤壁词：“战舰烟消几百年，江山风月属坡仙。玉堂果有容公处，二赋何由世上传。”吴师道《游赤壁图》⑨亦谓“横槊”的曹操不如“扁舟”的苏轼：“烧天烈火万艘空，横槊英雄智力穷。何似扁舟今夜客，洞箫声在明月中。”明人方孝孺的《赤壁图赞》⑩说：“群儿戏兵，污此赤壁，江山无情，犹有愧色。帝命伟人，眉山之苏，酹酒大江，以涤其污。”群雄争霸，玷污了赤壁；苏轼的“一樽还酹江月”，才洗涤了赤壁的污迹。方孝孺未必不知道黄冈赤壁并非“群儿戏兵”之地，也不过是

借此抒发对不顾人民死活的群雄争霸的不满罢了。

元、明、清有关苏轼的戏剧约三十种，其中约三分之一也是以苏轼贬官黄州为题材的，如《苏子瞻风雪贬黄州》、《苏子瞻醉写〈赤壁赋〉》（元费唐臣）、《赤壁记》（明黄澜）、《赤壁游》（明许时泉）、《游赤壁》（清车江英）等等。历代的书法家也以临摹或重书苏轼的《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黄州寒食帖》为乐事，历代画家如元代的赵孟頫、明代的唐寅、仇英都画有东坡游赤壁图。明代还有一位民间雕刻家的微雕，在拇指大小的一个桃核上，雕了一只船，船上有东坡、佛印、黄庭坚和两位船工，并刻了前后《赤壁赋》中的名句“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山高月小，水落石出”等字，成为一件艺术珍品。为什么历代的文学家、艺术家这样醉心于苏轼的黄冈赤壁，创作了这样多的文学艺术作品来歌颂苏轼呢？这是因为苏轼“忠而见谤”的不幸遭遇，引起了他们的深切同情；而苏轼贬官黄州期间的高风亮节，更赢得了人们的无限敬仰。

二、“拟把汉江当赤壁”——韩国的赤壁游

10世纪至13世纪，在中国北方相继出现三个少数民族政权，这就是辽（契丹）、金（女真）、元（蒙古）。作为文化相对落后的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都十分注意学习汉文化，明人丘濬有“苏学行于北”⑪之语，主要指金代，但用来概括辽、金、元也未尝不可。元祐初，苏轼的《眉山集》在契丹已广为流传。苏辙出使契丹，在《神水馆寄子瞻兄》⑫中说：“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谈笑卧江湖。”契丹臣僚曾对他说：“令兄内翰（谓臣兄轼）《眉山集》已到此多时。”⑬王辟之说：“范阳书肆亦刻子瞻诗数十篇，谓《大苏小集》。子瞻才名重当代，外至夷虏，亦爱服如此！”⑭金代与“人传元祐之学，家有眉山之书”⑮的南宋并世，受南宋文坛的影响尤深，钱谦益《题中州集钞》说：“自靖康之难，中国文章载籍，捆载入金源，一时豪俊，遂得所师承，咸知规摹两苏。”“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实不尽然。正如《四库全书总目》卷一九〇《御定四朝诗》提要所说：“有元一代，作者云集，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以下，指不胜屈。”苏轼对邻国朝鲜影响更大，最初曾拟以苏轼出使高丽，后因大臣“惜其去”，未能成行，孙觉、

秦观有《客有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大臣有惜其去者，白罢之，作诗以纪其事》^⑥可证。孙诗云：“学士风流异域传，几航云海使南天。不因名动五千里，岂见文高二百年。贡外别题求妙札，锦中翻样织新篇。淹留却恨驾行旧，不得飞觞驻蹕前。”此诗前六句因“朝议欲以子瞻使高丽”，歌颂苏轼文名远扬异域；末二句感叹因东坡守杭，不能与之同饮于驾前。秦诗云：“文章异域有知音，鸭绿差池一醉吟。颖士声名动倭国，乐天辞笔过鸡林。节髦零落毡吞雪，辩舌纵横印佩金。奉使风流家世事，几随浪泊海东岑。”前四句热情歌颂了苏轼对日(倭国)、韩(鸡林)的巨大影响。后四句写“奉使风流家世事”，“节髦零落毡吞雪”指汉代苏武出使匈奴，“辩舌纵横印佩金”指苏秦游说秦国，秦不用，遂游说燕、赵、韩、魏、齐、楚，佩六国相印。“乐天辞笔过鸡林”是以唐白居易诗广泛流传于高丽喻苏轼。据元微之《白氏长庆集序》载，鸡林商人求市白诗甚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百金换一篇，其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秦观此诗作于元祐年间，其实早在元丰年间苏轼已经“辞笔过鸡林”了。元丰间以起居郎杨景略为祭奠使使高丽，苏轼有诗言及，这就是《顷年杨康功使高丽，还，奏乞立海神庙于板桥，仆嫌其地湫隘，移书使迁之文登，因古庙而新之。杨竟不从，不知(王)定国何从见此书，作诗称道不已。仆不能记其云何也，次韵答之》。^⑦

出身高丽名门望族的金覲名其子为金富弼、金富辙，就可看出他对苏轼兄弟的崇拜。徐兢说：“金氏世为高丽大族，自前史已载。其与朴氏族望相埒，故其子孙多以文学进。富弼丰貌硕体，面黑目露，然博学强识，善属文，知古今，为其学士所信服，无能出其右者。其弟富辙亦有时誉。尝密访其兄弟命名之意，盖有所慕云。”^⑧金富弼官至门下侍中，总揽朝政，又是著名史学家，著有《三国史记》，为文坛巨擘。金富辙官尚书礼部侍郎，宣和时出使来华，能四六文。

朝鲜的文臣李荇、朴闾、洪彦忠、南滚等，把汉城东边汉江绝壁(俗称蚕头)设想为中国的长江赤壁，并在那里泛舟，模仿苏轼的赤壁之游。李荇(1478~1534)字拟之，号容斋，朝鲜前期词章派文坛领袖，官至大提学，著有《容斋先生集》。他咏及蚕头赤壁之游的诗较多，其《七月既望之夜，泛舟汉江，玩月有作》^⑨云：“初秋物色自清新，既望孤光愈恼人。拟把汉江当赤壁，何妨壬戌作庚辰。

举樽相属非无客，击楫高吟觉有神。但使年年能办此，不须辛苦学仙真。”因《赤壁赋》有“壬戌(1082)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语，故李荇认为汉江蚕头即可当成东坡赤壁，庚辰(1520)七月既望何妨当成壬戌(1082)七月既望。

《蚕头录》载有他的组诗《弘治壬戌(1502)既望，与朴修撰、南止亭泛西湖，续东坡故事》。其《占韵得语》云：“尚思东坡翁，岁月今几许。胜事偶然同，天地真逆旅。南山自秋气，一凉涤残暑。沧江昨夜雨，薄晚没州渚。击舫白沙汀，洗盏酌灵醕，止亭发新兴，高怀取此叙。挥洒《赤壁赋》，笔力万钧举。……作诗笺天公，更向蚕头去。”

李荇又有《依灵通旧令四首》，其一云：“日暮沙汀风浪生，薄云笼月夜中明。清诗促酒客初醉，急雨鸣江舟自横。赤壁奇游偶同调，黄州妙语得传声。短舫拟向瀛洲泊，不怕沧溟万里程。”其二云：“暝雨催新句，平沙系小筏。江明鱼避影，风急水溅袍。断岸无千尺，沧溟问几篙。忽然成醉梦，过鹤更长噪。”其三云：“胜事惟吾辈，兹游岂偶然？风流传赤壁，人物忆苏仙。夜雨江声急，溟波酒兴牵。他时若不泯，定复几今年。”其四云：“三更微月漏云罅，十里江山皆夜明。坐久杯盘任倾侧，兴来诗语更纵横。不须蚕头邀清影，只合篷窗听雨声。唤得东坡从此去，百年今日是初程。”

其《联句》有“心知《赤壁赋》，不忍负清宵”、“岁是壬戌也，人如赤壁然”、“小酌还须醉，轻舟一任移。苏仙有妙语，此月更君诗”。《同游李永远得近律一篇，有‘今日蚕头吟，当年赤壁游’之句，遂各占韵》则为分韵：“有客仍有酒……万古记壬戌”、“此乐视东坡，未知孰更深。暝雨淡忘返，舟中醉相枕”、“苏仙千载后，胜事略相当。风雨催诗兴，江山发酒狂。百年宁更在，此日可能忘。十月应清绝，重携自雪堂。”

《后赤壁赋》有“是岁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将归于临皋。二客从予”语，李荇《题蚕头录后》甚至说当时不应是“二客”而应是自己与朴修撰陪苏轼游赤壁：“壬戌七月望之既，两君呼我游蚕头。蚕头之游乐难似，夙昔相从无此流。……高言放饮我最颠，乘兴欲唤苏黄州。武昌赤壁在何许，风流得似今日不？前日之月今日雨，天或以此分胜游。两不相兼两不厌，今不为少前不优。黄州有魂还自愧，当时二客非吾侪。”仰慕之情溢于言表。

除《蚕头录》外，还有《后蚕头录》，其《是

岁十月之望，止亭病不赴，呼韵二首》，其一云：“断岸临江千尺高，月光如昼不容毫，……苏仙去后空千载，此日吾侪得更遭。”其二云：“佳境向来唯赤壁，兹游恍亦继苏仙。酒杯相属聊乘快，后世何须二赋传。”

《追忆壬戌之秋，七月既望，与南止亭、朴翠轩蚕头峰下泛舟之游，用张湖南七月十五夜诗韵》（卷八）有“赤壁千载后，胜绝蚕头峰”句，张湖南指张孝祥，其《上封寺》^②起句即“七月十五夜，我在祝融峰”。

朴閤（1479～1504）字仲说，号挹翠轩，朝鲜杰出诗人，官至知制教，因直言极谏，被祸投狱而死。他与李荇、南滚等形成海东江西诗派。著有《挹翠轩遗稿》。他有关赤壁的诗也不少，如《七月既望与士华择之泛舟蚕头下占语韵各赋》、《前年六月二十一日夜，择之与仆同直玉堂，有联句数篇。今年七月同游蚕头还，以联句稿为寄兼长句，还和其韵》、《同游李永元得近律一篇，有‘今日蚕头饮，当年赤壁游’之句，各占韵十首》、《题蚕头录后》、《游蚕头联句五首》。其《十月之望与择之复游蚕头下，占霁韵各赋》云：“缅怀赤壁仙，宇宙了脾睨。豪气之所泄，二赋自凌厉。醉去更高吟，皎月扫蒙翳。”

金昌协（1561～1708）号农岩，安东金氏著名文人的后裔，官至大司丞，著有《农岩集》。他对李荇和朴閤的蚕头之游十分羡慕，其《蚕头》诗云：“朴李蚕头兴，朱梁砥柱游。百篇天地在，一水古今流。文苑谁为继，皇华不可求。无人语此事，把酒问沙鸥。”李荇和朴閤等海东江西诗派，模拟苏轼赤壁之游，形成蚕头赤壁之游，使后代文人墨客更加重视苏轼的《赤壁赋》，并在各地形成赤壁游的民俗，如大邱的花园赤壁和安东的芙蓉台赤壁之类。

三、“清风白月无今古”——日本的赤壁游

日本文人为纪念苏轼的赤壁之游及其所撰的前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常开赤壁会并撰写纪念诗文。与韩国一样，日本的赤壁也不止一处，东京千代区神田川的对岳台，大阪市都岛区的樱宫，京都宇治市的菊屋，都举行过赤壁会。在日本的不同时代都举行过赤壁会。日本中央大学教授池泽滋子的《日本的赤壁和寿苏会》^③收集了

《与乐园丛书》卷一五及其他日本人所作的赤壁诗。

（一）宽政十二年（1800）的赤壁会

宽政十二年（1800）十月，柴野栗山（1736～1807）在他居住的对岳台举行赤壁会，以《庚申十月望，栗山堂会诸子，便题后赤壁图，分“江流有声，断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之字为韵》为题，古贺仆、仓成埜、赤崎祯幹、辛岛宪、万波俊忠、桦公礼、赖惟柔等人皆有诗。

（二）享和二年（1802）的赤壁会与“小赤壁”

享和二年壬戌（1802）十月十五日，柴野栗山再次举行赤壁会，角田简的《续近世丛语》云：“柴野栗山常钦慕苏公，每岁十月之望，置酒，会客，以拟赤壁游。”又云：“壬戌夕会诸名士。白川越中侯闻之，寄书遗鲈，以求坐客诗。栗山使肥后辛岛井为之记。一时传写以为雅举。”当时有一客人携一块石来，栗山一见激赏，名以小赤壁，并援笔赋《小赤壁》古调一篇。醉墨纵横，一坐竦动。来客以为赠己而拜之，栗山也拜其石曰：“此吾家之物也。”遂收之。当天，柴野栗山有《壬戌岁十月之望，白川源公置酒继赤壁游，闻彦家亦例以此夕宴，诸友嘉之，以赐鲈鱼一头，举“风清月白”句，以征诸客诗，分韵得寒二十二韵》诗。

关于“小赤壁”，赋咏颇多。后来赖春水的儿子赖山阳写一篇《小赤壁记》，谓仓成翁自羽州至，获一石于五色洞，耸拔嵯牙，峰峦尽具。是夜示柴野栗山先生。先生诧曰：“是小赤壁也。来临吾会，宜为吾有。”就手夺之，遂作长句歌之。座客皆和，一时传以为佳话。佐藤一斋《小赤壁记》一文感慨道：“诸名家咏赞揶扬其美者，不下数十人。顾夫黄州之壁，断崖千尺，且不过前后赋。而此甚么之块，乃累数十篇未已，何以邪？其意或者以其不在物之耽恋，而在于人之缱绻乃尔也欤！夫后人之尸祝先哲，作肖像以奉之。至其肖不肖实不必论，而一惟吾心以肖之而已。今此一块石，吾不知其状之与彼崖果相肖乎否也。然而苏公赤壁游，梦想难觅，必求其彷彿焉者以致缱绻，亦惟以吾心肖之。则此无乃为赤壁之肖像乎。”不在对赤壁的耽恋，而在于人们对东坡的缱绻，这就是“咏赞揶扬其美者，不下数十人”的原因。

（三）享和三年癸亥（1803）的赤壁会

享和三年癸亥（1803）的赤壁会，有古贺精里《癸亥十月望三近堂集得脱字》，辛岛盐井《得见

字》二首，磐濂行言《得在字》，仓成善卿《得露字》、赖杏坪《得霜字》诗。赖杏坪的诗有跋：“客冬今夜，携儿辈，游于广岛西溪。”还有磐濂行言的《癸亥十月望，栗山先生对岳台，陪饮诸先生继苏老之游例也》诗。

（四）文久二年壬戌（1862）的赤壁会

此前日本连续发生重大案件，举世骚然，但也有举行赤壁游的风流人士，贯名菰翁（海屋）门人池内陶所（1814~1863）的《前赤壁集字诗十二律并引》：“今兹文久二年壬戌七月既望，距苏游之岁十有四壬戌而七百八十有一年矣。阪上大业（1810~1867）、要澈云师、薮长水、泽春畊及余，泛舟淀上（流入大阪湾的淀川）以修故事，实人生罕觐之嘉会也。因思余曾以事南迁，于今四年。幸有江山之胜而觐此嘉会、岂可默止哉。乃集《赤壁前赋》中字，得七律十首以记其事，亦仿坡公《归去来》集字体也。惟是局于字数，不免冗复。读者莫笑雷同而可。”又有《后赤壁赋集字诗十五律并引》：“是岁十月之望，适月食过昏而明反，儿基趋进曰：‘大人既有前游，宁可无后游乎？月白风清，如此良夜何！’余额而笑，遂拉基及两生买舟游樱祠（即樱宫，在大阪市），以续嘉会。免归篝烛，复集后赋字作五律十首。基读之曰：‘后赋全三百五十七字，今其不经用者仅数十字耳。愿请不遗一字用之则何如？’因贾余勇，悉填其字，更附五首，亦是蛇之添足、狗之续尾耳。”

田能村直入（1814~1907）举行大陂青湾茶会，在《青湾茶会图录》的序文中说，此茶会是为了纪念日本煎茶始祖卖茶翁高游外（1675~1763）逝世一百周年举行的。偶然碰到文久二年壬戌。因此序文的最后一行有“赤壁前游后三日识于青湾茶寮之北窗下”语，四月茶会的第六副席是《赤壁社》，写有“清风徐来赤壁社”七个字的旗帜，在图录中有“四面无尘机自休，大船舣得泛中流，认将旗号人皆悦，便是今年壬戌秋”诗。七月茶会第五席匾额上写“嗣彪画赤壁前游图”墨本，用《晚香堂苏帖》。此席的图录中有《赤壁二赋》的集字诗。

（五）大正十一年（1922）的赤壁会

大正十一年（1922）九月七日，正值八百四十年以前即宋神宗元丰五年壬戌七月既望，东坡前赤壁游，撰《前赤壁赋》之时，非常景仰东坡的长尾雨山在洛南宇治（在京都），把天下文人墨客集合在一起，展出有关东坡赤壁游的书画，把宇治川当作

赤壁泛舟处，举行纪念活动。定名为“赤壁会”。其请帖云：“今年正值东坡赤壁游后第十四次壬戌，因此招募志同道合的人，想在九月七日即阴历既望在洛南宇治清溪泛舟，与文雅诸贤追拟当年的仙游。”这天大概聚集了二百左右的文人墨客。当天使用的茶具是中国式的，提供的茶是从东坡当过太守的杭州送来的龙井茶，酒是中国名酒绍兴酒。充满中国情趣。

长尾雨山（1864~1942）是位最狂热的“东坡迷”。富冈铁斋（1836~1924）也是位“东坡迷”。他的生日和苏轼一样，是十二月十九日，因此他爱用“东坡同日生”、“东坡癖”的印章。在长尾雨山赤壁会上，陈列着奥村竹亭（1873~1927）刻的赤壁赋印九十六枚及印谱。开会以前，长尾雨山在《京都日日新闻》和《（大阪）每日新闻》上说：“这次宇治的雅会，不只是一天的闲游，而是期待给艺苑以刺激，回忆古人的风格与名文的来历，怀念永垂不朽的伟大高尚人物东坡先生，给只追求名利的社会以一副清凉剂。”内藤湖南也在报上说：“在那附近有五个称‘赤壁’，东坡自己也说有三个‘赤壁’。学者争论那个地方是否是古战场，但如果东坡听到的话，或许嘲笑学者的曲解。因此借东坡的想法来看，即是东坡的‘赤壁’在黄州，我们的‘赤壁’在宇治也无所谓。”这与清人朱日浚《赤壁怀古》所说的“赤壁何须问出处，东坡本是借山川”是同一意思，也可说是韩国、日本的赤壁诗的共同主题。如万波俊忠的《后赤壁图》说：“楼上芳醪斗十千，盘中银鲙细鳞鲜。清风白月无今古，何必江流夜半船。”“赤壁何须问出处”是说赤壁可不问地方，“清风白月无今古”是说赤壁之游可不问时间。

（六）有关赤壁会的诗文

前面已经举到一些赤壁会的诗文，这里再作一些补充。或谓今日之景正似当年苏轼赤壁夜游之景，如候田鹏斋《壬戌九月泛舟台下拟赤壁游》：“正是今兹壬戌岁，长江依旧有声流。山鸣谷应当年啸。月白风清此夜游。遗垒高临千尺岸。沉钟空咽九重湫。霜天四顾夜将半。孤鹤横空掠小舟。”

或谓应像苏轼那样超脱，无需为当前处境烦恼：“白露横江江色和，苇间一棹乐如何。须臾方上长空月，窈窕徐凌万顷波。物象遗来无主客，杯盘接待有鱼虾。洞箫不用托悲响，笑正风襟饮且歌。”“是非消尽方遗我，哀乐何为更问天。相与目中空一世，斯游安得不遽然。”

或叹物是人非，景似当年苏轼所见之景，而再也见不到苏轼其人：“渺茫不有水波兴，棹泝长流天可登。明月清风共舟酌，浩歌舷饮扣舷凭。江山为赋人安在，壬戌遇秋吾未曾。况是樽中盈美酒，雄怀何必羡兰陵。”

或谓东坡赤壁远胜周郎赤壁：“与客泛舟舟自孤，秋光洗得酒怀苏。横天一水长清虚，在望千山方郁乎。入海风波游何止，世间声色有如无。怀须游乐寄明月，笑彼旌旗接触舻”；“江明山色在苍茫，仙桂光清接水光。自是风流美苏子，何须雄主羡周郎。”

或谓有了东坡赤壁，人们就对周郎赤壁没有兴趣了，市河宽斋(1749~1820)的《题东坡赤壁图》云：“孤舟月上水云长，崖树秋寒古战场。一自风流属坡老，功名不复画周郎。”这与我国明人文征明(1470~1559)《题画》②的“秋清山水夜苍苍，月出波平断岸长。千古高情苏子赋，东风谁更说周郎”有异曲同工之妙。

当然日本也有不以《赤壁赋》为然者，如古贺洞庵(1788~1847)《〈赤壁赋〉多瑕疵》，一谓其体裁不类赋：“赋者，诗骚之变，以丽则为主，体与序、论迥殊。至长卿(司马相如)《上林》，孟坚(班固)《两都》，江文通(淹)《恨》、《别》之属，仄赋家窠臼，驰骋变化，别创机轴，然未尝自外于成法。东坡二赋出，荡焉决坏大防，直是押韵之序、记，且也寒瘦萎茶，全失词人丽则之妙，不足算已。然而后人眩苏盛名，多推崇之。果尔，则属文不必辨体，不必守矩矱，猖狂妄作，惟意所欲……人必知二赋之陋，然后始可与语赋矣。”二谓其字句亦有瑕疵：“予不甚爱东坡赤壁二赋，尝作文以驳之，然特论其体裁不类赋耳。今玩其字句，亦未免瑕疵。后赋曰：‘履巉岩，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龙，攀栖鹖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不知所谓虎、豹、虬、龙者，果何所指。若以为真虎、豹、虬、龙，则之四物非可踞可登之物；若谓之乌有冯虚，姑借以形容遗世欲仙之态，则前后文势枯淡坦易，不过平叙眼前所有，忽插入此怪奇语，不止小疵。故注者解‘踞虎豹’曰，石类虎豹之状，踞而坐其上；解‘登虬龙’曰，古木有类虬龙者，攀而登其上。亦巧于回护。然吴曾《能改斋漫录》曰：‘东坡谪居于黄州五年，赤壁有巨鹖，栖于乔木之上，后赋所谓‘攀栖鹖之危巢，俯冯夷之幽宫’是已。’是真有栖鹖之巢矣。今案：江为冯夷窟宅，只临江水，

便是‘俯冯夷之幽宫’也。是实事，非譬喻。栖鹖冯夷，明明叙实，而上二句，属入譬喻，支离破碎，岂成文章乎？大抵作文至力尽思枯处，必有是破绽，在于初学，往往不免，不意坡之老于文而犹有此也。

论文注释：

① 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版，第398页。

② 《苏轼文集》卷五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4册，第1452~1453页。下引苏文只括注册页。

③ 《韵语阳秋》卷一三，四库全书本。

④ 《词徵》卷一《赤壁讹传》，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册，第4159页。

⑤ 《文山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

⑥ 《墙东类稿》卷二〇，四库全书本。

⑦ 《九灵山房集》卷一七，四库全书本。

⑧ 《西岩集》卷一〇，四库全书本。

⑨ 《礼部集》卷九，四库全书本。

⑩ 《逊志斋集》卷一九，四库全书本。

⑪ 《大学衍义补》卷六六，四库全书本。

⑫、⑬ 《栾城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版1987年版，第1册卷一六第398页、第2册卷四二第937页《北使还论北边事札子》。

⑭ 《涪水燕谈录》卷七，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9页。

⑮ 宋孝宗《宋赠苏文忠公太师敕》，《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卷首，四部丛刊本。

⑯ 《淮海集》卷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347、349页。

⑰ 《苏轼诗集》卷三六，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1938页。

⑱ 《宣和奉事高丽图经》卷八《人物》，四库全书本。

⑲ 本节所引韩国赤壁的资料均见曾枣庄等《苏轼研究史》第九章洪瑒钦撰《拟把汉江当赤壁》，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571~620页。

⑳ 《于湖集》卷四，四库全书本。

㉑ 池泽兹子《日本的赤壁和寿苏会》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本文有关日本赤壁会的资料均据此书。

㉒ 《甫田集》卷五，四库全书本。

(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

《雪堂记》与苏轼 黄州“适意”的贬谪生活

杨胜宽

内容摘要：《雪堂记》中围绕“散人之道”和“藩外之游”的主客论难，不仅表明了苏轼黄州贬谪时期对道家思想的选择性接受，而且体现了他“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的人生观与生活态度；黄州之贬，使苏轼在面临人生失意的生存逆境，经历“适”与“不适”的痛苦熬炼之后，最终找到了“适意”的生活方式与人生乐趣，确立了与“旧我”不同的生活方向与价值观，体现了中国传统文人从“失意”到“适意”的艰难抉择与生存智慧。

关键词：《雪堂记》 黄州之贬 仕途失意
“适意”人生 生存智慧

在苏轼谪居黄州四年多的时间里，其仕途、人生与创作都出现了巨大变化，随着人生观和生活方式的转变，他的创作进入了一个质量与境界突变的黄金期，对此，学术界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在此期间写作的不少名作，脍炙人口，得到了研究者的充分关注与高度评价。但其元丰五年（1082）写作的《雪堂记》，却较少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文章所透露的苏轼黄州贬谪时期的思想、情感与心境，尚未得到深入的剖析。基于此，本文对《雪堂记》的写作与苏轼黄州“适意”人生的相关话题，作一专门探讨。

一、苏轼的黄州谪居人生：在“适”与“不适”之间熬炼

苏轼因为“乌台诗案”于元丰二年（1079）十二月下旬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次年（1080）正月初一即起身踏上了奔赴贬所的旅程。经过淮河时诗人作《过淮》诗，其中有句云：

黄州在何许？想像云梦泽。

吾生如寄耳，初不择所适。

但有鱼与稻，生理已自毕。^①

毕竟苏轼还没有面临真实的谪居环境，似乎他对未来生活的困难与痛苦还缺乏足够的心理准备，诗中所谓“初不择所适”的达观，更多地表现为在物质需求与生活条件的层面考虑问题，然而事实上他所期待的维持生计必要的“鱼”与“稻”，并不能完全满足他及家人的基本要求；而苏轼真正将要接受考验的，更在于精神生活层面，特别是心理与情感方面。经历一个月的行程，苏轼于二月初抵达黄州，寓居于僧舍定惠院。观其《初到黄州》、《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二首）、《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等诗词，可以看出苏轼初步体验谪居生活的矛盾心态。《初到黄州》“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二句^②，“知”、“觉”二字用得十分巧妙，既恰当地表达了苏轼战胜谪居物质生活困难的乐观与决心，又告诉读者他对新的贬谪生活环境所形成的总体印象；而《定惠院寓居月夜偶出》其二所谓“饥寒未至且安居，忧患已空犹梦怕”^③，《寓居定惠院……》所谓“只有名花苦幽独”、“天涯流落俱可念”^④，《卜算子·黄州定惠院寓居作》所谓“惊起却回头，有恨无人省，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⑤，则明显透露出诗人遭受政治打击之后远未平复的心理恐惧与巨大的情感苦痛。这种外在对物质环境的容易适应与内在对心理创痛的长期不适感，将伴随苏轼的黄州谪居生活。

在苏轼初到贬所一个月所作的近二十首诗中，从内容上看，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于时令

与自然景物的敏感。《安国寺寻春》、《黄州春日杂书四绝》、《次韵乐著作野步》、《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海棠》等诗具有一个共同表达特点，即在对春天自然美景的欣赏赞美之中，都不同程度地流露出诗人触景生情、感物伤怀的内心苦痛，并借物喻怀，表明自己刚直峻洁、孤芳自赏的人格操持，如《黄州春日杂书四首》其二：

中州腊尽春犹浅，只有梅花最可怜。

坐遣牡丹成俗物，丰肌弱骨不成妍。^⑥

又如《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云：“江城地瘴蕃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满山总粗俗。也知造物有深意，故遣佳人在空谷。”诗人借海棠、佳人自喻，寄慨深微。清人纪昀评此诗曰：“纯以海棠自寓，风姿高秀，兴象微深，后半尤烟波跌宕。此种真非东坡不能，东坡非一时兴到亦不能。”^⑦事实确实如此，非此时此境此情的苏轼，也写不出这般意味的诗篇。

二是对于佛、道二教的兴趣及其努力为心灵寻找皈依的尝试。《安国寺浴》、《次韵乐著作天庆观醮》、《定惠院颺为余竹下开啸轩》、《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至乾明寺前东岗上归二首》等，均是他往来佛寺道观的记录，这些诗多表达诗人对于人生挫折和荣辱得失的思考，如《安国寺浴》：

老来百事懒，身垢犹念浴。

衰发不到耳，尚烦一月沐。

山城足薪炭，烟雾蒙汤谷。

尘垢能几何，翛然脱羈梏。

披衣坐小阁，散发临修竹。

心困万缘空，身安一床足。

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

默归毋多谈，此理观要熟。^⑧

笔者把苏轼到安国寺礼佛和洗浴作为其人生观开始转变的具有象征意义的标志性事件，在《苏轼“适”的人生境界之形成与表现特征》一文中对此诗作过专门分析，认为苏轼“一旦从长期困扰自己的名利追逐中解脱出来，人生其实是与过去所看到的完全不同的情景。这种顿然觉悟，对苏轼认识过去和思考未来，都至关重要。”^⑨诗中“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二句，清楚道出了安国寺洗浴不只是洗去身上的尘垢，而且决心祛除过去思想上荣辱差别对人生的羈梏，从而获得披衣散发、闲窗赏

竹的潇洒与适意。

一方面是面对时令景物的触景伤感，另一方面是借助宗教活动来调整人生观念和生活方式，这的确就是苏轼初到黄州的矛盾心态，致力于后者的目的，也在于极力排解内心的苦闷，慰藉伤痛的心灵。元丰三年（1080）岁末，苏轼写给秦观的一封书信，其中有云：“吾侪渐衰，不可复作少年调度，当速用道书方士之言，厚自养炼。谪居无事，颇窥其一二。已借得本州天庆观道堂三间，冬至后，当入此室，四十九日乃出。自非废放，安得就此。太虚他日一为仕宦所縻，欲求四十九日闲，岂可复得耶？当及今为之。……但满此期，根本立矣。此后纵复出从人事，事已则心返，自不能废矣。”^⑩天庆观四十九天的闭关“养炼”，粗看似乎主要出于强健身体的考虑，但仔细品味，乃是为了确立人生价值观这一“根本”。立足于这种人生态度，其价值取向与生活方式已经与过去完全不同，诚如他信中说的：一旦这种人生观确立以后，他日即便再回到官场，“事已则心返”，不再把追求官场名利和地位作为人生目标和实现生活价值的抉择依据。这种“根本”性的人生态度转变，在苏轼四十余年的人生中，是最大和最彻底的一次。

然而，苏轼毕竟是一位情感丰富、热爱生活的诗人，他不可能只在宗教活动中讨生活，宗教思想与活动从来都只是他取其所需的调节工具，他始终没有接受宗教仪范并成为虔诚的信徒。况且借助宗教思想改变自己的人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成功以后，他对世界的认识与对生活的体验已经有了很大不同。这就有如禅宗“公案”中所谓由“看山是山”经历“看山不是山”再回到“看山是山”完成顿悟过程一样，原先令人触景伤怀的时令与景物，逐渐成为苏轼安之若素、怡情适性的美景良辰，他更加能体验生活的平淡与乐趣，人生的从容与洒脱。他在黄州贬谪生涯中能够进入文学艺术创作的黄金时期，写下如此丰富的文学名作，原因正在于此。

虽然苏轼在初到黄州的数月之中就基本实现了其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巨大转变，但要完全消除重大人生打击在其心理上的深重创痛，或者从此让他百事不闻不问的闲散之人，其实不会是后人想象那么容易的。除了人生观和生活态度的根本转变本身十分艰难以外，有时候内心自我调适会因外在的某些触媒的感动而出现反复，对于像苏轼这样多情而敏感的诗人而言，尤其如此。比如元丰四年

(1081)十月,宋将种谔在陕西米脂与西夏战于定川,斩俘数万,大获全胜。苏轼从好友陈季常的书报中得讯,他欣喜异常,情不自禁,写下了《闻捷》和《闻洮西捷报》两诗,《闻洮西捷报》云:

汉家将军一丈佛,诏赐天池八尺龙。
露布朝驰玉关塞,捷烽夜到甘泉宫。
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
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回春容。①

他还写信向滕甫(字达道)打听消息:“平生学道,专以待外物之变。非意之来,正须理遣耳。……黄当江路,过往不绝,言语之间,人情难测,不若称病不见为良计。二年不知出此,今始行之耳。西事得其详乎?虽废弃,未忘为国家虑也。此的信,可示其略否?”②从诗和信可以看出苏轼对“国家”大事的高度关注,他明明知道这样难免会惹来过往黄州那些别有用心的人制造不利于他的“言语”,但他的本性和对“国家”的忠诚,决定了他在此事面前不能无动于衷,观其“放臣不见天颜喜,但惊草木为春容”的诗句,苏轼五味杂陈的心情可想而知。他为了取消物我、进退、是非、忧喜的种种差别,才在人生的逆境之中潜心“学道”,但“非意”之事不时来袭,不断冲击着他追求内心世界空寂淡定的“防火墙”,使他的平淡生活和平静心境,经受着考验与煎熬,这种“适”与“不适”的情感拉锯,在他谪居黄州的四年多时间里,没有有与无的区别,只有程度不同的差异。

二、《雪堂记》的立意与苏轼黄州的“适意”生活

《雪堂记》又名《雪堂问潘邠老》,作与元丰五年(1082)正月。文章采用主客问答的方式展开,讨论的是作者的处世之道,即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问题。关于雪堂的修建及这一阶段的生活状态,苏轼在与亲人、朋友的通信中数次提及。《与子安兄尺牋》云:“近于城中得荒地十数亩,躬耕其中。作草屋数间,谓之东坡雪堂。种蔬接果,聊以忘老。”③《与李公择尺牋》:“喻养生之法,虽壮年好访问此术,更何所得!然比年流落瘴地,……大约安心调气,节食少欲,思过半矣。余不足言。某见在东坡,作陂种稻,劳苦之中,亦自有乐事。有屋五间,果菜十数畦,桑百余本。身耕妻蚕,聊以足岁也。”④筑雪堂,躬耕东坡,可以说是苏轼谪居黄州两年

的一种新的生存方式。过去寓居定惠院,过的是一种“寄食”生活,这不仅与他初至黄州的具体情形有关,也与寺庙具备让他寄食的条件有关。但寺院的“避难所”没能成为苏轼永久的栖身之地。三个多月后,他从定惠院迁居临皋亭,失去了在寺院“随僧蔬食”的生活依凭,不得不面临一家人的生计问题。《迁居临皋亭》诗,突出表达了诗人所意识到的生计困难:

我生天地间,一蚁寄大磨。
区区欲右行,不救风轮左。
虽云走仁义,未免违寒饿。
剑米有危炊,针毡无稳坐。
岂无佳山水,借眼风雨过。
归田不待老,勇决凡几个?⑤

“蚁寄大磨”的处境,比喻自己与时乖违、无力驾驭命运之舟的困顿;“剑米有危炊,针毡无安坐”二句,则极言其寒饿穷困、如坐针毡的严重程度;与此相比,临皋亭四周的美丽山水,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变得无足轻重了。苏轼的家眷共计二十余口,将由弟弟苏辙送来,一大家人的未来生计,的确成为苏轼伤脑筋的头等大事。他在写给朋友王巩的信中,即流露了这样的巨大苦恼:“平生不营生计,贱累将至,何所仰给!须至远迹颜渊、原宪,以度余生。”⑥

正是迫于解决一大家人的生计困难,他才接受了好友马梦得(子正卿)的帮助,后者为他向地方长官请得城东坡数十亩荒地,让他开垦耕种,开始了躬耕劳作、自食其力的生活。这种生活,对于苏轼而言,感受是相当复杂的。一方面,如他在《东坡八首》的序言中所说:

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释耒而叹,乃作是诗,自愍其勤,庶几来岁之入以忘其劳焉。⑦开垦荒地,艰辛劳动,对于一个从小习惯了士子生活的人来说,非常不容易。不仅体现为身体上“筋力殆尽”的劳累,更反映在受人怜悯和恩赐的沉重心理负担。但另一方面,能够通过自己的劳动改变一家人的生活困境,特别是用辛勤的劳动证明自己还有自食其力的生存能力,对于他确定未来的生活方式和人生价值观念,又具有异乎寻常的重要意义。

苏轼在文中交代说，建于东坡之肋的雪堂，因修建时正逢下雪，所以在其四壁绘满了雪景，故名之。他描述初次入住的感受时写道：“起居偃仰，环顾睥睨，无非雪者。苏子居之，真得其所居者也。苏子隐几而昼瞑，栩栩然若有所适。而方兴也，未觉，为物触而寤，其适未厌也，若有失焉。”^⑧在这段话中，苏轼两次用了“适”字。究竟是四壁描绘的雪景让他感到特别适意，还是起居无时、惟意所适的闲散生活状态？苏轼一则说“栩栩然若有所适”，再则说“其适未厌”，这个看似互相纠结、难以区分的问题，其实在苏轼的心里也难以确切回答。为了给后文的主客问答深入理论埋下伏笔，他要一步步解析由浅入深、从表及里的认识与“觉悟”的过程。

以下便设为主客问难的行文形式，深入辩论彼此人生观与生活方式的异同问题。客人首先责难“苏子”说：“子世之散人耶，拘人耶？散人也而天机浅；拘人也而嗜欲深。今似系马而止也，有得而有失乎？”“客人”把苏轼现在的黄州贬谪比喻成不能自由奔跑的“系马”，这对于他的未来人生选择而言，究竟是“得”还是“失”？显然，如果按照世俗（即所谓“世之拘人”）的人生价值观，像苏轼遭遇的贬谪，是士大夫仕途上的沉重挫折与打击，是严重的“失”。但如果按照“世之散人”的价值观念，脱离官场是非之地，从人生无尽的欲望中解放出来，不受拘束地过一种闲散自由的适意生活，那么，其黄州之贬就是选择未来生活方式的重要契机和难得机会，自然不是“失”而是“得”了。在苏轼对“客人”的问题“徐思其应”的时候，“客人”似乎看出了“苏子”的内心矛盾与彷徨，不待其答，接着说道：“是矣，子之欲为散人而未得者也。”这个观察与判断颇值得回味。首先，“客人”排除了苏轼按照“世之拘人”的价值观安排未来人生的可能性。表明无论是否出于情愿，苏轼都已经改变了原先信守的世俗人生价值观，因为现实已经没有了让他实现其原定的人生理想目标的条件，他必须调整人生方向和道路，选择不同于世俗价值的取向和人生观。其次，当他选择“世之散人”的生活观念与方式时，其内心是矛盾的，甚至带有一定痛苦。所以在“客人”看来，他处于“欲为散人而未得者”的状态，表明他对真正的“散人”之道，在领悟和践行时，犹隔一间。所谓“散人”之道，其实就是两个要点：一是“散其智”。按照老

庄的哲学观点，人世的许多争执和分别，人生的许多纠葛与苦恼，均缘于人的智虑。去除了人的智虑，一切苦恼、纷争与差别，就会自然消除。二是“远其名”。名与利不仅是人产生欲望、引起苦恼的根源，也是人与人争斗、互相算计的根本原因。“愚者起而惊，智者起而轧”，一天不远离名和利的纠缠，人的苦恼和人际间的纷争就一天不会停息。“客人”批评他说：“名之于人，犹风之与影也，子独留之。”认为苏轼的人生灾难，就是缘于求名的欲望。想当初苏轼在刚被贬黄州团练副使时，曾写下“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的诗句，^⑨而今两年过去，看来名利对他的困扰，并没有完全消除。

文章接下来继续围绕“藩外之游”进行争论。在苏轼看来，他被远贬蛮荒，自外于士大夫之列，不再参与政治和权力的纷争，已经完全成为“藩外之人”。但在“客人”看来，这远远不够，离真正的“藩外之游”还有很大距离：“夫势利不足以为藩也，名誉不足以为藩也，阴阳不足以为藩也，人道不足以为藩也。所以藩予者，特智也尔。”无论“散人之道”还是“藩外之游”，根本都在于离名去智，消除人的欲望与智虑。“客人”再进而对雪堂的修建及其命名提出批评：“子之适然也？适有雨，则将绘以雨乎？雨不可绘也，观云气之淘涌，则使子有怒心。风不可绘也，见草木之披靡，则使子有惧意。睹是雪也，子之内亦不能无动矣。苟有动焉，丹青之与靡丽，冰雪之与水石^⑩，一也。”在“客人”看来，苏轼在雪堂四周绘以雪景，希望达到怡心适意的效果，是用其智巧的表现，不仅是枉然的，而且是危险的。

在以上的主客辩难中，“客人”始终处于攻势，频频发难，一步紧似一步地责难苏轼的处世之道，不符合老庄离神去智、等齐是非、逍遥于世俗之外的思想原则；“苏子”则处于守势，不仅经受批评和责难，而且总是表现为一个充满苦闷和矛盾、没有彻底觉悟的角色。明眼人知道，这是此类主客论难体文章的立意需要，目的是为了最后揭示主人的“正意”，为文章在蓄势充分以后的点题，做足腾挪跌宕的工夫。

苏轼在转守为攻的答客难中，系统阐述了他建雪堂、观雪景及选择如此生活方式的道理：

子以为登春台与入雪堂，有以异乎？以雪观春，则雪为静。以台观堂，则堂为静。静则

得，动则失。黄帝，古之神人也，游乎赤水之上，登乎昆仑之丘，南望而还，遗其玄珠焉。游以适意也，望以寓情也。意适于游，情寓于望，则意畅情出，而忘其本矣。虽有良贵，岂得而宝哉！是以不免有遗珠之失也。虽然，意不久留，情不再至，必复其初而已矣。是又惊其遗而索之也。余之此堂，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人而有知也，升是堂者，将见其不溯而僇，不寒而栗，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彼其趑趄利害之途、猖狂忧患之域者，何异探汤执热之俟濯乎？子之所言者，上也。余之所言者，下也。我将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譬之厌膏粱者，与之糟糠，则必有忿词。衣文绣者，被之皮弁，则必有愧色。子之于道，膏粱文绣之谓也，得上者耳。我以子为师，子以我为资，犹人之于衣食，缺一不可。^①

在这一长段议论中，苏轼首先阐明登春台的“实”游，与观雪（堂图）景的“神”游，在“适意”、“畅情”上，是没有区别的，都能达到同样的目的。既然如此，他就没有必要选择“动”的实游，而是更喜欢“静”的神游了。其次，基于这样的道理，他造雪堂、绘雪景，可以“追其远者近之，收其近者内之，求之眉睫之间，是有八荒之趣”，既有静卧雪堂之内、神游八荒之表的乐趣，又有“凄凛其肌肤，洗涤其烦郁，既无炙手之讥，又免饮冰之疾”的功效，是最适合自己处境与情趣的事情了，夫复何求呢？再次，他明确指出，自己选择的人生观与生活方式，别人也许认为不完全符合老庄哲学所提倡的齐万物、等是非而超然于尘世之外的“散人之道”或“藩外之游”，但是，他的选择，恰恰在于没有割断与世俗或现实的直接联系，虽然遭受重大人生挫折，但他仍然热爱生活，关注现实，对未来充满希望，所以他把“客人”所言，称为道之“上”者，而他自己所行，卑称为道之“下”者。然而，苏轼意味深长地指出：“我之能为子之所为，而子不能为我之为矣”，他一反古语所谓“取其上者得其中，取其中而斯为下”的原意而用之，申明要行“散人之道”，作“藩外之游”，对他而言，非不能也，是不为也。在他看来，处世之道的真正难处，是当人生处于逆境之中时，不怨天，不尤人，不气馁，不绝望，处身尘俗之中，能够心游万物之

表，保持内心的宁静与愉悦，构筑“适”于自己意趣的精神王国和思想乐园。如他在文章中所说：“是堂之作也，吾非取雪之势，而取雪之意；吾非逃世之事，而逃世之机。吾不知雪之为可观赏，吾不知世之为可依违。性之便，意之适，不在于他，在于群息已动，大明既升，吾方辗转，一观晓隙之尘飞。”——这就是他在《雪堂记》中着力阐明的黄州贬谪时期的人生观和生活态度，也是文章最重要的主旨。

三、中国传统体制的士人宿命：从“失意”到“适意”的抉择与转换

余英时在《士与中国文化》一书中认为，中国历史上的“士”，在两千多年的社会变化发展中，随着政治、经济的阶段性发展而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最重要的差异体现在秦王朝建立封建专制体制时，士在先秦是“游士”，秦汉以后则是“士大夫”。^②其面貌变化的主要特征至少反映在两个方面：一是士人对专制政治的依存性，二是士人的官僚色彩。二者都表明了士人与中国专制政治体制日益紧密的共生共荣关系：即士大夫在中国两千多年的专制政治体制的形成与巩固过程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与此同时，历代士大夫的前途命运也越来越紧密地与专制政体血肉相连。

然而，历史的曲折性与政治的复杂性，决定了士大夫个体与历代封建专制王朝的命运并不都是“正相关”，无论是血雨腥风的改朝换代，还是明争暗斗的名利角逐，都足以让某些士大夫命运逆转，人生多舛。并且随着封建专制体制日益稳固，士人赖以独立存在的生活资源越来越少，其人命运之舟只能维系在封建专制政体之上，一旦遭遇不测，其人生悲剧的产生，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必然结局。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动最频繁、民族矛盾和文化冲突最尖锐的时期，这一时期士大夫阶层的结构性变化及其社会使命的行使情况，出现了与秦汉不同的巨大变化，余英时指出了这种变化：“秦汉时代，士的活动比较集中地表现在儒教为中心的‘吏’与‘师’两个方面；魏晋南北朝时代，儒教中衰，‘非汤武而薄周孔’的道家名士（如嵇康、阮籍等人），以心存济俗的佛教高僧（如道安、慧远等人），反而更能体现士的精神。”

③耐人寻味的是，魏晋南北朝真正体现“士的精神”的道家名士和佛教高僧，他们都不再纯粹是西汉以来“奉儒守官”的士人，敢于“非汤武而薄周孔”，敢于超越世俗、不受名利权势约束。其实，像嵇康、阮籍等所谓道家名士，他们“非汤武而薄周孔”的言论，并不完全如表面上看起来的那样单纯和决绝，鲁迅非常深刻地指出：“（魏晋时代）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因为魏晋时所谓崇奉礼教，是用以自利，……于是老实人以为如此利用，亵渎了礼教，不平之极，无计可施，激而变成不谈礼教，不信礼教，甚至于反对礼教——但其实不过是态度，至于他们的本心，恐怕倒是相信礼教，当作宝贝，比曹操、司马懿们要迂执得多。”④嵇康、阮籍既想全身于乱世，又不愿放弃士人的角色与责任，于是采用了如鲁迅所分析的那种看似偏激和矛盾的态度与表达方式，这无疑为后世的士大夫选择生存之道和体现士的精神，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与借鉴。

唐、宋两朝的社会情势，在国力的强弱、政治的开明、经济的发展、文化的交融等方面，都存在很多的差异，但儒家思想作为封建专制政治主流意识形态的局面日益稳固，科举制度作为士人进入封建官僚政体的主要渠道，发挥了吸引与选拔人才的突出作用，士大夫越来越彻底地依附于专制政治体制的格局，不断得到加强。这样，信奉儒家思想观念的杜甫、韩愈、范仲淹、欧阳修们，重新成为“社会良心”的代表，毅然“以天下为己任”。由于自两汉以来道家、佛教思想逐渐为士大夫所接受，加之唐宋时代的统治者取其于己有用的成分而融汇之，因此，唐宋时代的士人所理解所发扬的“士”的精神，与汉代官方提倡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背景相比，已经有了很大的转变。

就宋代士大夫的所面临的政治情势而言，一方面赵宋王朝实行“右文”政策，重用文士治国理政，激发了士人议政参政、求取功名利禄的入世热情；另一方面，日益严重的冗官冗费，朝政的因循苟且，又引发此起彼伏的政治改革呼声，各派政治势力倡言革故鼎新之说，最高统治者出于复杂动机加以巧妙利用，致使党派斗争愈演愈烈，政治排挤、党派攻讦，罗织罪名，人生迫害，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士大夫的政治命运，面临前所未有的不可预测和难以掌控的诡谲局面，今天的执政重臣，可能明天就会成为远贬天涯的朝廷罪人。由此以来，仕途生涯

中用而遭黜、废而复用，几起几落，飘浮不定，成为多数士大夫人生轨迹的常态。这样的时局与命运，迫使他们不得不调整自己的政治态度、人生观念和生存方式，以便与捉摸不定的生存环境相适应。

伴随宋仁宗统治时期围绕“庆历新政”的酝酿，朝廷新旧力量开始了激烈政治交锋，欧阳修因声援范仲淹而被诬以“朋党”罪名远贬夷陵，一种在人生失意境况下如何自处的“生存智慧”，就在欧阳修的贬谪生涯中逐渐凸显出来。他在初到贬所为新住所写的《夷陵县至喜堂记》中说：“夷陵风俗朴野，少盗争。而令之日食，有稻与鱼，又有橘、柚、茶、笋四时之味，江山秀美而邑居缮完，无不可爱。是非唯有罪者之可以忘其忧，而凡为吏者，莫不始来而不乐，既至而后喜也。”⑤言辞之间，可以清楚感受到作者所谓“有罪者”的失意心情，但他没有以怨天尤人的眼光看待贬所的一切，而是对这里的物产、环境、风俗满口赞誉，不以为悲，反以为“喜”，甚至称其“无不可爱”！“庆历新政”失败以后，欧阳修被贬滁州，他又写了著名的《醉翁亭记》，同样只字不提他的失意与痛苦，反而大力赞美其风物与山水，以及淳朴乐观的人民，他处身其间，其“乐”无穷！“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也。山水之乐，得之心而寓之酒也。”⑥欧阳修通过移情山水、寓意诗酒的方式，实现了他仕途挫折、人生失意的成功转换。

苏轼黄州之贬，其遭受打击的严重程度远远超过欧阳修，他所面临的生计压力与生存困境，也比欧阳修更显严峻，故对人生价值与意义，以及未来生活方式的思考，也比欧阳修更加深刻。与《雪堂记》同样值得作深入分析的，还有苏轼元丰五年三月作的《哨遍》一词。其“词序”言：

陶渊明赋《归去来》，有其词而无其声。

余既治东坡，筑雪堂于上，人俱笑其陋，独鄱阳董毅夫过而悦之，有卜邻之意。乃取《归去来辞》，稍加隐括，使就声律，以遗毅夫。使家童歌之，时相从于东坡，释耒而和之，扣牛角而为之节，不亦乐乎！⑦

苏轼建于东坡之畔的雪堂，不仅有了属于自己休憩其间的住所，更具有特殊的象征意味，表明他将以躬耕劳作、自食其力的方式，安排自己的生活，雪堂既是他的生活场所，也是他决心彻底改变人生价值观与生活方式的标志。如此，尽管“人俱笑其

陋”，而他反而乐在其中；躬耕劳作于东坡，人不堪其苦，而苏轼却感受了从未有过的踏实与满足，所以感受到的尽是“乐”。其原因如《哨遍》下片所言：

噫，归去来兮！我今忘我兼忘世。亲戚无浪语，琴书中有真味。步翠麓崎岖，泛溪窈窕，涓涓暗谷流春水。观草木欣荣，幽人自感，吾生行且休矣。念寓形宇内复几时。不自觉皇皇欲何之？委吾心、去留谁计。神仙知在何处？富贵非吾志。但知临水登山啸咏，自引壶觞自醉。此生天命更何疑。且乘流、遇坎还止。①

这里谈到“忘世”的问题，正如他在《雪堂记》中所说，并非“逃世之事”，而是“逃世之机”，苏轼所强调的不是忘世之事，而是忘世之机。他在东坡独自躬耕，远离了官场机巧变诈的纷争之地，不再计较世俗所追逐的虚名末利，把富贵、去留、生死均置之度外，只与自然融为一体，临水登山，饮酒啸咏，寓形天地之内，纵浪大化之中，随遇而安，乐观地享受朴实而闲淡的生活。这是苏轼在黄州体味“适意”人生的内涵所在。

当然，这种生活并不是包括苏轼在内的历代士大夫所心甘情愿选择的，他们是在遭受仕途挫折和人生失意的情景下被动作出的适应性调整，我把苏轼在贬谪时期表现出来的“闲适之乐”称为“带泪的微笑”。②意在揭示唐宋以来文人士大夫所普遍追求的随遇而安、乐观超然生活态度的背后，其实反映的是他们的仕途更加坎坷，人生命运更加曲折；他们在文学作品中表现的旷达与乐观，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掩饰内心的痛苦与悲伤，采用这样的方式进行精神自慰。而实现从仕途“失意”向适应迁谪生存环境的成功转换，使自己的精神有所寄托，按照全新人生价值观来思考人生的多样化价值，规划未来生活方向，形成“昨非而今是”的新型生活方式与生存智慧，非经历“炼狱”般的精神痛苦与艰难抉择过程不能完成。

论文注释

①、②、③、④、⑦、⑧、⑬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十，中华书局1987年版，第1022~1023、1032、1034、1036~1037、1037、1034、1053~1054页。

⑤、⑥、⑭苏轼《东坡乐府》卷上，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版，第23、15、16页。

⑯丁永淮、梅大圣、张社教《苏东坡黄州作品

全编》，武汉出版社1996年版，第23~24页。

⑰杨胜宽《苏轼“适”的人生境界之形成与表现特征》，《苏轼与苏门文人集团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

⑱、㉑、㉒、㉓、㉔、㉕、㉖苏轼《苏轼文集》，第1535页卷五十三《与秦太虚尺牋七首》（其四）、第1481页卷五十一《与滕达道尺牋六十八首》（其二十）、第1839页卷六十《与子安兄尺牋七首》（其一）、第1499页卷五十一《与李公择尺牋十七首》（其九）、第1515页卷五十二《与王定国尺牋四十一首》（其五）、第410页卷十二《雪堂记》、第412页卷十二《雪堂记》。

㉗、㉘、㉙苏轼《苏轼诗集》卷二十一，第1090页、第1079页、第1006页《十二月二十八日，蒙恩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二首》。

㉚“冰雪”诸本作“水雪”，今依稗海本《东坡志林》改；“与”诸本作“有”，今依明万历刊本《重编东坡先生外集》改。

㉛、㉜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自序》，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页。

㉝鲁迅《鲁迅全集》（第三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513页《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

㉞、㉟欧阳修，《欧阳修全集·居士集》卷三十九，中国书店1991年版，第270页《夷陵县至喜堂记》、第276页《醉翁亭记》。

㊱杨胜宽《苏轼的“闲适之乐”》，《杜学与苏学》，巴蜀书社2003年版，第214~218页。

（乐山师范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



（西山九曲亭）

东坡符号

刘清泉

内容提要：从文化符号学的角度关照“东坡”，概论“东坡”之名的渊源、东坡文化的含义和东坡符号的形成，论述了东坡符号的三大特征：多重象征、文人情结和品牌效应，以及东坡符号的范畴：从对象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物质符号、东坡非物质符号；从生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原生态符号、东坡衍生态符号；从形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语言符号、东坡肖像符号、东坡遗址符号、东坡书画符号、东坡数字符号。

关键词：东坡 东坡文化 东坡符号 特征 范畴

从文化符号学的视角观照“东坡”，它意味着什么呢？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一个符号，一个象征，一种产业，一种品牌……

一、东坡符号导引

“东”与“坡”组合为“东坡”，从内容上看，乃东边之山坡；从结构上看，是修饰的关系；从形式上看，是双音节词语。那么，“东坡”最早见于何处？如何从偶合演变成习见？又如何从习见抽象为符号？东坡符号究竟有怎样的内涵和外延呢？

（一）东坡溯源

东坡，忠州地名：“东坡”首见于白居易诗歌，是指唐代忠州城东郊的一块坡地。白居易贬谪为忠州刺史时在东坡种花、植树、散步、吟咏，“东坡”遂见诸诗文，如《东坡种花》二首诗云：“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又《步东坡》诗云：“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又《别东坡花树》云：“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白居易的诗歌，使“东坡”具有了远离朝廷的隐逸、野趣和闲适的韵味。他对生命的安置，对南方的印象，在东坡的经营，与东坡的对话，对东坡的情感，皆在诗歌的文字中，他生命的意识、经验、空间彰显无遗。

东坡，黄州地名：“东坡”也是宋代黄州城内黄冈山下东边的坡地，当时黄州城内有很多山坡，现在仍保留有十三坡、十八坡的地名。元丰四年（1081）二月，故人马正卿在黄州知州徐君猷那里替苏轼申请了一块土地，以躬耕自食。躬耕之地是城中的故营地、荒地，面积约五十亩，当地土人称之为“东坡”。见诸苏轼诗文，如《东坡八首序》：“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东坡》诗云：“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莫嫌荦确坡头路，自爱铿然曳杖声。”《与章子厚二首》：“仆居东坡，作陂种稻，有田五十亩，身耕妻蚕，聊以卒岁。”

东坡，苏轼自号：躬耕东坡，颇似渊明，苏轼曾想别号“麀糟陂里陶靖节”。但是，由于躬耕之地素称“东坡”；并且鉴于与白居易忠州种花种树的“东坡”的机缘，故仿效白居易“香山居士”的雅称，将自己称之为“东坡居士”。苏轼景仰白居易，在诗文中多有体现，如《赠李道士》云：“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善相程杰》：“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判》：“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后人亦认为苏轼别号“东坡”缘于此，如宋洪迈《容斋诗话》云：“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专慕白乐天而然……则公之所以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周必大《二老堂诗话》、高鹤《见闻搜玉》亦有此说。

（二）东坡文化

有些词语被人们反复使用，便有了固定的公认的象征义，如“东篱”象征远离尘俗的洁身自好的品格。“东坡”的情韵、象征，亦在反复使用中附着上去。

周成仕主编的《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指出：“东坡文化是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一部分，是以苏东坡为代表的集苏洵、苏辙文化成就而形成的融哲学、历史学、文学、领导学、军事学、养生学、

美学、烹饪学等为一体的综合性文化现象。”东坡文化是文化现象，也是符号系统。它包括东坡物质文化，如在他们出生、为官、贬谪和逝世之地的遗迹、遗址；也包括东坡非物质文化，如“学而优则仕”的家教和“学以致用”的家学等。

东坡文化在内容和形式上是对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是人类文明的标志性符号。文化绕不开符号的视觉效果，符号也摆脱不掉文化的灵魂附体。如怀特所说：“全部文化（文明）依赖于符号。……没有符号，就没有文化，人也就仅仅是动物而不会成其为人类。”东坡的文化性即体现在它的符号化，那么，东坡是怎样被符号化的呢？

（三）东坡符号

东坡符号是东坡文化超越时空、衍生发展并在符号化的过程中形成的具有多重象征、文人情结和品牌效应的文化符号。

东坡的符号化主要通过典型化、抽象化和现实化的手段实现。

东坡文化被典型化，成为一种代表、一种理念、一种精神。东坡文化的代表性不言而喻，张亚新著《文人的理想品格——从陶渊明到苏轼》的《后记》说：“一方面，古代历史上下数千年，文人何只千万，情况纷纭复杂，把握起来，谈何容易；另一方面，品格问题涉及到众多学科领域，涉及到社会思潮、社会环境及文人生活的众多方面，把握起来，自也极为困难。但考虑到文人的理想品格显示了古代精神文明建设的高水平，是中华民族精神文化遗产中最为闪光的部分之一，对我们构建当代文人的理想品格仍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陶渊明、李白和苏轼在许多方面历来被视作古代文人理想品格的代表”。由此可见，东坡已成为文人的理想品格的代表、典型。

东坡文化被抽象化，成为一种符号、一种装饰、一种象征。东坡文化的丰富性不言而喻，它被抽象为符号之后，可成为地方的标志，可成为城市的标志，可成为遗址的标志，可成为产业的标志，可成为产品的标志，可成为设计的装饰，可成为象征的符号。孔子曾说统治世界的是符号和象征，象征符号是符号的核心，也是文化的核心。东坡被符号化后，象征背离权力中心的自我放逐，躬耕自食，放浪形骸；象征靠拢自然生态的自由率真，安时处顺，宇宙情怀；象征掌控个人意志的生命形态，精神万象，巅峰创造。总而言之，东坡象征传承儒家基因的文化符号、文人典范和精神归宿。

东坡文化被现实化，成为一种现象、一种状态、一种产品。东坡文化的现实性不言而喻，选择、挖

掘、运用东坡文化，开发东坡文化产品，以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和精神需要，是当代传承、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目的所在。美国的彼德·德鲁克甚至认为“符号经济已经取代实物经济，成为世界经济的车轮”。在他看来，商品客体（实物经济）在消费之前必须变成符号经济。比如人们购买“耐克”的行为，就渗透了满足自身的想象、联想和精神追求的欲望，作为商品代码的“耐克”，象征的是名牌的产品和欲望的符号。由东坡文化开发出东坡文化产品，由东坡文化产品衍化为东坡符号之后，作为东坡符号载体的东坡文化产品，可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反观自我生存、意识自我需要、弘扬东坡精神的文化需求，对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东坡符号从对象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物质符号、东坡非物质符号；从生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原生态符号、东坡衍生态符号；从形态上划分，可以分为东坡语言符号、东坡肖像符号、东坡遗址符号、东坡书画符号、东坡数字符号。

二、东坡符号特征

我们认为，东坡符号具有多重象征、文人情结和品牌效应的特征。

（一）多重象征

象征的词语意义往往等同或近似于表现、体现、显示、蕴含、代表、影射等。《辞海》把“象征”解释为：“指通过某一特定的具体形象以表现与之相似或相近的概念、思想和感情。”《现代汉语词典》把“象征”解释为：“用具体的事物表现某种特殊意义。”如火炬是光明的象征、鸽子是和平的象征、白色是纯洁的象征等。东坡在历代文人心中的崇高地位和巨大影响，人们不厌其烦地把无数的象征移植到东坡符号上，象征重影，一瞥可见。东坡符号象征浩然之气、功名之梦和自然之道。

东坡符号象征浩然之气：“气”本是普通字，是空气，是大气，是气体，是运动，是气息，是个性，是恼怒，是修养，是精神，是力量。“浩然之气”出自《孟子》“吾善养吾浩然之气”。这里的“气”是哲学概念，类似柏格森所说的人格上的“生机勃勃”的“元气”，是伟大的道德动力，更简单地说，就是充塞于天地之间的人求善、求正义的一种精神。苏轼所说之“气”，从他论李白、韩愈之文中，可以看出。李白表现出来的“气”是一种不媚权势、敢于犯众的傲骨。韩愈“浩然而独存”之“气”是一种良知以及实践的自信与自觉。苏轼认为“士以气为主”，“气”，即指伟大的精神、崇高的品德和

顽强的活力，至大至刚、磅礴天地。正如苏轼在尖锐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所表现出来的极可观的大节，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等品格。在宋神宗、王安石推行新法时，以苏轼的才华，只要稍加附和，即获权柄；但他却反对新法，并因此离开朝廷，投进监狱。在高太后、司马光当政时，以他们对他的器重，只要稍加附和，或稍微收敛自己的言行，不要太锋芒毕露，不难位至宰相；但他却反对尽废新法，并因此而不安于朝，奔波于朝廷和地方上。苏轼之所以为苏轼，就在于他不易所为而求免祸之气节，他代表了孟子所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的大丈夫气节。

东坡符号象征功名之梦：在士人眼里，儒家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中，立德高不可及，立言的吸引力则远不及立功。因此，士人往往把追求功名作为第一目标，功业情结是他们挥之不去的梦想。首先，东坡科考得意，而名满天下。东坡虽然博学旁收，但是骨子里还是儒家血脉，走的是“学而优则仕”之路，嘉祐二年（1057），一登进士第，而名满天下，遂成为功名的典范、士人的偶像、学习的楷模。当然，主要是因为他自然流畅的文笔，契合当时的文坛盟主欧阳修倡导的诗文革新主张，因而受到他的赞赏，在《与梅圣俞书》云：“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后又应制科，得高等，《宋史》说：“仁宗初读轼、辙制策，退而喜曰：‘朕今日为子孙得两宰相矣！’”其次，东坡仕途坎坷，亦显赫一时。东坡奋厉当世、致君尧舜的理想没有实现，因为他遭遇了王安石变法，仕途坎坷。他自己总结一生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如此的人生际遇却成就了他的君子之德、绝妙之文。尽管如此，在他四十年的仕宦生涯中，也曾显赫一时，曾担任过八方太守、兵礼尚书、皇帝恩师。在八个州任军政最高长官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实施了他德治仁政的政治理想。

东坡符号象征自然之道：东坡充沛的生命活力、无穷的文化创造力、丰富的精神境界和卓越的人格魅力，来源于自然之道。“自然”一词最早见于《庄子》：“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意思是人以地为法则，地以天为法则，天以道为法则，道以自然为法则。这个“自然”，不是近代自然界、大自然之意，而是自然而然，自己如此的意思。东坡具有儒释道兼容的文化之魂，既具有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但在积极进取的同时，又能顺应自然、随缘自适、旷达乐观。东坡《答毕仲举》云：“学佛老者，本期于静而达。静似懒，达似放。”意思是他学习佛道的目的，是求得心灵的宁静和处世的旷达，修养不忧、不惧、不恼、不怒的内心的定力与信念。自然之道追求顺势而为。既在坎坷的

生存际遇中顺势而为，又在平时的文学创作中顺势而为。自然之道追求自由独立。只有自然，才能自由；只有自由，才能独立；只有独立，才能创新。东坡一生都在追求心灵的自由。自然之道追求丰富多彩。就精神世界的丰富性而言，无论是在古代还是今天，像东坡这样的人都是极为罕见的，是近于“全面发展”的人。从“文学艺术”角度看，他是多面的全能冠军。在诗、词、文、书、画等方面，成就卓著且有开派之功。从“文化”角度看，他是多专长的学者。在哲学、政治学、文论、画论、书论、音乐学、农学、水利学、医药学等方面，都有自己的研究和造诣。从“精神品格”的角度看，他是体现中华民族传统文化中优秀道德的一种典型。他长成这样的生命形态，除了外在原因，还有内在原因，即一生都在追求自然、自得、自由的人格理想。

（二）文人情结

情结这个词汇是心理学者 C. 荣格所创作的一个心理学用语，意思是复合体或者观念的联合，表示内心当中的各种各样的观念被紧紧地联系在一起的样子。弗洛伊德将那个潜意识当中的愿望和围绕着这个愿望的纠葛称为俄狄普斯情结（恋母情结）。苏东坡的个体生命“穷尽了生命的可能性，穷尽了中国文化的可能性。他抵达了生存的广度与深度的极限”，苏东坡的诗词文书画的卓越创造、文化魅力和生命能量，吸引着历代文人。我们认为，在历代文人的潜意识里，对东坡有类似“俄狄普斯情结”似的情结。历代文人对东坡的崇拜之情内敛、纠结、积郁、深藏心底，化解不开，挣脱不了，涂抹不掉，因而形诸笔端，流传后世，衍生繁育，蔚为大观，现仅举一例说明。

在宋人笔记中，东坡笠屐故事脍炙人口。（宋）费衎《梁溪漫志》云“东坡在儋耳，一日过黎子云，遇雨，乃从农家借箬笠戴之，著屐而归。妇人小儿相随争笑，邑犬群吠。今时亦有写此者。”（宋）张瑞义《贵耳集》说：“东坡在儋耳，无书可读，黎子家有柳文数册，尽日玩诵。一日遇雨，借笠屐而归。人画作图。东坡自赞：‘人所笑也，犬所吠也，笑亦怪也。’周子厚语。”此故事与苏东坡在黄州的词《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意境契合。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形象地表现了苏轼的气度、胸襟以及对人生的态度，意思是手持竹杖，脚穿草鞋在雨中步行的爽快骑马哪能相比呢？怕什么呢，自己的一生就是披着蓑衣、戴着斗笠在风雨之中过来的，对此我早已习以为常了。这里的“风雨”，不仅指自然界的风雨，而且指政治上的风雨。苏轼对待自然界的政治上的

风雨不惊恐，不退缩，任其自然，坦然处之。由“一蓑烟雨任平生”很容易联想到柳宗元的“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的遗世独立。历代画家以此为题材创作成为《东坡笠屐图》，瓜瓞连绵，子嗣流布，繁而不衰。他们或工笔或白描或写意，表现出苏东坡的闲散野逸、绝世独立。

那么，历朝历代究竟有哪些画家画过东坡笠屐图呢？下面结合眉山三苏祠馆藏笠屐图以及有关文献记载，可知宋代有周少隐、李公麟，元代有赵孟頫、任子明、钱舜举，明代有朱之藩、唐寅、尤求、仇英、曾鲸，清代有黄慎、华嵒、费以耕、子芾氏、沈燧、张廷济、宋漫堂、周树堂，近现代有张大千、程十发、李耕、蔡筱明、姚石倩、刘国辉、陆祝、赵蕴玉、刘旦宅、王若兰等。

从以上分析可见笠屐图的创作、临摹、衍生、流传和影响，由此可见，东坡人格的巨大魅力、东坡文化的生命活力、东坡符号的发展潜力和历代士人的文人情结。

（三）品牌效应

在当今品牌先导的发展战略中，品牌的意义不言而喻，但是，品牌的形成需要时间、空间、信誉、口碑、人脉的积淀，非一朝一夕之事。东坡品牌是在东坡生前的轰动效应和身后的推崇传播中积淀而成的。东坡符号的品牌效应，即由使用东坡符号、东坡品牌而带来的效应，由弘扬东坡文化、东坡精神而带来的效果。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弘扬中华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中华文化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团结奋进的不竭动力。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穿越千年时空的东坡文化、东坡精神的超前卓识、现代光芒，正是我们今天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小康社会的文化资源。东坡品牌所昭示、引导和建设文化精神正是现代发展的潮流和趋势，如“人本”思想、“幽默”气质、“和谐”观念等。而东坡品牌又不仅仅只有这些现代精神，其丰富多彩，足以让世人瞠目。刘小川《品中国文人》说：“他（苏东坡）生活在古代，却比现代人更现代。他生命中的核心要素，提纯了人类文化的‘遗传基因’。”因此，东坡品牌效应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三、东坡符号范畴

成为东坡符号的事物无所不包，它们从不同侧面显现着东坡文化的精神，或情感、或智慧、或审美、或个性。反过来，它又是我们认识东坡符号的

具体凭借。东坡符号的范畴即东坡符号的外延、范围、类型，以对象分类，有物质、非物质，以生态分类，有原生态、衍生态，以形态分类，有语言、肖像、遗址、书画、数字，下边将分类介绍。

（一）东坡符号的对象范畴

1. 东坡物质符号

东坡物质符号是东坡包括苏洵、苏辙创造或衍生的有形的具体的实物文化形态。如东坡文化古代典籍、现代书刊等；再如杭州、徐州、黄州、惠州、儋州的遗址、遗迹。东坡先后两次任职杭州，为时共五年，且与西湖结下了不解之缘，如今，除杭州西湖外，尚有惠州西湖、颍州西湖、扬州瘦西湖等，正如秦观所说“我公所至有西湖”。杭州与东坡有关的景点有：西湖、苏堤、三潭印月、冷泉亭、六一泉、过溪亭等，书法石刻有：《表忠观碑》、吴山摩崖石刻、大麦岭题名、石屋洞题名等，还有苏东坡石像，在杭州创作的诗文词等。

2. 东坡非物质符号

东坡非物质符号是东坡创造或衍生的无形的抽象的精神文化形态。又称东坡文化的“活化石”、历史的背影和无形的符号，主要指人类以口头或动作方式相传，具有东坡文化积淀，广泛、突出和代表性的东坡文化遗产。如苏轼将定州民间小调稍加整理，定名为“插秧歌”，并填写歌词。自此，插秧歌在定州北部男女老幼间传唱不息。定州秧歌剧目《安安送米》，被批准为首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再如“学而优则仕”的家教、“学以致用”的家学、东坡文化精神等。

（二）东坡符号的生态范畴

1. 东坡原生态符号

东坡原生态符号是东坡创造的文化实物和文化精神的文化形态。如东坡存诗二千七百首，词三百余阙，文四千多篇，其中包括一千七百封书信，书画真品四十多件。

2. 东坡衍生态符号

东坡衍生态符号是东坡创造的文化实物和文化精神衍生出来的文化形态，如由东坡诗文而衍生的诗文注释本、年谱、论文、专著等。再以“和陶”文化现象为例。苏东坡开创了追和陶诗的先例，有和陶诗 109 首，他在给苏辙的信中说：“古之诗人有拟古之作矣，未有追和古人者也，追和古人始于吾。”苏东坡和陶，苏子由继和，苏门四学士仿效，继而蔚为大观。宋代有陈与义、李纲、吴芾、王质、陈造、陈起、朱熹、赵蕃、释觉范、张栻、张鎰、刘黻、舒岳祥、于石等；明代有梵琦禅师、张渤、童冀、李贤、陈献章、童轩、林俊、吴俨、孙承恩、

黎民表、魏学洧、范文煥、归昌世、李廷弮、陈良谟等；清代和陶数量可观，难以作出完整的统计，如施闰章、查慎行、舒梦兰、姚春等。这是很特殊、很值得注意的文学活动、文化现象，它使陶渊明更加深入人心，也使苏东坡更加深入人心，他们追和的是陶渊明，追捧的却是苏东坡。在不同程度上，代表了某种文化的归宿，标志着对某种身份的认同，表明了对某种人生态度的选择。

（三）东坡符号的形态范畴

1. 东坡语言符号

语言是人类文化交流和传播中最自然、最方便、最经济、最有效的媒介，它是“存在”的家，它隐藏着生活的全部密码，它在人类文化符号系统中占有最重要的作用和位置，在社会信息量中占有35%。

东坡语言符号是东坡留存于世的诗词文等或衍生的书面语言文化形态。在《苏轼诗集》中，我们发现苏轼诗中独特的口语复音词如端能、泼眼、细么、坐费、定合、要亦等，口语俗词如么么、连夜、从教、判却、转头、无由等。东坡大放厥词，别开生面，首次出现于诗中的词语数量极为可观，如第439页“过眼青钱转手（反手之间）空”，第525页“一朵妖红翠（鲜亮）欲流”，第716页“回头（回顾）乐事总成尘”，第936页“父老何自来，花枝袅长红（花枝上挂的红彩）”，第1872页“为报年来杀风景（有损风光）”，第1921页“软红（繁华热闹）犹恋属车尘”，第2067页“三杯软饱（饮酒）后，一枕黑甜（睡眠）余”，第2079页“雪肤（白花）满地聊相温”，此仅略示数端。至于先见于变文、传奇、经史、佛典等，则率先用于诗中，如《莺莺传》的“断红”，见第422页“无人脸断红”；佛典《四十二章》的“中边”，见第1708页“不如食蜜中边（表里）甜”，此类为数亦不少。苏轼诗、词、文的书面语言就是苏轼感情的符号。其内蕴之丰富，正如著名苏学专家王水照所说：“苏东坡永远的说不透、说不完、说不全。”

2. 东坡肖像符号

东坡肖像符号是指东坡身体独具的容貌、衣着、神情、姿态等文化形态。东坡印象的艺术再现，从艺术家的绘画和雕塑可窥其大概；东坡肖像的庐山真面，从他自己的诗文中亦可窥其大概。东坡的面部特征之一：颧骨突出、胡须稀疏。由《传神记》、《表弟程德孺生日》可知苏东坡与表弟程德孺皆“寿骨贯耳”——面部有寿骨与耳朵相接，即颧骨突出。东坡的身材特征：身材高大，衣着特征：子瞻帽，姿态特征：潇洒野逸。

3. 东坡遗址符号

东坡遗址符号是东坡包括苏洵、苏辙出生、成长、为官、贬谪、安葬等地的遗址、遗迹文化形态。

在苏轼40年的仕宦生涯中，初仕三州，主政八州，贬谪三州，大部分时间在地方上做官，足迹所到，多达16城市，留下了大量遗迹，如眉山三苏祠、黄州赤壁、海南儋州书院、郾县三苏墓祠等。

4. 东坡书画符号

东坡书画符号是东坡包括苏洵、苏辙留存于世的书法、绘画作品的墨迹或拓片等文化形态。苏轼的书画真品，现珍藏于海内外的，有四十六件。苏轼博采众长，开创“尚意”书风，名列宋代“苏（轼）、黄（庭坚）、米（芾）、蔡（襄）”四大书法家之首。黄庭坚对他评价极高：“文章妙天下，忠义贯日月”，“本朝善书，自当推为第一”。

5. 东坡数字符号

东坡数字符号是以数字技术为手段，以东坡题材包括苏洵、苏辙为内容的电影、电视、多媒体和网络等文化形态。影视、网络的作用逐步被东坡文化发祥地所重视，东坡文化题材的电影、电视剧、网络如雨后天晴。2007年中共眉山市政协组织了“东坡足迹万里行”，拍摄的图片由眉山市政协编辑并正式出版《千年英雄——苏东坡图传》，拍摄音像素材由眉山电视台制作了18集电视系列片《东坡足迹行》。由著名苏轼研究专家、作家、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冷成金先生任编剧创作的44集电视剧《苏东坡》，2008年由中国文采声像出版公司拍摄、制作完成，2009年被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推荐为优秀国产电视剧。海南拍摄了以苏东坡为题材的琼剧《苏东坡在海南》以及同名电视连续剧。惠州将拍摄20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在惠州》。网络有“三苏文化研究网”、“三苏祠”、“国学网”等。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横看、侧看、远看、近看、高看、低看，庐山会呈现出变幻莫测的景观。对东坡符号的观察亦然，若再从不同的视角、不同的层面、不同的维度观察，我们还可以看到其他范畴、其他类别、其他风景。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研究室主任）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为“东坡”寻注求解

〔台湾〕江澄格

内容提要：苏东坡文才盖世，一生仕途坎坷，贬居黄州时期，躬耕东坡，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东坡”成为中国文学史上响亮的名号，流传千古。然“东坡”之含意，却渊源颇深。可上溯至中唐著名诗人白居易，曾于忠州东坡种花、赋诗，而苏东坡极推崇他。但要详东坡之义，并不只是两人在地名和意趣上的简单巧合，而实在是两人在人生经历和思想情趣上有颇多的关联。

关键词：苏东坡 白居易 东坡 人生遭遇 意趣品性 关联

誉满北宋，名垂千古的先贤苏东坡，是以诗词文才饮誉于当时，因道德文章留名于后世，但也因文字而被污获罪，受诗作之累而身陷囹圄，几至殒命丧生，诚如白居易在《与元九书》中自谓“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苏公终其一生在宦海之中时浮时沉，时而乍起骤升高飞，突然又暴落剧降，当其在荣达时，尝贵为帝师辅臣，然而在被陷受污之际，则又沦为狱囚逐官，寄名衙吏，在仕途之中一路行来坎坷崎岖，曲折迂回，从山东到广东，由北国到南疆，自密州而儋州，南北奔走，登山涉水，历尽漂泊流落的痛楚辛酸，此其间之所以有如此之多的横逆，绵亘不绝相继而来，似乎是种因于他卓越的文才，出自笔下的那些诗文。

尽管苏公踏入仕途虽为时不久居官未及十年，但对于存在官场，唯利是图是非莫辨的官僚文化，与祸福相依存纯保真的人文哲理，已有所警惕和感悟，所以在熙宁二年（1069）岁在己酉二月，当其被召自凤翔还朝，遭亡妻丧父之痛，守孝三年，再返朝任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时，就曾经撰有《石苍舒醉墨堂》七言诗，籍以用为自惕：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
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恍恍令人愁。
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病何能瘳；
自言其中有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

这诗共有十六句，以上所载是摘录前段的八句，内容是题赠其为诗坛好友也是名书法家石苍舒的，石乃“京兆人，父君瑜，字才美，人称才翁，善书法，尤长于行书，笔下每能生风，龙翔凤舞无不精妙奇绝，深得草圣（唐张旭）三昧，官承事郎，历任通判保安军，及高陵县（今陕西西安高陵县）主簿，曾被泗州府太守吕大防所赏识，而疏奏荐举不果。”著墨在暗中寄情诤讽于字里行间，寄望有益于，亦且有利于己，所以开头的第二联，苏轼就向普天下的读书人，衷心地提出了诚挚的忠告，不幸果然言中。在时过十年之后，于元丰二年

（1079）一月二日监察御史携行舒直上劄子，弹劾时为湖州知府的苏轼，指谪所上谢表“有讥切时事之言，流俗翕然争相传诵，忠义之士无不愤惋……文乱事实，造作谗说，以为摇夺沮坏之计，其次又不遇腹非背毁，行察坐伺，以幸天下之无成功而已，至于包藏祸心，怨望其上，讪讟谩骂，而无复人臣之节者，未有如轼也”。自此首发“前奏”之后，便引起了犹如雷霆万钧的攻讦不断，有人主张该杀，有人认为当诛，从而罗织成震惊朝野，上达天聪，流为千古奇谭的文字冤狱“乌台诗案”，而于元丰二年（1079）岁在己未，七月二十八日在湖州任所被中使皇甫遵逮捕，八月十八日押解至京师御史台大狱接受侦询，盘查逾月，查无不法实据，还押原狱，听候发落，十二月二十日太皇太后（仁宗慈圣光献曹皇后）升遐，大赦释囚。御史台所呈《根勘结案状》奉圣旨御批“苏轼可责授检校水部员外

郎，充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事”。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奉诏获释，二十九日出狱，自八月十八日入台狱，历三越月，直至岁末年暮在调年残岁获释脱身，但是必须遵照御史台规定时限，即刻自汴京（今河南开封）启程首途，远去黄州（今湖北黄冈）应命报到。为了及时到达，不得不兼程赶路，因之虽然是时届除夕，适逢元旦和元宵，可是都在行途舟车之中，荒村野店里，黯然度过。深恐以待罪之身，再有违误干犯，心中有所着急，脚下自然步快。故于元丰三年（1080）二月一日，以两个月的途程到达黄州，暂时借住定惠院，虽然生活环境极为恶劣，物质条件相当困乏，可是精神生活却甚是丰足。在四年两个月当中，倾其所有，尽其所能，开垦荒营为田，结构茅竹为舍，就临皋亭以东之坡地，筑雪堂，自号“东坡居士”。从此之后，这一雅号即用于诗文翰墨字画之中而普遍传，回顾过去所经历的那段苦难，以及身受的那些折磨，似乎是诚如所言，果然应验了十年之前所写那首七言诗的首句，“人生识字忧患始”而成为诗谶。

东坡居士谢世时至今日，已经历时九百零五年了，此其间无论是学术界文艺圈，不问是醉客抑是诗人，或者是一般社会大众，对于这位曾名闻中外，誉满朝野，言常能动庙堂公卿，行足以为天下凭式，身虽为朝廷显官重臣，却不失好学谦和书生的风度，仍具有高风亮节学者的风范，常抱有豁达淡泊隐者的襟怀，与仁民爱物恕人济世高僧的胸怀，终其一生，从未贪图利禄，钻营名位的前贤，历来就其道德文章，文采风华，学术思想，嘉言懿行，卓识远见等见载于史籍文献的资料，已然在不同的时空，分别由各个学术研究机构，结合着不同阶层的专家学者，从各个不同的角度，以彼此互异的观点，各自做过深入的研究，与周密而又平实的探讨，并且也得到了辉煌的成就，也有了极为可观的成果，可是对东坡居士个人的性向尊崇，日常偏好的内心世界，与心历路程的揣摩探索，整合出来的论述，提报公开的资料，大致是并不十分普遍，似乎还有不少有待开发的空間。若是稍加关注略予推敲，或许会发现另一处孔宅旧壁也说不定，只要有所发现，即便是残帛碎玉，纵然为断章散页，也都弥足珍贵，对续残补缺有所裨益，诸如其自号“东坡居士”的“东坡”二字，是因何而有？从何而来？所指为何？等不为一般大众所周知，存在为时已久的疑义，看似无关宏旨，近乎小道，不足言道的细微

末节，实则是一项颇富深义且又别具情趣，另有涵意的标识签注工程。

对于这位人尽皆知其名的历史人物，当时一般人多称其号而不呼其名，及至今日，也大都用其号。可是其号称的由来，一般社会大众则是未必尽知其来龙去脉，了解其个中底细。实则，这个极其响亮的名号，是大有来历的，并且该远溯自唐代，源自于白居易。

“东坡”二字，最初所界定的涵义，原本仅只是代表一个特定的地名，首先被用之于诗句之中，而又一再地出现于作品之内，是中唐时期享誉诗坛的大诗人白居易的创举，在他所撰的诗文集《白氏长庆集》之中，以“东坡”为题用各种体裁写成的诗作，便有五首之多。这种异乎常情，不曾多见，也是前所未有的奇特现象，并非是白乐天以惯用的笔触，所书写出来的常用辞句，而是另有寓意。当其在元和十年（815）岁在乙未，宰相武元衡在上朝时，于行途之中被暴徒冲散侍卫扈从，将其狙杀，当场毙命，并且取去头颅，暴徒继奔通化坊截击御史中丞裴度，裴度受伤跌入沟中逃过一劫免于死。案发震惊朝野，白居易时为太子左赞善大夫，首先上疏请诏令急捕凶手，严办幕后主使者，因而开罪于凶案主使者，和反武元衡的政敌，故而相结污指乐天并非言官，身为内臣，竟然超权越职奏事，破坏体制成规，殊属是非。并以其生母坠井身亡，无怀丧亲之痛，未有人子之哀，竟作《新井》诗，有伤名教，乃上书奏贬江州（今江西九江）刺史，诏下，中书舍人王涯，即又上疏论奏，以白居易所犯罪迹，不宜治郡任地方首长，乃追诏授江州司马。名作长诗《琵琶行》就是这一时期在浔阳任内的作品。在九江三年后于元和十三年（818）岁在戊戌奉命调忠州（四川忠县）刺史。忠州是一个背负蜀山，面临巴水，多雾少晴的山城，北门虽设，因临岩而常闭，南门面巴水而东去，只是东门和西门为车马行人来往必经通衢要径。长街巷道，也是沿大街平行，官厅民宅，茶楼酒肆，商家店铺，和城外的村庄农舍，以及田畎垅植，也都是依山乡的走势，由东而西，成堤坎式的排列，坡地梯田层阶叠重。州刺史的居所官舍，位于县城东门外的山坡上，因山势而建，坐北朝南，名为南宾楼，分东西两厢有东西两楼。白居易于元和十四年（819）岁在己亥三月二十八日抵达忠州任所，便居住在这栋官舍里。一向爱好大自然，喜欢蒔花栽树的白居易，便

利用官闲的公余辟地，雇工在东厢开辟出一个花园，于园中取土为池，磊石为山，并且遍栽花树，广植果木，也有诗写述其事《白氏长庆集》中，载有《东坡种花》二首：

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
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
百果参杂种，千枝次第开。
天时有早晚，地力无高低。
红者霞艳艳，白者雪皑皑。
游蜂遂不去，好鸟亦栖来。
前有长流水，下有小平台。
时拂台上石，一举风前杯。
花枝荫我头，花蕊落我怀。
独酌复独咏，不觉月平西。
巴俗不爱花，竟春无人来。
唯此醉太守，终日不能回。

这是“东坡”二字首度的出现，被用为诗题，是一个特定的专用名词，但在诗句中，则是泛指忠州城东的山坡，着重在以城东来指明坡地的位置。其二云：

东坡春向暮，树木今何如。
漠漠花落尽，翳翳叶生初。
每日领僮仆，荷锄仍决渠。
划土壅其木，引泉溉其枯。
小树低数尺，大树长丈余。
封植来几时，高下奇扶疏。
养树既如此，养民亦何殊？
将欲茂枝叶，必先救根株。
云何救根株？劝农均赋租。
云何茂枝叶？省事宽刑书。
移此为郡政，庶几氓俗苏。

第二首诗开头最先的第一句，“东坡”二字，与诗题，已然形成了前呼后应的形式，并且将“东坡”定型为专用特定名词，这两首同题诗的内容。是写述白乐天最初耕耘城东那块坡地的经过，和种植花卉的一般情况，最后归结到为官之道，应以养民为重，护民为本，强调民为邦本的政治哲学思想，也是从政者应该遵守奉行的官箴。继后又写了《步东坡》：

朝上东坡步，夕上东坡步。
东坡何所爱？爱此新成树。
种植当岁初，滋荣及春暮。
信意取次栽，无行亦无数。

绿荫斜景转，芳气微风度。
新叶鸟下来，萎花蝶飞去。
闲携斑竹杖，徐曳黄麻屨。
欲识往来频，菁芜成白路。

诗句之中写述出白居易，对东坡耕耘之勤，心中对东坡期望之殷，以及关怀寄情之深，每日晨昏必至，往返行走数趟，连草地也因践踏过于频繁，走出一条小路来了。

按照唐代的职官制度所订的调任规定，所有在朝外任职的地方官员，自正九品县令（丞）以上，诸凡郡、州、府道主官的任期，原则上是一任三年，若是没有特别的因素，在任期届满之后，便发布命令予以迁调，是为通例常规。至元和十五年（820）岁在庚子，白居易任忠州刺史任期已然届满，于初夏诏命召还，返朝拜尚书司门员外郎，对于忠州自然是胸怀留恋不舍之情，尤其是亲自开拓而成的花园——东坡，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一种难割难舍的情怀，因而写有《别种东坡花树》两绝句：

二年留滞在江城，草树禽鱼亦有情；
何处殷勤重回首，东坡桃李种新成。

花林好住莫憔悴，春至但知依旧春；
楼上明年新太守，不妨还是爱花人。

白居易深情款款地写下了这首别东坡的两绝句，也恋恋不舍地告别了忠州，更念念不忘地离开了东门外山坡上的南宾楼，但仍还寄望于后来接管他的新任太守，是一位喜爱花草，勤政爱民的接班人，使坡上的花树不致枯萎凋零。返回京城就任新任之后，他仍然挂念着南宾楼和坡上的那些花草树木，所以写了《西省对花，忆忠州东坡新花树，因寄题东楼》七言律诗一首：

每看阙下丹青树，不忘天边锦绣林；
西掖垣中今日眼，南宾楼上去年心。
花含春意无分别，物感人情有浅深。
最忆东坡红烂熳，野桃山杏水林擒。

白居易返回京师之后，虽然是身在长安，可是却心系忠州，时常怀念忠州城东门外山坡上的林园，和南宾楼前的庭院，难以忘怀那些亲自栽种的花草树木，当其看到宫中的丹青树，便情不自禁地想到还在忠州城东坡上的绿树繁花，对东坡总是依依不舍，时常念念不忘，老是念兹在兹，魂萦梦绕地想到忠州，记挂着东坡，除此之外，还以“东园、东楼、东陂、东城、东垌、东亭、东池、东涧、东

溪”等词写时题，写长短不同体裁各异的诗作，在这些都有东字的地名，而用写时题的作品之中，又以“东坡”二字在当时空间横向的流传上，极其辽阔甚是普遍，而在纵向垂直留传的时间上，也最为久远。

时隔两百六十四年之后，至北宋神宗元丰二年（1079），白居易因文字而遭贬不幸的历史悲剧又重演，苏轼也因文字而蒙难，发生了愈演愈烈，震撼朝野的“乌台诗案”，事于白居易被陷的“新井诗案”，前后两相对照，不仅只是极为相似，甚至于有些地方，还大致相同。若是将这两项重大历史事件视为巧合，诚无不宜，但先后两案的符季若合，几乎是完全一致，则不能不谓之奇。其间更颇富妙趣，苏轼本人也曾多次在诗文之中，强调他自己与白居易颇为相似，有此一说，首见于元祐二年（1087）题写《轼以去岁春夏，侍立迓英，而秋冬之交，子由相继入侍。次韵绝句四首，各述所怀》（其四）：

微生偶脱风波地，晚岁犹存铁石心。

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

其时苏东坡已年届五十有二，在同年之间，继后又在另一诗作《赠李道士》中提到，这诗是因写真而回赠：

千年鼻祖守关门，一念还为李耳孙。

香火旧缘何日尽，丹青余习至今存。

五十之年初过二，衰颜记我今如此。

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

元祐五年（1890），苏东坡在龙图阁学士充两浙西路兵马铃辖知杭州军州事的任上时，则有更明白的表示：

心传异学不要身，自要清时阅缙绅。

火色上腾虽有数，急流勇退岂无人？

书中苦觅原非诀，醉里微言却近真。

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

——《赠善相程》

这首诗倒数的第二句，就明确地宣示了，“我似乐天君记取”。继于同年六月三日又有：

于子甥舅氏，摧颓各苍颜。

并为东诸侯，长此佳江山。

寒松无时花，安得插髻鬟。

惟将老不死，一笑荣枯间。

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

——《次京师韵送表弟程懿叔赴夔州运

判》

从元祐四年（1889）七月苏东坡到杭州知府任上，至元祐六年（1891）二月以翰林学士承旨召还，当其辞别地方乡绅旧知故友时，曾经写有《予去杭州十六年而复来，留二年而去。平生自觉出处老少，粗似乐天。虽才名相远，而安分寡求，亦庶岁焉。三月六日，来别南北山诸道人，而下天竺惠净师以丑石赠行，作三绝句》，此诗其二为：

出处依稀似乐天，敢将衰老较前贤。

便从洛社休官去，犹有闲居二十年。

自元祐二年到六年（1087~1891），前后五年之间，苏东坡分别以五首诗作，向不同的对象，一再毫不讳言地陈述其生平出处，和宅心性情，都是倾向于“安分寡求”保守型的性格，而与白居易一生的行事作为和经历遭遇，有不少地方是约略相似，乃至有一些是完全相同，有所差别的则只是年代有别而已，时空有所不同罢了。

循此一说，试就不同朝代的二位先贤，同为古代文坛的两颗巨星，分别列举其生平背景相关资料，概略予以对照比较（见附录），或将有裨于对苏东坡诗作有较深入的理解和认知，能体认到更精准的义涵，作近乎原意明确的解读。

前列对照表，是根据白乐天 and 苏东坡二位先贤的年谱，再参照相关文献资料调制而成，系摘列两者的出身背景，仕途经历际遇，暨生平具有纪念性留有遗迹的行述，作选择性地列项加以对照，其间并未及于个人的生活习惯，日常的行事作风与偏爱嗜好。另有相同之事尚未能列入，自是不难意料且又无可讳言之事实，但所列则多为同属影响二贤的重大事件，并且也是苏公感悟至深，终生难忘，命运转折的关键契机。因此东坡居士，非但学习模仿香山居士，亦且敬重尊崇香山居士，故而引沿其所爱之地的地名“东坡”，用为自己对外正式的号称。持有这种观点的人，是早在北宋时代与东坡居士属同一时期的大儒洪迈，在他所撰写的《对雨编》中，就有《东坡慕乐天》一章，指称：“苏公谪居黄州，始自称东坡居士，详考其意，盖崇慕白乐天而然，白公有《东坡种花》二诗……苏公在黄，正与白公在忠州相似……则公之所景仰者，不止一再言之，非东坡之名偶尔暗合也。”

另外还有宋朝罗大经，江西吉水人，字景纶，宝应进士，博览群书，长于诗文，著有《鹤林玉露》十六卷，其间亦载有：

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近时叶石林《避暑录话》谓：乐天与杨虞卿为姻家，而不累于虞卿，与元稹牛僧孺相厚善，而不党于元稹僧孺，为裴晋公之所爱重，而不因晋公以进，和李文饶素不相乐，而不为文饶所深害，推其所由。惟不汲汲于进，而志在于退，是以能安于去就爱憎之际，每裕然而有余也。

继后明代大儒陶宗仪，黄岩人，字九成，所编辑的《说郛书史会要》一书的第十七卷内载有，由宋人于咸淳年间刊行的《爱日斋丛抄》之中，引用王直方《诗话》称：

东坡平日最爱乐天之为人，故有诗云：“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又：“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又：“他时要指洛阳人，知是香山老居士。”又：“定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而坡在钱塘，与乐天所留岁月略相似，其句云“在郡依然六百日”者是也。……益公《杂志》亦称苏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予因诸诗之作而考之，东坡之慕乐天似不尽始黄州。《吊海月辨师》云：“乐天不是蓬莱客，凭仗西方作主人。”倅杭时作，已有慕白之意矣。坡诗注：《卢子逸史》：会昌元年，有南客飘至大山，有人引至一处，见道士坐大殿，曰：“此蓬莱山也。”宫内院宇数十，而一院扃锁，曰：“此白乐天宫。”乐天在中国未来耳。乐天闻之，遂作《答客说》诗：“海山不是吾归处，归则应归兜率天。”又《与果上人》诗：“不须惆怅从师去，先请西方作主人。”观引用此事，知其已慕白也。《守胶西和张子野竹阁见忆》则云：“柏堂南畔竹如云，此阁何人是主人。但遣先生披鹤氅，不须更画乐天真。”或谓此自属之子野。元祐经筵赐御书乐天《紫薇花》绝句，又不独公以此自拟也。……若乐天声伎之奉，固苏公所无。坡后赋朝云“不似杨枝别乐天”，岂诚过之？戏言也，况已云“但无素与蛮”矣。子由暮年赋诗谓：“时人莫作乐天看，燕望端能毕此身。”自注：“乐天居洛阳日，正与余年相若。非斋居道场，辄携酒寻花，游赏泉石，略无暇日。余性拙且懒，杜门养病，已近十年，乐天未必能

尔也。”或当日又以乐天称子由香山一老，而两苏共之。子由《读白集》五绝句极论所处同异，今抄其诗云：“乐天梦得老相从，洛下诗流第二雄。自笑索居朋友绝，偶然得句共谁同？”“乐天得法老凝师，后院犹存杨柳枝。春尽絮飞余一念，我今无累百无思。”“乐天投老刺杭苏，溪石胎禽载舳舻。我昔不为二千石，四方异物固应无。”“乐天引恪注他塘，画舫飞桥映绿杨。渼水隔城来不得，不辞策杖看湖光。”“乐天种竹自成园，我亦墙阴数百竿。不与伊家门多少，也能不畏雪霜寒。”

北宋鸿儒罗大经，在他所撰的《鹤林玉露》一书之中，对于苏东坡和白居易两位唐宋名贤，在秉赋性格方面的差异，曾经以第三者的立场，提出了一些较为客观的观点，见载于《苏白》一节称：

东坡希慕乐天，其诗云：“应似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然乐天蕴藉，东坡超迈，正自不同。魏鹤山诗云：“湓浦猿啼杜宇悲，琵琶弹泪送人归，谁言苏白名相似？试看风骚赤壁矶。”此论得之矣。

这是在苏东坡自己认为与白乐天在官场际遇约略相似之后，而居于旁观的局外人，则有不同的看法，和更深入的观察，故认为：白乐天和苏东坡在性情风格上有所不同，也各有所长，白乐天含蓄蕴藉，而苏东坡则是超脱豪迈，各自有别，且看苏东坡所题的《赤壁赋》，便见分晓，也可以作为佐证。

以上所举见载于古籍的各项文献资料，考其由来，均系唐宋两代之当事人，亲由二贤留于诗作之中的自白，和已往历代文坛，不同名家出自笔下的见证，在不同的篇章里，显示出部位各异的轮廓，最后则归纳综合呈现出真相全貌，使得白香山在偶然之间，创下了“东坡”这个名词，而苏东坡于感慨之际，使用了“东坡”以为号称，这一原由与根据，有更为清晰的显示，和可据为凭的佐证。

（四川大学古籍整理研究所客座教授）

江澄格《“我甚似乐天，但无素与蛮”——为“东坡”寻注求解》附录：

白居易与苏东坡生平相关背景资料对照表

区分	出生年月日	生肖	进士及第	年龄岁肖	科别	被滴案由	案发年月岁肖	时年	处分情形	宦途低潮朔望岁肖	同官秉政	受命年月官职	在职时辰	西湖筑堤岁肖	城中井	被召还朝	时年岁月
白居易	唐代宗大历七年正月二十日在壬子	鼠	贞元八年(792)岁在壬申	二十一岁猴年	制科进秩	新井时案	元和十年(815)岁在乙未八月	四十四岁	贬离长安赴任所	江州司马元和十一年(816)岁在丙申猴年	杭州刺史	长庆二年(822)七月自中书舍人除杭州刺史	百日(822)	长庆四年(824)西湖筑堤白堤龙年甲辰	长庆四年(824)浚城中龙井六年	文宗大和元年(827)三月召拜秘书监岁在丁未	五十六岁羊年
苏东坡	宋仁宗景祐元年(1036)十二月十九日在丙子	鼠	嘉祐元年(1056)岁在申	二十一岁猴年	制科进秩	乌台诗案	元丰二年(1079)岁在乙未八月	四十四岁	押解返京下乌台狱	黄州团练副使元丰三年(1080)岁在庚申猴年	杭州刺史	元祐二年(1087)三月除龙图阁学士知杭州	百日(1087)	元祐三年(1088)西湖筑堤苏堤龙年戊辰	元祐三年(1088)修城中龙井六年	哲宗元祐六年(1091)三月除吏部尚书岁在辛未	五十六岁羊年

黄州，东坡亭文化之奇葩

吴继路

内容提要：中国的名亭往往与名人有关，而如苏东坡一般每到一地建亭、颂亭者却不多，尤其是黄州与东坡有关的亭台，完全可以形成一种文化大观。

关键词：黄州 苏东坡 亭文化 奇葩

一、缘起

中国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亭文化在世界上独树一帜，可惜长时期没有被关注研究。上世纪八十年代，北京陶然亭公园创建了一座“华夏名亭园”，选各地一些著名古亭，按原型制仿建，供游人赏观，此举可谓对中国亭文化第一次播扬。当时笔者深受启迪，开始留心名亭景观与文字资料，写了些记述名亭的游记体随笔。九十年代得幸集篇成册，题为《中华名亭新记》出版。可叹此书时乖命舛，适逢出版单位改制换班，被标称“亭文化首倡书”的这本书堆在库里，未得发行。差可慰的是此书的序文被《人民日报》以《亦雅亦俗亭文化》为题发表，据说这是我国报刊第一次出现“亭文化”一词。此序文撰作者是广州一位老学者，老人家名字恰叫萧亭。由于书作者人轻言微吧，此后亭文化仍默默然乏问津者。本人敝帚自珍，而聊感温慰的，是在那本亭记书里我披露了一个发现：北宋大文豪，享誉千载的顶级文化名人苏轼、苏东坡，他一生乃至身后，竟然与亭有奇缘！他有资格称为中国亭文化的杰出代表。笔者的书里，题材分为三大部分，其一为现存名亭新记，其二为中国戏曲亭故事，其三即标为“苏东坡与亭”。新世纪文化勃兴，对苏轼的研究跨入新阶段，笔者撰写了一篇记述“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的文章，题为《精魂长峙天地间》，载在《苏轼研究》2008年第1期。近年本人再诵大师作品和年谱，发现东坡有相当多记述与颂咏亭子

的诗篇，集中起来精读，可谓赏心益智，满目珠玑。感动之下，拟撰写谈“东坡与中国亭文化”之续篇，题目初定《亭亭欲立东坡魂》。在披览过程中，本人感到东坡一生游宦，足迹遍及西东北南，在他与亭文化的天赐奇缘中，更有一个地方，称得上这奇缘的典型与标志，一个无可替代的东坡亭文化胜地。这地方不是别处，正是大江之畔、对东坡一生成就有重要意义的黄州。黄州地由人传，除了许多值得学者专家探究的课题，我认为黄州正是得天独厚的苏东坡亭文化之奇葩。

本文似就这一个可能算新鲜的题目作初步记述，就教于黄州东道和各地苏学专家学者。

二、本事

说苏东坡与中国亭文化有奇缘，堪称中国亭文化的当然代表，因为他一生经历，大起大落，两遭贬放，四处奔波，在大量诗词文赋作品里，涉及亭的和以亭为题材的篇什比比皆是。这些亭建筑均为当时各处的名胜文物和景点，粗计当在百座以上。我们提到黄州是东坡亭文化的奇葩，因为在他居留黄州的四年多期间，这里因他而建筑，或者因与他生活经历有关联，以致他倾注了情思而升华为传世作品的亭，竟达十座之多。完全可以构成令人瞩目的东坡亭文化群落。这在东坡生活的其他地方是没有的。下面我们就来检阅鉴赏这些独特而珍贵的文化资源。

临皋亭

东坡在朝廷遭遇“乌台诗案”之祸，第一次被贬放到荒僻的黄州。最初他同儿子苏迈在僧寺定惠院借宿。不久家属来了，没有适合的住处，太守就想出主意，把他全家安排到江边的驿馆，这地方叫临皋亭。那里原先是一座亭，后来扩建屋舍，供过

往的官差住宿，名称沿袭仍叫做亭。修整了一番，东坡把全家人凑合安顿在驿亭里栖居，他便成了亭的主人。倘说东坡一生与亭有奇缘，这不恰是一个绝好的例证吗？

临皋亭对东坡确实有不平常的意义。这里不单是他和家人住宿容身之所，也成为他寄情山水观赏风光的窗口，是存储他精神瑰宝的保险箱。当时他年岁正在“不惑”与“知天命”之间，经历了一场冤狱，等于凤凰涅槃，使他对世事人生产生彻悟，心灵在亲近大自然的愉悦中得到升华。而临皋亭恰恰成为天赐的绝佳环境。在一则笔记文里，大才东坡作了这样的描述：“午睡初醒，忘其置身何处，窗帘拉起，于坐榻之上，可望见水上风帆上下，远望则水天相接，一片苍茫。”又写：“东坡居士酒醉饭饱，倚几上，白云左绕，青江右回，重门洞开，林峦岔入。”

这不简直成了神仙日子了么？对于临皋亭周边的景物，他更在一首《浣溪纱》词里作了出色的描述和由衷的赞美：

覆块青青麦未苏，江南云叶暗随车。临皋烟景世间无。

更有一个发生在临皋亭的盎然有趣、千古传诵的故事。一次东坡跟僧人朋友喝完酒，回到家，抄下一首刚吟成的词，调寄《临江仙》题为“夜归临皋”。词的尾句唱：

夜阑风静縠纹平，小舟从此逝，江海寄余生。

词被一位来访的客人看到，却没有瞧见东坡人影。他忽然感到不好，连忙揣了词去报告太守。太守看了词，大惊失色，连忙派衙署兵卒沿江搜寻，乱哄哄折腾了一夜，仍然没找见人影。若是贬官真的出了事，地方首长如何向皇上交代？没料到，太守凌晨再到临皋亭，离老远便听见从屋子里传出声音，那是东坡特有的如雷鼾声。据说这个故事传到京城，神宗皇帝并不相信，他深知东坡胸襟宏阔，知命乐天，他绝对不会走什么轻生的路。

在同东坡有关的许多名亭里，黄州临皋亭非常独特又非常重要。

四望亭

东坡住进临皋亭，虽然加盖了房屋，可那处临江宅基有限，他一家子几代人挤在驿馆里，仍然十分困窘。不单住宿成问题，还有更大的事情是吃饭。东坡贬放黄州，只被授了个团练副使的闲官，

微薄的薪俸养不了家。面对现实困境，再乐观的人也免不了为肚子发愁。太守徐君猷很体恤东坡的处境，便做主把城内一块荒地拨给东坡，供他种庄稼，养家糊口。自此，东坡带领儿子和童仆，开垦生荒，做了种田的农夫。当地人原本管这块地叫“东坡”。名震朝野却遭了冤枉的大文豪苏轼，想到九死一生来到这里，又想到自己敬佩的前朝大诗人白居易，当年在忠州躬耕，种的地也正叫东坡。于是他便用这块活命地的名称做了自己的雅号。这样，苏东坡这名称千古传诵，比起他的本名轼，和他的表字子瞻，都要更普遍更恒久而且更响亮。

为了耕耘侍弄庄稼的方便，同时也为了解决住宿问题，东坡请朋友们帮忙，在东坡园地敞亮处辟出地基，盖了五间草顶泥墙木架构的房子。艺术大师发挥超卓才赋，把屋子里面刷成白色，画上松竹梅和奇石远山，看上去冰清玉洁，一派晶莹剔透。他给屋子取名“雪堂”，是不是因为“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便把它搬到人间来了呢？雪堂盖好，庄稼有了收成，东坡心情转好，便在屋子周围栽树种花，布置成了园林。他历来喜爱亭子，选择盖房地基时候，他特地利用了原来建在那里的一座古亭，叫四望亭。亭修在雪堂南高阜上，是观赏黄州风光的最佳地点。亭为唐代元和年间刺史刘嗣之所建，当时名诗人李绅作过记。二百多年后，东坡见到的亭已经损破。可他对文物古迹情有独钟，刚到黄州，住定惠院时候，他就特地游观过四望亭，留下两首诗：

雨过浮萍合，蛙声满四邻。
海棠真一梦，梅子欲尝新，
拄杖闲挑菜，秋千不见人。
殷勤木芍药，独自殿余春。——其一
高亭废已久，下有种鱼塘。
暮色千山入，春风百草香。
市桥人寂寂，古寺竹苍苍。
鹤鹤来何处，号鸣满夕阳。——其二

东坡的清新诗作题目为《雨晴后，步至四望亭下鱼池上，遂自乾明寺前东冈上归，二首》。作诗时候，他当然还没有想到开垦东坡和雪堂的事。后来营造雪堂，东坡便巧用了古迹，把高阜上的四望亭变为自家园林之一景。

在东坡逝世七十多年以后，另一位南宋大诗人陆游来到黄州，特地到雪堂旧址来瞻拜前贤。他亲见了雪堂中陈列的东坡画像，也走过堂前有东坡手

泽的小桥，还抚摸了一株东坡手植的柳树。他在《入蜀记》中特别写到了东坡四望亭。说：“四望亭，正与雪堂相直。在高阜上。览观江山，为一郡之最。”

九曲亭

元丰五年夏季，东坡亲自操办，建造了规制更大功能更广的亭：西山九曲亭。这座亭就成为景观兼观景名胜，惠及游人，带有“公益”建筑性质。

黄州对岸的风景区叫武昌西山，属武昌县。西山的九曲岭上原本有一座古亭，早已废弃。嗜爱山川风光的东坡，一次跟朋友游览，发现九曲岭上一处平旷地方的亭台旧基。这地方仰观葱岭，俯瞰大江，是个绝佳的观览点。当时东坡便产生了重建亭子的构想。他设想把亭基扩大一些，可惜旁边有数株参天大树，人力难伐。不料，仿佛天公有意玉成此举，一夜大雷雨中，旁边一株巨树被震倒，恰好腾出亭基所需的地方。东坡大喜，赶忙与朋友商量，由山下的王齐愈兄弟出资，招工备料，不久便造修了一座宏丽而舒适的亭子，仍命名为九曲亭。当时弟弟苏辙正来黄州，知道修建亭子的经过，便写了一篇名文《武昌九曲亭记》。文章记述了建亭过程，主旨在表达他弟兄“适意为悦”的情致，那是一种追求与自然和谐的人生态度。十分可贵的是文章的末尾，子由回顾了他们兄弟早在少年时代就寄情山水的情景：“昔余少年从子瞻游，有山可登，有水可浮，子瞻未尝不褰裳先之。有不得至，为之怅然移日。至其翩然独往，逍遥泉石之上，擷林卉，拾涧实，酌水而饮之，见者以为仙也。”

任公亭·师中庵

东坡离京都赴黄州，先到河南新息县，他来这里是为了拜谒一位父辈乡贤任伋的旧居。任公字师中，与东坡父亲苏洵友善，曾任过新息县令。由于他勤政爱民，声誉斐然，被朝廷提拔为泸州知州。在任知州期间，他明智果断地处理当地多年纠结的民族冲突，受到朝廷重视。不料因为遭到奸官诬陷，吃了官司，又被罢黜到遂州任县令。东坡自己有惨痛遭际，对这位正直的长辈非常同情。造访故居之后，他作了一首寄慨诗《过新息留示乡人任师中》，流露远离烂糟官场归耕田园的心绪：“往虽不及来有年，诏恩倘许归田里，却下关山入蔡州，为买乌犍三百尾。”

东坡刚到黄州，连住宿地方都没有，只好借居僧寺定惠院。非常意外，他在寺院发现一座建在绿荫中的雅致小亭，名叫任公亭。一打听，原来亭的

命名正是为纪念任伋大人的。师中先生在黄州做过三年通判，品德政绩给当地吏民留下良好印象。看到任公亭，东坡不禁感到人间真似乎有天缘，他想起早年父亲曾经为任伋到清江上任写过鼓励的话，其中的句子他一直记得：“人生患不出，局束守一廛。未尝见大物，不识天地宽。”想不到如今自己已来到长辈“乡秀”的游宦之地。于是与友人商议，在任公亭西边建一所房舍，准备邀请师中先生到黄州来居留聚会。不久屋子落成，东坡题额为“师中庵”。不料一年后任公病逝，东坡与黄州友人沉痛哀悼，有一百多人到定惠院哭祭，任公亭成了为众僧人舍饭的场所，而师中庵便做了祭堂。东坡作挽词和挽诗，结尾说：“贵贱贤愚同尽尔，君今不尽缘贤子。人间得丧了无凭，只有天公终可倚。”

任公亭以及师中庵，因东坡而声名流传，它们有资格成为黄州人祭悼良吏、怀念前贤的纪念性建筑。

快哉亭

元丰六年六月，谪居黄州的名士张梦得（字怀民，又字偃佺），因为极仰慕同时罹难的隽才苏东坡，特地在自己寓居的西南，建造一座居高临下，能通览长江壮丽风光的亭子。他造亭固然为东坡提供便于聚会宴饮的最佳观景点，同时也殷盼能获得天纵大才赐撰的作品。他的意图果然实现了。在亭内观赏风光，南北向开阔，可放眼百里，而东西向险窄，俯瞰大江波涛翻涌，动人心弦，变化万千。东坡欣然允诺，他为新亭取了既宏伟响亮又意味深远、雅俗共赏的名字，叫快哉亭。典出于宋玉的千古名篇《风赋》，而意蕴上又对兰台公子不解浩然之气伟大的陋浅，提出尖锐批评。东坡的这一主旨完全蕴含在一阕名词《水调歌头·黄州快哉亭赠张偃佺》里：

落日绣帘卷，亭下水连空。知君为我新作，窗户湿青红。长记平山堂上，欹枕江南烟雨，杳杳没孤鸿。认得醉翁语，山色有无中。一千顷，都镜净，倒碧峰。忽然浪起，掀舞一叶白头翁。堪笑兰台公子，未解庄生天籁，刚道有雌雄。一点浩然气，千里快哉风。

旷达不羁，得天独厚的张偃佺先生，除了收获大苏一首不朽的词作，还收获到东坡弟弟，小苏子由的一篇名文《黄州快哉亭记》。一位绝对名不见经传偶然留连黄州的小人物，竟如此千古传名了。

苏东坡是中国亭文化的形象大使，当然代表。

至今留存成为名胜文物的亭，因散文而成的，有陕西凤翔的喜雨亭，江苏徐州的放鹤亭，江西石钟山的怀苏亭。因赋而凝成亭建的，有东坡赤壁的问鹤亭。而由创制豪放派风格的词而形成的是酹江亭。倘若黄州人士有意推出亭文化之双璧，或可大胆策划，建造一座大张浩然之风令人一新耳目的快哉亭。

遗爱亭

在黄州城南安国寺的庭院中，竹林掩映树木葱茏，有一座看上去简朴清雅的竹木结构小亭，题额为“遗爱亭”。亭子虽小，却含蕴不寻常的至理、哲理，可称之为“小大之辨”。“大”的意义正寄寓在旷代大诗家、大文豪笔下的一则小文章里。

文章叫《遗爱亭记》，简练精妙，不足百字，且来鉴赏：

何武（足迹）所至，无赫赫名，去而人思之，此之谓遗爱。夫君子循理而动，理穷而止，应物而作，物去而复，夫何赫赫名之有哉？东海徐公君猷，以朝散郎为黄州，未尝怒也，而民不犯；未尝察也，而吏不欺。终日无事，啸咏而已。

文尾有几句话交代与徐太守的交往，以及受托为亭撰写记文和题名的经过。东坡居留黄州的四年多，与徐太守交游甚密，受到过太守的照顾，解决了他不少生活上的困难。元丰六年，太守将离任，人们在安国寺建一座亭表达对他的钦敬和怀念。徐公原本托当时住在东坡家的同乡僧人巢谷撰文。东坡明白太守的心意，便以巢谷名义写了亭记，并为遗爱亭书额。徐君猷只是一位普通官员，纯属小人物，他当然料不到自己能得到大文豪的褒扬，青史垂名。这不正体现了“小中见大”的道理吗？

万松亭

东坡被谪放来黄州，家人由弟弟陪护走水路，自己同大儿子苏迈一起走旱路。他从京都出发，南行经陈州、蔡州，正月二十日来到麻城。过春风岭时候，东坡如鸟出樊笼，心情豁然，作了《梅花二首》。不久经过关山万松岭，看见一座亭和周围情景，只教他感慨万端，于是创作了一首咏亭诗——《万松亭并叙》。这经段历不免引人联想：是东坡真的天命与亭有缘呢，还是他原来对亭有情——情有独钟呢？

万松岭在麻城县西一百里，万松亭是为了纪念一位县令在任职期间一项利民举动而修建的。县令

名叫张毅，字仁甫，熙宁年间受命任麻城县长官。他主持一项利民事业，号召和组织吏卒官员以及百姓在万松岭路两侧栽种松树，坚持下来，几年间植树达万余株。人们看到葱茏蔽天，绿荫匝地的景象，行人走在路上，冬能蔽风，夏可乘凉，享受舒适环境。为了纪念这项绿化的功德盛事，当地人特地建造了一座亭，取命万松亭。可是东坡来到万松岭时节，看到的却是让他叹息感伤的景象：时间刚过去十几年，张县令主持绿化栽种的松树，不少被滥砍乱伐，存活的不过十分之三四，眼前呈现一片荒弊衰败景象。一贯倾心关注民瘼、留心风俗的东坡，面对如此情景，不禁心潮起伏感慨万千。他尤其想到古人的话：“一年之计，树之以谷；十年之计，树之以木；百年之计，来之以德。”他也想到《诗经》的教训：“我仪图之，爱莫助之”。东坡《万松亭》诗写道：

十年栽种百年规，好德无人助我仪。

县令若同仓庾氏，亭松应长子孙枝。

天公不救斧斤厄，野火解怜冰雪姿。

为问几株能合抱，殷勤记取《角弓》诗。

在这首七律诗里，东坡充分表露了他对时人与后人的殷切期望：要以古圣先贤的教导为标仪，发扬“好德”精神，多做益事善事。东坡的诗稿被当地乡贤镌刻在万松亭的碑上，成为警句箴言。料不到，大才东坡与亭的奇缘竟然还有后续故事。东坡一生大起大落，两次遭到政敌诬陷被罢官流放。第二番受难在元祐年间，这一次贬放得更远，先到岭南惠州，再到海南儋州。后面这一次严酷的惩罚不仅施于人身，还殃及文字，他的诗词文字遭到朝廷严令禁毁。结果刻在万松亭石碑的诗也被砸破了。而后来有位叫倪涛的文人，鄱阳人，很为东坡的遭遇抱不平，曾经留下诗句追述这件事，其中两句话说：“旧韵无仪字，苍髯有恨声”。可见公平自在人心，历史的裁判才是最后的。

岐亭

离开万松岭万松亭之后，东坡继续赶路奔黄州。出乎意外地喜从天降：走到麻城北面一个叫岐亭的地方，忽然看见前边有白马青盖来迎接他。待来人滚鞍下马大声寒暄，东坡才惊喜：迎他的人原来是阔别多年的故交陈季常。季常名陈慥，是当年任过凤翔知府的陈希亮的四儿子。东坡二十七岁那年，第一次被朝廷授官职，做凤翔府签判，陈知府是他的顶头上司。东坡与季常年岁相当，性情投缘，

成为至交。可是此后天各一方，近二十年间并没有来往。这一回他乡遇故知，患难中的东坡自然异常欣喜。季常把东坡接到家中盛情款待，居留畅谈五天之后才离别。此后东坡在黄州生活四年多，与陈慥交往最密，他们诗酒往还，情谊极深。东坡四次去岐亭造访季常，而季常则七次到黄州拜望晤谈东坡。他们的深挚情谊留下了一个突出的或者说唯在东坡身上才可能产生的文学典故，后世传为佳话：东坡首次遇见季常，便用一首长篇古诗记述了当时的情景与心境。此后每一次见面之后，东坡便用同一韵脚，赋一首同样篇幅的诗。直到元丰七年东坡离开黄州，陈季常一直送到九江，东坡写了最后一首同韵诗，构成罕见的系列组诗，取命《岐亭五首》，成为诗歌史上记诵友情的杰作。岐亭原本是麻城一处古镇的名字。小镇东临举水，西面有倒水，古道在那里分了岔，当年那里或建有一座亭，便名为岐亭。本来是默默无闻的普通村镇，料不到因缘际遇，由于大文豪大诗人的诗文而出了名。东坡还写过一篇《方山子传》，记述与陈慥相遇的事，刻画了这位旧友抛却富贵功名，特立独行，甘心做“异人”侠士，过隐居生活的情形。文章被后人赞为“跌宕有奇气”。人也罢，事也罢，文也罢，诗也罢，在东坡与黄州亭文化的意味上，人们可以从岐亭诗和相关故事参悟其中的关联。

酹江亭

在中国文学史上，苏东坡是著名的具有开创性的大师。作为诗的国度，诗歌在唐宋时期，出现了被称为“长短句”的词。词在发展过程中，原来以讲究音律调和，内容抒发个人情怀，风格清丽婉约为主体为正宗。到了苏东坡，他以超卓的才华，浩瀚的胸襟，用高旷雄健的气派，把世事人生的重大题材引入词中，于是词的表达空间大为拓展，开创了豪放派。东坡开创了文学艺术的先河，影响至远至深。而被公认为雄健豪放派的代表作品，便是东坡在黄州时创作的《念奴娇·赤壁怀古》。这时候，他的生活发生大转变，经过生死考验，他对世事人生有了彻悟，以一种解脱的心境，亲近自然，审视历史，但他并不悲观颓丧，“适意为悦”的追求更真挚更深切了。如此的情思心态，他在《赤壁赋》里作了细微生动的具体描述，而更精练更升华的表达，则在他传诵千古的《念奴娇·赤壁怀古》中。面对“大江东去”，如画的壮丽山川，缅怀豪迈的英雄人物，浩然情怀倏然涌上心头。大诗人把宏浑

的意境，用铿锵词语作了淋漓的抒发，意蕴题旨归结在最后一句话上：“人生如梦，一樽还酹江月！”西方人把建筑叫做“凝固的音乐”，在黄州，雄视万代的豪放派创始者的这篇代表作，就凝固成一座标志性的建筑：东坡赤壁内最引人瞩目的亭——酹江亭。

问鹤亭

现在东坡赤壁景区内，还有一座纪念亭，是用东坡名作后《赤壁赋》命意建造的亭，名叫问鹤亭。这座亭为现代人所建。亭址原来景点是玩月台，1922年改为问鹤亭，显然是个聪明的构思。

明代著名文士李东阳说过，黄州东坡赤壁“不直山水之佳，盖子瞻二赋为之增重也”。酹江亭凝注了前《赤壁赋》和《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命意。后《赤壁赋》的音乐主旋律便由问鹤亭来播扬。后赋的写作，文胆和看点均与前赋有区别。奇文共欣赏，此文悦目赏心的是东坡“适意为悦”的情致和绮丽超绝的浪漫精神。极具魅力的有两处描写，其一是跟朋友泛舟江上赏月以后兴犹未尽，东坡乘着酒兴舍舟登岸，独自攀上山顶，孩子似的爬上树，惊飞了鹞鸟，尔后他尽情长啸起来。其二，更绝妙的是写他的梦境，前者为实写，后者为虚写：

须臾客去，予亦就睡，梦一道士，羽衣蹁跹，过临皋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游乐乎？”问其姓名，俯而不答。呜呼噫嘻！我知之矣。畴昔之夜，飞鸣而过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顾笑，予亦惊寤。开户视之，不见其处。

梦是人类共有的精神现象，自有文字文学以来，世界上不知出过多少写梦的名篇佳什。而提到中国历史上写梦的经典，除了大哲庄子独卓创造的“梦蝶”成为大典故，东坡这篇写梦文字，美妙超绝，引人遐思无穷，读来使人恍惚进入“冯（凭）虚御风，羽化登仙”境界，其艺术魅力无与伦比。把这样的才思创造“精神变物质”，具象为一座可观可登，供畅幻遐想的亭，问鹤亭算得上亭文化的极品。

三、建言

以上所梳理的史迹史料，是苏东坡黄州居留时期与他有关系的亭。最后两座已成为文物景观的建筑。其余的八座情况来历不同，可分为四组：

（下转第70页）

由苏轼《琴诗》引发的美学论辩

涂 途

内容提要：论文从我国当代美学家朱光潜、洪毅然等引用苏轼《琴诗》在美学大讨论中作为支撑自己理论观点论据说开去，并且从四个方面分析了这首诗空灵隽永、朴质清淡的意蕴。

关键词：苏轼 琴诗 美学思想

宋神宗元丰四年（1081）六月，贬谪黄州的一代诗词大家苏东坡，接到彦正判官送来的一张古琴。他面对放在精雕细刻、鲜艳夺目琴匣中的这张玲珑剔透、百看不厌的美琴，不禁心潮起伏、浮想联翩。这时正巧好友海印禅师纪公来访，他便从匣中将琴取出，请他随同前来的侍者弹奏。一曲接着一曲，乐声飘舞、悠扬悦耳。苏轼对音乐无比爱好，听完弹奏，心旷神怡，诗兴大发，随口吟出一首偈诗，道出了让人思考和解答的疑团：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予君指上听？

在苏轼今存诗篇中，《琴诗》是一首有代表性的理趣诗。在短短的四行 28 个字的诗篇里，作者以质朴而带幽默的口吻，对包括音乐美在内的艺术美的本质，用发问的方式提出悬念，耐人寻味，发人深思。尤其让读者感兴趣的是，在我国学术界几次掀起的美学大讨论中，这首千年古诗竟被一些美学家引用，作为各自理论观点最有力的依据和阐释。双方均以此诗为例，唇枪舌剑，各持己见，以表明自己观点的正确。

最早引用此诗的是我国老一辈著名美学家朱光潜，他在《新建设》（1958 年第 4 期）上发表的《“见物不见人”的美学——再答洪毅然先生》一文中，为反驳另一位美学家洪毅然对他的“美是主客观的统一说”的批评，便以苏东坡的《琴诗》印

证：“说琴声就在指头上的就是主观唯心主义，也就是我过去的看法；说琴声就在琴上的就是机械唯物主义，也就是蔡仪、李泽厚、洪毅然等人的看法。说要有琴声，就要有琴（客观条件），又要有弹琴的手指（主观条件），总而言之，要主观与客观的统一。这是苏东坡的看法，也是我的看法。管这种看法叫什么主义，听深思的读者们决定吧。”

洪毅然阅读朱光潜的这篇文章后，立即写了一篇《戏续苏诗答朱先生》。这首续苏诗如下：

若言琴上有琴声，放在匣中何不鸣？
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予君指上听？
若言声在入心中，何不尽造无弦琴？
志在高山流水意，伯牙琴碎不复闻。
指与琴会琴声作，琴声自在指琴间；
果然心能令琴响，何劳君指挥五弦？
以心使指指拨弦，琴弦振动出琴声；
声本无情而有情，以天合天心物泯。
指随心运鼓宫角，抑扬迭宕清浊分；
嘈嘈切切错杂弹，感物而动情乃真。
主观客化即物化，喜怒哀乐寄声文；
声波荡漾时空里，时空属物非属心。

洪先生是属于朱先生所指责的“机械唯物主义”一派的美学家，其实他与朱先生论敌蔡仪、李泽厚等人的观点并不完全相同。按照他自己的表述，“大同中仍存小异”，“同道或竟加号曰‘社会功利学派’，似乎居然也算独树一帜”。

几十年后，当上世纪 80 年代在我国重新掀起的另一次“美学热”中，由蔡仪主编、我负责具体编辑的《美学讲坛》丛刊第二辑（广西人民出版社 1988 年版）上，洪毅然又旧话重提，再与朱先生展开论辩。这一期丛刊发表了他的《美是什么、美在

哪里、美从何来》一文，对我国美学界存在的不同观点以及他个人的看法，进行了系统地论述和说明。其中有这样一段文字：“50年代朱光潜先生曾在答我的文章中，引用苏东坡《琴诗》，为其‘主客观统一说’辩解。……苟不深思，似颇雄辩，很有说服力。后来，我也写了一首《戏续苏诗答朱先生》的打油之作，阐明我的观点。”

在重录以上答朱先生的这首诗后，洪先生进一步解释：“值得注意的是：例如‘琴声’之类艺术的美——艺术美，虽然可以说是‘主客观的统一’。（因为凡‘艺术’，皆非‘外师造化’，又‘中得心源’不可。）然而，不应忽略：由‘自然之竹’而‘胸中之竹’（自然物象反映于人的意识领域，成为胸中意象），再由‘胸中之竹’而‘纸上的竹’（意象外化于作品，成为艺术形象）。经此过程所创作出来作为观众欣赏对象的、实实在在具体可感的作品，实际又已成为不折不扣物质性的客观存在了（存在于人的意识之外）。否则，岂能被观赏而给观赏者提供审美感受之依据？”接着，洪先生又强调指出：“由此可见，即使是‘艺术美’——艺术作品的‘美’，仍然不可能否定其客观性（尽管它带有‘意识形态性’）。至于‘自然美’——自然事物的‘美’（以及其他‘现实美’），那就更不消说，尤其既非主观的（存在于人的主观心灵中），亦非主客观统一的（存在于主客观之间——两者的‘关系’中）。 ”

遗憾的是，可能朱先生这时已年迈体弱，加上其他任务繁重，再未以《琴诗》与洪先生作答辩。现在，两位著名美学家均已先后离开人间，这件美学公案似乎已为读者淡忘。我们没有必要在这篇短文中去追寻以朱光潜和洪毅然为代表的两派美学观的是是非非，只是想借我国美学史上的这一难得佳话，解析一下为什么苏轼《琴诗》会为美学家如此重视而又理解不同。

如前所说，苏轼的《琴诗》是接到彦正判官赠送古琴后而回赠的作品，诗前写有小序，序云：“武昌主簿吴亮君采，携其友人沈君十二琴之说，与高斋先生空同子之文、太平之颂以示予。予不识沈君，而读其书如见其人，如闻十二琴之声。予昔从高斋先生游，尝见其宝一琴，无铭无识，不知其何代物也。请以告二子，使从先生求观之。此十二琴者，待其琴而后和。元丰五年闰六月。”虽然这段小序，以及《琴诗》本文，都未明确描绘所得之琴的形状

和性能，但对于读者欣赏和理解这首短诗的旨意，仍然不无小补。

首先，苏轼的《琴诗》在内容和形式上都有特殊之处。它质朴无华，明白晓畅，通俗易懂，易于接受。这首诗分别以两句诗组成一联，每联先设一个假定的前提，然后再提出疑问，而这种疑问又是以问句的形式进行否定，否定中又暗含了肯定之意。作者紧紧围绕琴声由何而来这个主题，先从假定“若言琴上有琴声”，然后提出“放在匣中何不鸣”的疑问，这是一个方面、一个角度、一种思维方式，答案究竟是什么，有待读者思索。但是，似乎针对着悠扬的琴声并非来自琴本身而是由于人手指的弹奏这个答复，诗人立即再提出相对应的另一方面的问题，即“若言声在指头上，何不于君指上听？”矛盾的两个方面相互依存而又相互排斥，在前一个答案否定的基础上，又否定了第二个答案。两个貌似正确的答案都被否定，只有另寻蹊径。其实，照苏轼看来，正确的解答不言自明：“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非此亦非彼，而在相互依赖、相互作用。这恰恰为提倡“主客观统一说”的美学家朱光潜等所看中和利用。

第二，《琴诗》独出心裁，独具匠心。既非描景，亦非写物，只问不答，只驳不辩，问中隐答，答中存问。上联肯定中有否定，应答中再存疑。两联相扣紧密、紧凑，借物言理，言近意远，意在其中，言外之意。虽为论辩诗却无断言，含而不露，言犹未尽，直截了当，结论交给读者。难怪此诗曾经遭到有些人质疑：“此随手写四句，本不是诗，搜辑者强收入集，千古诗集有此体否？”其实，诗贵创新，不拘一格，不能从表面现象而囿于旧有古体，一成不变。苏东坡写了二千七百多首诗，其中有许多成为绝无仅有，独领风骚的佳篇，而《琴诗》自成一家，看似直白而蕴涵深厚，富有禅机，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诗味、韵味独特。赵翼《瓯北诗话》说：“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大观。”这就是朱光潜在文章中以同样方式所言：“管这种看法叫什么主义，听深思的读者们决定吧”！

第三，苏东坡的这首《琴诗》之所以为美学家们津津乐道，争辩不休，还由于它因物寓理，即景寄意，从寻常的、普通的事物中，提出了深奥的古老的哲学和美学问题。诗人从“琴”与“指”这两

个形象入手，通过两个假设句和两个反问句，揭示了“艺术美的主客体关系”这样深刻的哲理。主体和客体，“琴”（客观事物和对象）与“指”（作为主体的人的手指以及操纵它的主观意识和意志），两者之间的关系和作用，历来是人类探讨的“斯芬克斯之谜”。马克思曾经写道：“只有音乐才能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感的耳朵说来，最美的音乐也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说来才有意义），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所以社会的人的感觉不同于非社会的人的感觉。”（《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第125～126页。）千年前的苏轼当然不会懂得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但毫无疑问，从《琴诗》中可以看出，他已具有朴素的辩证思想。

最后，我们从《琴诗》中还可了解，苏轼在黄州写这首诗时，正处于矛盾的环境和矛盾的思想转换过程中。他虽处逆境，却并不悲观厌世；磨难重重，仍保持乐观向上、风趣诙谐。同时，受中国古代慧能创立的中国禅宗思想文化的影响，使自己的创作无论在内容还是形式上多少都有些转变。元好问说：“诗为禅客添花锦，禅是诗家切玉刀。”《琴诗》把禅意引入诗中，以禅入诗或以禅喻诗，可以作为一首偈诗。它以提问的方式，寓深邃的禅意和理趣于诗行诗句之中。命意新颖，意在言外，新意妙理，余味不尽。禅宗反复强调，悟性要从自身心中去寻找。《楞严经》曰：“譬如琴瑟、箜篌、琵琶，虽有妙音，若无妙指，终不能发。”传统禅学之所以主张“背境观心”、“凝心入定”，在于它认为人的心本不清净，佛性只有通过苦修才能获得。而禅宗则认为，“真如佛性”的“心”，才是宇宙的实体，世界的本原，“佛性本清静”，圣者与凡者的界线仅仅在“一念”之间，“何不从于自心顿现真如本性”。《琴诗》借“琴”和“指”的具体形象，从正反两个方面和互相之间的关系，试图说明这个深刻的禅理。其实，美学上的“美”和“美感”是有本质区别的两个概念，音乐家歌唱和弹奏出的优美的乐章，是不能脱离客观的物质器官（如人的发声系统）和器具（如琴瑟琵琶等等乐器）作为前提和基础的，美感只是美的感受和反映。美学家朱光潜，尽管自称要努力学习和运用马克思主义于美学研究，可曾经受过的禅学影响，依然会时时若即若离、若隐若现。

总之，东坡居士在黄州留下了无数千古传世名句，而这篇空灵隽永、朴质清淡的《琴诗》，以及美学家们在论战中围绕着它的不同解说，足以证明，其文其诗均达到“文理自然，姿态横生”，“涣然如水之质，漫衍浩荡，则其波亦自然成文。”正如叶燮《原诗》说：“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我们纪念苏轼以及以他为代表的我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大家、大师，就一定要学习和发扬他们高风亮节、勇于创新的精神！

（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

（上接第9页）

4. 关于东坡文化符号的产业开发和经营问题

来自四川省的专家、学者提出，在当今社会，东坡文化符号与东坡文化产业创意发展，对推进社会进步与经济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战略意义和十分重大的现实作用。他们说，北京眉州东坡餐饮集团，运用东坡文化符号，传承东坡美食，以东坡文化为核心，融入现代经营理念，结合现代餐饮产业运作模式，打造成为一家以餐饮为主，食品加工，物流为辅的大型餐饮集团。由于东坡文化符号的系统化，使“眉州东坡宴”被评为中国名宴，该企业被评为餐饮名店，并获北京市和谐劳动关系先进单位，2008年成为北京奥运会餐饮服务商，成功地让东坡美食成为世界美食。北京眉州东坡餐饮集团成为东坡文化符号产业的先行者和成功的范例。为此，我们建议，市委、市政府派相关政府职能部门，采取招商引资的方式，运用招商引资的政策，招引北京眉州东坡餐饮集团到黄州办店办厂，安营扎寨，为推进我市东坡文化符号产业的开发、生产和经营，发挥引领作用。

此外，一些专家、学者对黄梅戏《东坡》也提出了建议。他们说，历史可以艺术地再现，但不能颠覆。这个戏还要认真研究一下，尽量使艺术真实符合历史的真实。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

博求“三通”：苏氏蜀学的形神与风骨

彭 华

内容提要：汉晋、两宋、晚清民国，是蜀学发展的三次大高潮；其中，两宋时期是巴蜀文化“空前”而“绝后”的高峰。眉山三苏是两宋巴蜀文化的杰出代表，苏氏蜀学是两宋区域文化的璀璨成果。三苏之学思，辉煌展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苏氏蜀学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有百科全书之气度。三苏及其蜀学，岸然而为不可超越之高峰，洵然而为后世学习之榜样。

关键词：三苏 蜀学 打通古今 融通百家 会通三教

引子：历史长河中的苏氏蜀学

博考载籍，“蜀学”一名而含三义：学人、学校、学术^①。毋庸置疑，“蜀学”是巴蜀学术的代名词，更是巴蜀文化的灵魂^②。统观蜀学，峰回路转，在绵绵历史长河中涌现过三次大高潮，每次都对中国学术、思想、文化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第一次高潮是汉晋时期。文翁兴学，蜀郡“由是大化”，“蜀地学于京师者比齐鲁焉”（《汉书》卷五十九《循吏传》）；士子学成归蜀，“还以教授”，“学徒鳞萃，蜀学比于齐鲁”（《华阳国志》卷三《蜀志》）。文学：汉赋四大家，蜀人独揽三席（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哲学：蜀学渊渊，夙重哲思；君平以后，子云续之^③。第二次高潮是两宋时期。文学：唐宋八大家，蜀人独得其三（三苏）。史学：“唐后史学，莫隆于蜀”，“隋前存书有二（按：即《华阳国志》、《三国志》），唐后莫隆于蜀”^④。经学：《易》学特别发达，有“《易》学在蜀”之盛誉（程颐语）。学派：三苏之“蜀学”，与二程“洛学”、王安石“新学”鼎足而三。第三次高潮是晚清民国时期，以出思想、出人才著称全国，一度跃居为中国学术的重心之一^⑤。

就区域文化而言，两宋时期的巴蜀文化无疑是“空前”的高峰，而且很可能是“绝后”的高峰。苏氏蜀学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中国历史文化之大成，

眉山三苏，挺生于巴山蜀水，傲然而为两宋巴蜀文化之杰出代表；苏氏蜀学，含光于华夏大地，巍然而为两宋区域文化之璀璨成果。通览三苏之学思，辉煌展示蜀学之形神与风骨，堪称蜀学之上佳典范。苏氏蜀学立意“打通古今”，注重“融通百家”，力求“会通三教”，集历史文化之大成，有百科全书之气度。三苏及其蜀学，岸然而为不可超越之高峰，洵然而为后世学习之榜样。

“打通古今”：通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人所共知，无所继承，便无所创新。换言之，只有在继承前人成果的基础上，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创新、有所超越。后人所云“古为今用”、“稽古揆今”，与此约略相近。此理乃今人所共知之常识与通识，实则于古人亦然^⑥，于三苏亦然。但与徒然托之空言、枉然空言虚语者不同的是，三苏之“打通古今”，旨在通过对历代兴衰治乱之陈迹的考察，以探求当下治世之道。套用苏辙的话说，“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⑦。

表面看来，苏洵（1009～1066）治学驳杂，好谈古今之事、用兵之道、纵横之策；但驳杂中有其宗旨存焉，即旨在通过考察历代治乱兴衰之迹，以探索当下治国之道。苏洵自陈，“洵著书无他长，及言兵事，论古今形势，至自比贾谊。所献《权书》，虽古人已往成败之迹，苟深晓其义，施之于今，无所不可”^⑧，所论“大抵兵谋、权利、机变之言”^⑨。诚因如此，苏洵对明于治乱的贾谊（前200～前168）、陆贽（754～805）是推崇有加。苏辙说：“昔先君博观古今议论，而以陆贽为贤。吾幼而读其书，其贤比汉贾谊，而简炼过之。”^⑩

再来看看同时代人及后人的评价。

欧阳修（1007～1072）于三苏有知遇之恩，对苏洵的推荐与评价尤其入木三分。欧阳修说，“其议论精于物理而善识权变，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其所撰《权书》、《衡论》、《机策》二十篇，辞辩宏伟，博于古而宜于今，实有用之言，非特能文之士也”，实乃“通经学古，履忠守道之士”^①。

后人邵伯温（1057～1134）亦云，苏洵“有战国纵横之学”（《邵氏闻见后录》卷十四）。同时代人曾巩（1019～1083）敏锐地发现，苏洵虽“好为策谋”，“颇喜言兵”，但“大究六经、百家之说，以考质古今治乱成败”；且“务一出己见，不肯蹈故迹”^②，目的在自成一家之言。

俗话说，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语用之于苏氏父子，全然适用。苏洵“自比贾谊”，其子苏轼、苏辙则以贾谊、陆贽为榜样，而在古今观上亦一如乃父。

苏轼（1037～1101）的这一立意与追求，在其早年即已显露。据《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记载，苏轼“生十年，父洵游学四方，母程氏亲授以书，闻古今成败，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范滂传》，慨然太息，轼请曰：“轼若为滂，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邪？”由此看来，苏轼兄弟考察历代治乱之迹、探索当代治世之道，不但出于父亲的教诲，同时还有母亲的教导。成年之后，苏轼又自述，“轼生二十有二年矣。自七八岁知读书，及壮大，不能晓习时事，独好观前世盛衰之迹，与其一时风俗之变。自三代以来，颇能论著”^③。在苏轼看来，“论兴亡之先后。考古以证今，盖学士大夫之职，而人主与群臣之所欲闻也”^④。这是苏轼的价值关怀，也是苏轼的读书旨趣。诚因如此，苏轼曾乞朝廷校正陆贽奏议，以为“治乱之龟鉴”^⑤。

父兄的价值关怀、读书旨趣，苏辙是瞭若指掌、瞭然于胸。苏辙说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⑥。“乌台诗案”起，苏轼锒铛下狱，苏辙上书营救。其中数语，对苏轼之禀性剖幽析微，深入骨髓，“臣窃思念，轼居家在官，无大过恶，惟是赋性愚直，好谈古今得失”^⑦。对于苏轼、苏辙兄弟的手足之情，史书是不吝笔墨，“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无少怨尤，近古罕见”（《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对照上述引文，此论的

当。

生物学上有所谓“家族遗传”之说，而中外文化史上所谓“家族现象”实则多矣！明晰苏洵、苏轼之“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对苏辙古今观之了解，实已奠定基础。

苏洵、苏轼之于苏辙（1039～1112），血缘上自属父兄，学业上实属师友，“予少而力学。先君，予师也。亡兄子瞻，予师友也”^⑧。“父兄之学，皆以古今成败得失为议论之要”^⑨，此对苏辙影响甚深甚巨。苏辙自我剖析，“臣自少读书，好言治乱”^⑩。翻开《宋史》卷三三九《苏辙传》，首先进入眼帘的便是苏辙进策直陈时弊，“苏辙，字子由，年十九，与兄轼同登进士科，又同策制举。仁宗春秋高，辙虑或倦于勤，因极言得失，而于禁廷之事，尤为切至”。宋仁宗为之感动，曰：“以直言召人，而以直言弃之，天下其谓我何？”《宋史》如此而为，可谓用心良苦。

苏辙后来行事之大旨，由此可见其端绪矣，在此毋庸赘述；而苏辙一生著述之主旨，实多根源于此。其最典型，当数《古史》一书。苏辙撰作《古史》之意，即在于考历史之迹，以明治世之道。就中要旨，苏辙自明心迹，“余窃悲之，故因（司马）迁之旧，上观《诗》、《书》，下考《春秋》及秦汉杂录，记伏牺、神农迄秦始皇帝，为七本纪，十六世家，三十七列传，谓之《古史》。追录圣贤之遗意，以明示来世，至于得失成败之际，亦备论其故”^⑪。对于苏辙的《古史》，朱熹（1130～1200）给予高度评价，“近世之言史者，此书为近理”，“秦汉以来，史册之言近理而可观者莫如此书”^⑫。

古语云，“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⑬。古语又云，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⑭。三苏往矣，鸿篇留焉。打通古今，势犹必然。或加留意，或径取法。

“融通百家”：陶冶诸子百家，各有取舍

众所周知，东周之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是为中华文化的第一大高峰。暴秦继起，“以法为教”、“以吏为师”，春秋战国百家争鸣之气象迅即偃息。降而至于汉初，渐有修复气息，但已不复周季之旧观。故后人所云“诸子百家”，多系先秦至汉初学术思想流派的总称。本文所云，亦犹斯旨。

《汉书·艺文志》云，“诸子十家，其可观者

九家而已。……而观此九家之言，舍短取长，则可以通万方之略矣”。三苏之于诸子百家，虽然泛览博观，实则各有取舍，旨在以之为“通万方之略”，目的在自成一家之言。对于苏洵之融通百家，曾巩的评点是，“务一出己见，不肯蹶故迹”^②。可谓知人之言也！当然，对于诸子百家之学，苏氏父子学习的重点有所不同，而取舍的对象亦有所不同。

就求学致思历程而言，苏洵曾经博览诸子百家之书。根据张方平的追忆，苏洵青年时期发愤为学，一度翻然悔悟，“取旧文藁悉焚之，杜门绝宾友，翻诗书经传、诸子百家之书，贯穿古今，由是著述根柢深矣”^③。这一次悔悟自新，可谓难得而又极其宝贵。对于苏洵的学思成就，今人的分析是，其学术思想以儒家为本，又兼收并蓄，吸收兵家、法家、纵横家等先秦诸子百家之学^④。对于兵家，苏洵素有偏爱。《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引苏洵之文二篇，其一即《心术》。通读《心术》，兵家气息扑面而来，如“为将之道，当先治心”，“凡战之道，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凡将欲智而严，凡士欲愚”，“凡主将之道，知理而后可以举兵，知势而后可以加兵，知节而后可以用兵”，“兵有长短，敌我一也”。时人谓苏洵“好为策谋”、“颇喜言兵”^⑤，良有以也！对于纵横家，苏洵并非全盘接受，而是重在借鉴其权谋之术。苏洵尝云，“苏秦、张仪，吾取其术，不取其心”^⑥。

但苏洵之所云，似乎特易致使他人误解。个中缘由之一，端在其对儒家“经”、“权”范畴所作之新解，不由得使人产生“杂而不纯”之印象——即以兵家、纵横家之说诠释儒家经典。如《远虑》所云，“圣人之道，有经、有权、有机，是以有民、有群臣而又有腹心之臣”（《宋史》卷四四三《苏洵传》），确实与正统儒家之诠释颇有差别^⑦。再如《六经论》，朱熹全然不予认可，“看老苏《六经论》，则是圣人全是以术欺天下也”^⑧，所采取的是酷评态势。客观而论，此实系朱熹之误解。因为苏洵尝云，“仲尼之说，纯乎经者也；吾之说，参乎权而归乎经者也”^⑨，此即“以儒家为本”。下文还将对此话题予以辩解，在此不便展开。

就苏轼而论，他对道家似乎更加钟情，尤其对《庄子》钟爱有加。《庄子》之吸引苏轼，除义理外，辞章自然是其大宗。据史书记载，苏轼第一次接触《庄子》便心有灵犀，油然而叹：“吾昔有见，

口未能言，今见是书，得吾心矣。”（《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庄子“善属书离辞”，“其言汪洋自恣以适己”（《史记》卷六十三《老子韩非列传》）；苏轼之钟爱《庄子》，诚属惺惺相惜。南宋伊始，宋高宗便推许苏轼为“文章之宗”；蒙元史臣，对苏轼之文更是褒扬极致，“虽嬉笑怒骂之辞，皆可书而诵之。其体浑涵光芒，雄视百代，有文章以来，盖亦鲜矣”；苏轼尝自谓，“作文如行云流水，初无定质，但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⑩。

相对而言，苏轼对法家则另眼相待，批评颇多。法家之士，“去仁爱，专任刑法而欲以致治，至于残害至亲，伤恩薄厚”（《汉书·艺文志》），此尤为苏轼所鄙弃、厌恶。在苏轼看来，法家置仁义礼乐于不顾，而欲纯以刑法治天下，此乃匪夷所思，“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于无有。夫无有，岂诚足以治天下哉”^⑪。对于先秦儒家与法家，苏轼的总体评价是，“孟子既没，有申、商、韩非之学，违道而趣利，残民以厚主。其说至陋也，而士以是罔其上”^⑫。对于杨朱和墨子，苏轼也提不起兴趣，“使杨、墨得志于天下，其祸岂减于申、韩哉”^⑬。

两相对比，苏辙对道家亦是青眼相待；但与苏轼之钟爱《庄子》不同的是，苏辙相中的是《老子》。苏辙作有《老子解》（即《道德经解》），吸收儒、佛思想注解《老子》，“乃欲和会三家为一”^⑭。《老子解》完成后，苏辙尝寄示苏轼，竟颇得苏轼之赞誉，“昨日子由寄《老子新解》，读之不尽卷而叹：使战国时有此书，则无商鞅、韩非；使汉初有此书，则孔、老为一；晋宋间有此书，则佛、老不为二。不意老年见此奇特”^⑮。无独有偶，苏轼兄弟对法家与道家关系的看法亦有深相契合之处。在《韩非论》中，苏轼认为商鞅、韩非未得老子、庄子学说之真义，并且是歪曲发挥老庄之说，“商鞅、韩非求为其说而不得，得其所以轻天下而齐万物之术，是以敢为残忍而无疑”^⑯。苏辙之持论，与苏轼极其近似，“使人君据法术之自然，而无所复为，此申、韩所谓老子之道，而实非也。彼申、商各行其说耳”^⑰。

对于以上“打通古今”、“融通百家”两大部分之所论，在此需要附加数语，算是补充说明。即三苏父子均雅好贾谊、陆贽之书，并且以贾谊、陆贽为榜样，甚至自比贾谊。推究缘起，中有深意存焉。原因之一，贾谊、陆贽均属博古通今之士，均注重

古今的“打通”，并且明于治世之道。《旧唐书》卷一三九《陆贽传》云：“史臣曰：近代论陆宣公，比汉之贾谊，而高迈之行，刚正之节，经国成务之要，激切仗义之心，初蒙天子重知，末涂沦蹶，皆相类也。”这是后晋时人对贾谊、陆贽异同之处的比较，而清人王夫之（1619～1692）则进一步对贾谊、陆贽、苏轼异同之处加以比较，“贾谊、陆贽、苏轼之三子者，迹相类也。贽与轼，自以为（类）[谊]也，人之称之为者，亦以为类也。贽盖希谊矣，而不能为谊，然有愈于谊者矣。轼且希贽矣，而不能为贽，况乎其犹欲希谊也”^⑩。在王夫之眼里，苏轼已然不及陆贽，更是远远不及贾谊；虽然如此，但三人之相似则不容忽视。其次，就“融通百家”层面而言，三苏与贾谊有心灵共鸣之处。《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云：“廷尉乃言贾生年少，颇通诸子百家之书。”

“会通三教”：会通中古三教，以儒为宗

本处所云“三教”，指的是儒释道三教。其中，佛教外来，道教晚出，故后世之会通三教者多以儒教为可资参照的座标。就逻辑的严密性、思辨的抽象性而言，儒学实有不如佛学者；就对民间社会的影响而言，道教似乎尚强于儒教；但就对政治制度、伦理道德的影响而言，佛教和道教实又全然不可与儒教同日而语。因此，佛教在中国化的过程中，便在伦理道德上自觉地选择了“儒学化”这一路径；而道教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其走向与佛教基本上如出一辙，即在伦理道德上亦不约而同地走上了“儒学化”的道路^⑪。

三苏之于儒释道三教，自有其思想抱负和理论野心，即力求以儒为宗，会通三教。这一取向和旨趣，早在苏洵身上即已涂抹底色。苏洵崇佛，多有方外之交，如圆通居讷禅师、景福顺长老、彭州僧保聪、宝月大师惟简等，僧传将其列为讷禅师法嗣。嗣后，苏轼、苏辙亦博通三教经典，力求会通三教精要；其中，又以苏轼最为典型。职是之故，本部分将以苏轼为重点考察对象，探求苏氏蜀学对三教之会通。

苏轼七岁知读书，“八岁入小学，以道士张易简为师”^⑫。而据《子由生日，以檀香观音像及新合印香银篆盘为寿》载，苏轼兄弟二人早年即已接触释道典籍，“君少与我师皇坟，旁资老聃释迦

文”^⑬。另，《栾城后集》卷二一《书白乐天集后二首》亦云：“少年知读佛书，习禅定。”^⑭被贬谪黄州（今湖北黄冈）后，苏轼“杜门深居”，博览释典、深究佛理，“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⑮。据统计，苏轼有关道家道教内容的诗篇约占其全部诗作的百分之十^⑯。就苏轼六十余年的生命历程而言，他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一直是颇为密切的。据不完全统计，苏轼所阅读的佛经有《楞伽经》、《金刚经》、《华严经》、《莲华经》等。苏轼一生与禅师交游颇广，不少禅师与他保持着颇为密切的关系。苏轼在苏杭及其它地方结识的僧侣（主要是禅师），有慧辩、辩才、梵臻、怀琏、契嵩、清顺、守诠、仲殊、守钦、佛印、道潜、常总、玉泉、佛慧、可久、垂云、思聪、惠勤、惠思、宗本、道荣等^⑰。

禅宗不但影响了苏轼的个人生活，而且影响了苏轼的文学创作；不仅铸造了苏子超然生死的旷达性格，还形成了苏子诗歌文赋的独特风格。就后一层面而言，清人刘熙载（1813～1881）之说可谓晓畅，“东坡诗善于空诸所有，又善于无中生有，机括实自禅悟中来”^⑱。

但笔者最为关心的是，在苏氏蜀学的思想体系中，三教的位置与地位究竟如何。换句话说，三教之于苏氏蜀学，究竟是“拼盘”，还是“熔炉”？套用前人的说法，苏氏蜀学究竟是“驳杂”，还是有“宗旨”？

三苏蜀学之“驳杂”，古人向有定论，但并非的论。宋人朱熹谓苏氏蜀学为“杂学”，故作《杂学辨》以贬斥之^⑲。清人全祖望（1705～1755）接武朱熹之说，谓“苏氏出于纵横之学而亦杂于禅”^⑳。朱、全之说，四库馆臣持认可态度，“苏氏之学，本出入于二氏之间，故得力于二氏者特深。而其发挥二氏者，亦足以自畅其说”（《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四六）。降而至于近世，蒙文通（1894～1968）、钱穆（1895～1990）、侯外庐（1903～1987）亦尝踵武此说。蒙氏云，“北宋儒学，显有三派，为洛学、新学、蜀学，皆于六经有解，各自得立。洛派唯司马光注《老子》，二程理学一派则排斥佛、老，至荆公新学，东坡蜀学，皆深入于佛、老”^㉑。钱氏云，苏氏之学“会合著老庄、佛学和战国策士乃及贾谊、陆贽，长于就事论事而卒无所指归，长于和会融通而卒无所宗主。……非纵横、非清谈、非禅学而亦纵横、亦清谈、亦禅学。实在不可以一格

绳，而自成为一格”^⑤。侯氏云，“三教合一”是蜀学的主要宗旨，“蜀学正是这样一种糅合三教的大杂烩”^⑥。但与朱、全之说不同的是，蒙、钱所云“各自得立”、“自成为一格”，已然暗示苏氏蜀学实非“驳杂”一语可尽之。笔者以为，三苏蜀学虽貌似“驳杂”，实则又有宗旨存焉。所谓“宗旨”者，即道也，即儒门道德性命、经世济民之道也。所谓佛老之学，所谓纵横之学，所谓文章词赋，实则为之辅翼耳。

作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1049~1100)，尝特意为此辨析，“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其次则器足以任重，识足以致远；至于议论文章，乃其与世周旋，至粗者也”，“论苏氏而其说止于文章，意欲尊苏氏，适卑之耳”^⑦。秦观亲炙东坡教闻，所言自当不虚。

《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评价苏轼，“自为举子至出入侍从，必以爱君为本，忠规谏论，挺挺大节，群臣无出其右”。今人云，苏轼思想的主流仍是儒家“见世济用”的精神，在遭逢颠沛的迁客生活中，他“得幸”与佛禅结缘，对于君国社稷一直耿耿不寐，基本上保持了为臣事君的理想与道德，他在等待中也是积极于地方的“邑政”建设^⑧。凡此所述，苏子皈依儒门之旨可以想见矣！就经学著述而言，苏氏对《周易》、《尚书》、《诗经》、《春秋》、《论语》、《孟子》等均有注解（如《苏氏易传》、《东坡书传》、《诗集传》、《春秋集解》、《论语说》、《孟子解》等），且尝颇得朱熹好评^⑨。

在苏轼的视野里，佛老之学、纵横之学，实则可为“道”之辅翼，而文章词赋则为辅“道”之“术”^⑩。易言之，在三苏看来，儒佛道三教之宗旨虽迥然有异，实则百川归海、殊途同归。其高远之目标、宏大之抱负，实在于“会通三教”、“融通百家”、“打通古今”。

苏轼《南华长老题名记》云，“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⑪。苏轼此论，目的在会通儒教与佛教。对于儒教与佛教之功能与作用，苏轼有过一个通俗而有趣的譬喻，“仆尝语述古，公之所谈，譬之饮食，龙肉也；而仆之所学，猪肉也。猪之与龙，则有间矣。然公终日说龙肉，不如仆之食猪肉，实美而真饱也”^⑫。诚因如此，故苏轼对大觉禅师怀琬所倡儒佛融合论是赞赏有加，“是时北方之为佛者，皆留于名相，囿于因果，以故士之聪明超轶者皆鄙其言，诋为蛮夷下俚之说。琬独指其妙与孔

老合者，其言文而真，其行峻而通，故一时士大夫喜从之游”^⑬。在《上清储祥宫碑》一文中，苏轼则对儒道加以会通，“臣谨按：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何思何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如是而已”^⑭。《庄子祠堂记》所持论之旨，与此约略近之，“余以为庄子盖助孔子者，要不可以为法耳”，“庄子之言，皆实予而文不予，阳挤而阴助之”^⑮。进而至于《祭龙井辩才文》，苏轼则立意于三教之会通，“呜呼，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虽大法师，自戒定通。律无持破，垢净皆空。讲无辩讷，事理皆融。如不动山，如常撞钟，如一月水，如万窍风。八十一年，生虽有终，遇物而应，施则无穷”^⑯。就一般层面而言，此实即苏轼所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之旨^⑰。当然，“会通三教”并非杂糅三教，并非“拼盘”，而是以儒为主，熔铸佛道二氏。此中大义，苏辙言之甚明。一方面，“老、佛之道，与吾道同，而欲绝之；老、佛之教，与吾教异，而欲行之；皆失之矣”。后秦姚兴、梁武帝之佞佛，北魏太武帝、唐武宗之灭佛，“二者皆见其一偏耳”。另一方面，“道之于物，无所不在，而尚可非乎？虽然，蔑君臣，废父子，而以行道于世，其弊必有不可胜言者。诚以形器治天下，导之以礼乐，齐之以政刑，道行于其间而民不知，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泯然不见其际而天下化，不亦周、孔之遗意也哉”^⑱。

准此，故笔者在本部分所立论断是：苏氏蜀学之“会通三教”，并非杂凑三教以为“拼盘”，而是“以儒为宗”，合理熔铸中古三教以为一炉。

赘语：创新理念与超越追求

以上所论，着重点在于揭示苏氏蜀学形神与风骨的三大层面，即“打通古今”、“融通百家”、“会通三教”。其实，三苏之立意与追求尚不局限于此，而在于“百科全书”四字。

苏轼尝云，“天文、地理、音乐、律历、宫庙、服器、冠昏、丧纪之法，《春秋》之所去取，礼之所可，刑之所禁，历代之所以废兴，与其人之贤不肖，此学者之所宜尽力也”^⑲。就个人修养而言，苏轼实无愧于此。苏轼才华丰茂、笔力雄健，是北

宋杰出的文学家——系“唐宋八大家”之一，文、赋、诗、词均傲然而为一代大家，故蔚然而为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苏轼又长于书画，书法与蔡襄（1012～1067）、黄庭坚（1045～1105）、米芾（1051～1107）并称“宋四家”，存世作品有《赤壁赋》、《答谢民师论文帖》等；绘画以枯木怪石见长，尤擅墨竹，传世作品有《竹石图》、《古木怪石图》等。苏轼兼通医道，后世流传有《苏沈良方》。在水利、烹饪、养生^⑤等方面，苏轼亦卓然名家。

晚近以来，尤其是进入晚清民国之后，巴蜀人士已然不满于古中国固有三教之援引，更进而广泛及于欧美西学（“第二之佛教”）之援引。此实属时代使然。因为通观中华文化之受外来文化的影响，前后共计有二：一为佛教，二为西学（王国维称之为“第二之佛教”）。佛教中国化的过程业已完成，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而佛教之所以能对中国文化产生巨大影响，实属因缘际会使然。诚如王国维（1877～1927）所言，“佛教之东，适值吾国思想凋敝之后，当此之时，学者见之，如饥者之得食，渴者之得饮，担簦访道者，接武于葱岭之道，翻经译论者，云集于南北之都，自六朝至于唐室，而佛陀之教极千古之盛矣。此为吾国思想受动之时代。然当是时，吾国固有之思想与印度之思想互相并行而不相化合，至宋儒出而一调和之，此又由受动之时代出而稍带能动之性质者也”^⑥。

就“会通中西”一端而言，张颐（1887～1969）、贺麟（1902～1992）、唐君毅（1909～1978）诸人，便是个中显例^⑦。窃以为，未来蜀学之发展，自然不能无视苏氏蜀学之仪轨，且当接续三苏之令绪，并合理借鉴张、贺、唐诸人之努力，即在“打通古今”、“融通三教”、“会通中西”十二字上用力^⑧。

论文注释：

①关于“蜀学”之定义与界说，当今学界尚未统一。本文采舒大刚之说，详见《晚清“蜀学”的影响与地位》，《社会科学研究》，2007年第3期，第165～170页；《代序——论晚清“蜀学”》，《儒藏论坛》第二辑，舒大刚主编，四川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3～19页。

②舒大刚《〈蜀学丛刊〉序》，吴洪武、彭静中、吴洪泽校注《吴之英诗文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按：《〈蜀学丛刊〉序》简洁明晰地回顾了蜀学发展的三次大高潮，本小节的撰写参考该文而

成。

③据萧萧父（1924～2008）云，“五十年代中，蒙文通师偶赴京，贺师（按：即贺麟）为之设宴于颐和园，招（汤）一介和我侍坐。贺师论及蜀学有哲思传统，蒙师举严遵之后续以扬雄为例应之”，故萧萧父有“蜀学玄莹美，君平续子云”之句（《吹沙二集》，巴蜀书社1999年版，第739页）。

④刘成忻《蜀学论》，《推十书》，成都古籍书店1996年版（影印本）。

⑤李学勤说：“从晚清以后，中国传统文化发展的中心位置有所转移，当时迁移的重心，我认为，一个是‘湘学’，一个是‘蜀学’。‘湘学’与‘蜀学’是在那时新形势下形成的人文学术的两大中心。”（《弘扬国学的标志性事业》，《西南民族大学学报》，2005年第9期，第1页。）

⑥宋人罗大经尝云：“望稽古揆今，复君之位，以安天下。”（《鹤林玉露》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⑦⑧、⑨、⑩苏辙《历代论一·并引》，《栾城集》卷七，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⑫、⑬苏洵《嘉祐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十一《上韩枢密书》、卷九《谏论上》、卷九《经论》。

⑭苏洵《嘉祐集附录》卷上。

⑮、⑯、⑰、⑱苏辙撰，陈宏天、高秀芳校点《苏辙集》，中华书局1990年版，第1270、1126、1114、1127页。

⑲欧阳修《荐布衣苏洵状》，《欧阳文忠公集》卷一〇。

⑳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十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㉑、㉒、㉓、㉔、㉕、㉖、㉗、㉘《东坡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七十二《上韩太尉书》、卷四十九《私试策问八首》、卷三十四《六一居士集叙》、卷三十四《六一居士集叙》、卷三十八《南华长老题名记》、卷八十六《上清储祥宫碑》、卷三十六《思堂记》、卷三十五《大悲阁记》。

㉙、㉚、㉛、㉜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1013页、卷四《韩非论》、卷四《韩非论》、卷十一《庄子祠堂记》。

㉝苏辙《书一首（为兄轼下狱上书）》，《栾城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㉞苏辙《自齐州回论时事书》，《栾城集》卷三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㉟苏辙《古史·原叙》，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㊱朱熹《古史余论》，《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

㊲《汉书》卷五十六《董仲舒传》：“制曰：盖闻善言天者必有征于人，善言古者必有验于今。”此系汉武帝诏策贤良中引语，由“盖闻”二字可知，

此乃当时习见之语。

⑩此亦古代习见之语，姑引其二三于下。《汉书》卷七十五《眭两夏侯京翼李传》：“（京）房曰：夫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后之视今，犹今之视前也。”朱熹云：“又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人之视己，不犹己之视人耶？”（朱熹《答赵尚书》，《晦庵集》卷二十九，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朱熹又云：“安知后之视今，不犹今之视昔耶？”（朱熹《答赵子钦》，《晦庵集》卷五十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⑪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十一。

⑫张方平《墓表》，《嘉祐集》附录卷下。

⑬贾大泉《包容并蓄的苏氏蜀学》，《宋代文化研究》第十五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20-243页。

⑭曾巩《苏明允哀词》，《元丰类稿》卷四十一。

⑮关于正统儒家对“经”与“权”的解释，可参看舒大刚、彭华《忠恕与礼让——儒家的和谐世界》，四川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182~193页。

⑯黎靖德编、王星贤点校《朱子语类》卷一三〇，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18页。

⑰以上引文，均出自《宋史》卷三三八《苏轼传》。

⑱汪应辰《与朱元晦书》，《文定集》卷十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⑲苏轼《东坡志林》卷五，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⑳苏辙《古史》卷三十三，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㉑王夫之《文帝》，《读通鉴论》卷二，中华书局1975年版，第72页。

㉒彭华《试论佛教伦理与道教伦理的“儒学化”》，《西华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第14~18、40页。

㉓苏轼《东坡志林》卷六，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㉔苏轼撰、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卷三十七，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015页。

㉕刘文刚《苏轼与道》，《四川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㉖关于苏轼与佛教（尤其是禅宗）的关系，可参看笔者以下二文：《苏轼与佛教人物的交往》，《华夏文化》，1998年第2期；《苏轼与禅师的交往及其影响——兼论苏氏蜀学与三教会通》，《宋代文化研究》第十八辑，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本部分之论旨，读者不妨对照阅读后一文。

㉗刘熙载《艺概》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版，第66页。

㉘朱熹《苏黄门老子解》，《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七十二，《朱子全书》第二十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3469页。

㉙黄宗羲原著，全祖望补修，陈金生、梁运华

点校《荆公新学略序录》，《宋元学案》卷九十八，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237页。

㉚蒙文通《道教史琐谈》，《古学甄微》（《蒙文通文集》第一卷），巴蜀书社1987年版，第327页。

㉛钱穆《宋明理学概述》，台湾学生书局1979年版，第29页。

㉜侯外庐主编《中国思想通史》第四卷上册，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585页。

㉝秦观撰、徐培均笺注《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981页。

㉞张锡坤等《禅与中国文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66~267页。

㉟朱熹曾赞扬苏轼、苏辙的经学著作，“东坡《书解》却好，他看得文势好”，“东坡《书解》文义得处较多。尚有粘滞，是未尽透彻”；“子由《诗解》好处多”，“苏黄门《诗说》疏放，觉得好”（《朱子语类》卷七十八，第1986页；《朱子语类》卷八十，第2090、2089页）。

㊱关于“道”与“术”之别，可参看《庄子·杂篇·天下》。

㊲苏轼《东坡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卷三十《答毕仲举书》、卷三十三《宸奎阁碑》。

㊳苏轼《祭龙井辩才文》，《东坡后集》卷十六，《苏轼文集》，第1961页。

㊴苏辙《历代论四·梁武帝》，《栞城后集》卷十，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㊵苏轼，《东坡全集》，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㊶彭印川（彭华）《苏东坡的养生之道》，《华夏文化》，1996年第4期。

㊷王国维《论近年之学术界》（1905年），《静庵文集》，《王国维遗书》第五册，上海古籍书店1983年版（据商务印书馆1940年版《海宁王静安先生遗书》影印）；彭华选编《王国维儒学论集》，四川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㊸在笔者所撰以下三文中，均有介绍贺麟、唐君毅“会通中西”的文字：《贺麟的文化史观》，《湖南科技学院学报》，2006年第3期，第96~99页；《“同情的理解”略说——以陈寅恪、贺麟为考察中心》，《“中国传统学术的近代转型”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中国·上海，2009年10月，第436~446页；《唐君毅的中国哲学史研究——关于方法论的讨论与比较》，《宜宾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第30~34页。

㊹在《宋育仁与近代蜀学》一文中（待刊），笔者表达过部分相近的意思。

（四川大学国际儒学研究院、古籍整理研究所教授）

试论苏轼对于杜诗的艺术批评与接受

李 新

内容提要：北宋著名诗人、词人苏轼，不仅从艺术批评角度推崇杜诗、首倡杜诗“集大成”说，而且在诗词创作实践中学习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且大量化用杜诗语典。很好地验证了“子美集开诗世界”的诗学论断，在杜诗学发展史以及杜诗艺术接受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苏轼 杜诗 批评 接受

北宋“元祐”文坛领袖、著名诗人苏轼，十分注重对于前代文学传统的继承与发扬，特别是对唐代大诗人、“诗圣”杜甫的作品，从艺术角度做了许多诗学批评，并首倡杜诗“集大成”说。并且，苏轼还在其诗词创作实践中，通过借鉴杜诗表现手法、化用杜诗语典等方式，学习杜诗艺术。以下分而述之。

一、“集大成”说的提出

苏轼对于杜诗的艺术批评很多，如其作《书唐氏六家书后一首》诗云：“杜子美诗，格力天纵，奄有汉、魏、晋、宋以来风流。”①指出杜甫诗才纵横，足以掩盖前代诗坛名家之风流，足见其对杜诗的推崇。其《评七言丽句》：“七言之伟丽者，杜子美云：‘旌旗日暖龙蛇动，宫殿风微燕雀高’、‘五更晓角声悲壮，三峡星河影动摇’尔后寂寥无闻焉。”②从杜诗创作实践角度，列举其雄豪伟丽之句，作为七言丽句之典范。并称：“子美诗，备诸家体”（《辨杜子美杜鵑诗》）③，指出杜诗所具备的多样化艺术风格……

在苏轼的杜诗艺术批评中，更富有诗学价值的是，他首倡杜诗“集大成”说，“集大成”，本为孟子称颂儒家学派创始人孔子之语，出自《孟子·万章下》：“孔子之谓集大成”④，指集前圣先贤之所长，成之于己身；而关于杜诗为中国古典诗歌艺术之“集大成”者的最早评述，应该要上溯至中唐时

期，诗人元稹所作的《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志铭并序》，原文如下：

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殁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⑤

指出杜诗兼集前辈诗人名家之所长的艺术魅力，自有诗人以来，可谓空前；虽未明言，而“集大成”之意，已然呼之欲出。

至北宋，陈师道《后山诗话》中，更有两处记载苏轼之语——“苏子瞻云：‘子美之诗，退之之文，鲁公之书，皆集大成者也’”，“子瞻谓杜诗、韩文、颜书、左史，皆集大成者也。”⑥可见，苏轼乃为杜诗“集大成”说的首倡者。而其弟子、“苏门四学士”之一的秦观，则在其《淮海集》卷二十二，著有《韩愈论》曰：

杜子美之于诗，实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而已。昔苏武、李陵之诗长于高妙；曹植、刘公干之诗长于豪逸；陶潜、阮籍之诗长于藻丽；于是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澹之趣，兼峻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作所不及焉。然不集诸家之长，子美亦不能独至于斯也，岂非适当其时故耶？《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所谓集大成。”呜呼！子美亦集诗之大成者欤？⑦

则继承其师苏轼之论，更加具体而详尽地论述了杜诗艺术“集大成”说的内涵——“积众流之长，适当其时”。可见，经过苏门师生的先后评述，杜诗“集大成”说，最终得以定型。

二、苏轼诗、词中化用杜典

苏轼多在其诗文中对善学杜诗者大加赞赏，如《次韵孔毅父集古人句见赠五首》其三云：“天下几人学杜甫，谁得其皮与其骨？划如太华当我前，跛踈欲上惊嵒峯。名章俊语纷交衡，无人巧会当时情。前生子美只君是，信手拈得俱天成”^⑧；其《书石曼卿诗笔后》亦称引范仲淹《祭曼卿文》语曰：“曼卿之诗，气豪而奇，大爱杜甫，酷能似之”^⑨，称美孔毅父、石曼卿能学杜甫而似之，足见其心目中每以杜诗为诗学标杆。并且，苏轼本人在其诗歌创作中，以杜诗为诗学榜样，加以模学，宋人诗话中对此亦多有评述。

北宋王直方《归叟诗文发源》云：

“读书头欲白，相对终眼青”、“身更万事头已白，相对百年终眼青”、“看镜白头知我老，平生青眼为君明”、“古人相见尚青眼，新贵即今多白头”、“江山万里将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白头逢国土，青眼酒樽开”，此坡、谷所为也。其用“青眼”对“白头”者非一，而工拙亦各有差耳。老杜亦云：“别来头并白，相见终眼青。”^⑩

则列举苏轼、黄庭坚创作中总共六例“头白”对“眼青”的诗联，指出其所用语典，皆出自杜甫长篇五排《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中的“别来头并白，相见终眼青”之句，由此亦足见以苏、黄为代表的宋代诗人，使用杜诗语典之频繁。南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四十一载：“苕溪渔隐曰：东坡诗云：‘图书跌宕悲年老，灯火青荧语夜深。’山谷诗云：‘弓刀陌上望行色，儿女灯前语夜深。’盖皆出于老杜‘厨人语夜阑’之意。”^⑪也指出苏、黄同用杜甫五律《移居公安山馆》颔联之语意。

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卷上称：

杜子美《登慈恩寺塔》云：“回首叫虞舜，苍梧云正愁。惜哉瑶池饮，日宴昆仑丘。”此但方言其穷高极远之趣尔，南及苍梧，西及昆仑，然而叫虞舜，惜瑶池，不为无意也。《白帝城最高楼》云：“扶桑西枝对断石，弱水东影随长注。”使后来作者如何措手？东坡《登常山绝顶广丽亭》云：“西望穆陵关，东望琅邪台。南望九仙山，北望空飞埃。相将叫虞舜，遂欲归蓬莱。”袭子美已陈之迹，而不逮远甚。

⑧

指出苏轼登临诗，化用杜甫同类诗作之语意，然袭其旧语，未能出新，故“不逮远甚”。南宋周必大《二老堂诗话》“东坡寒碧轩诗”条：“苏文忠公诗，初若豪迈天成，其实关键甚密。再来杭州《寿星院寒碧轩》诗，……第五句‘日高山蝉抱叶响。’颇似无意，而杜诗云：‘抱叶寒蝉静’并叶言之，寒亦在其中矣。”^⑨指出苏诗中咏蝉之句，颇类杜甫《秦州杂诗二十首》其四中句，然不及杜诗句意内涵丰厚。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二十六载：“苕溪渔隐曰：《送小本禅师赴法云》云：‘是身如浮云，安得限南北。’此二句乃老杜《别赞上人诗》中全语，岂偶然用之邪？”^⑩以苏诗袭用杜诗一联全语之例，验证其乃有意为之。其书前集卷九亦载：

《高斋诗话》云：子美诗云：“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东坡《题真州范氏溪堂诗》云：“白水满时双鹭下，绿槐高处一蝉吟，酒醒门外三竿日，卧看溪南十亩阴。”盖用老杜诗意也。”^⑪

指出苏轼甚至化用杜甫《绝句四首》其三全篇语意而成诗，更能表明其创作中善用杜诗语典的倾向。

南宋杨万里《诚斋诗话》云：

诗家用古人语，而不用其意，最为妙法。……老杜有诗云：“忽忆往时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饮令心哀。”东坡则云：“何须更待秋井塌，见人白骨方衔杯。”此皆翻案法也。予友人安福刘浚字景明，《重阳诗》云：“不用茱萸仔细看，管取明年各强健。”得此法矣。^⑫

则以苏轼《次韵孔毅甫久旱已而甚雨三首》其三末联，反用杜甫《苏端薛复筵简薛华醉歌》诗语典，以及刘浚《重阳诗》，反用杜甫《九日蓝田崔氏庄》诗中尾联“明年此会知谁健，醉把茱萸仔细看”之语典为例，并强调诗中化用古人语典，当用语不用意，方为上乘。

南宋葛立方《韵语阳秋》卷一称：“杜甫《观安西过兵诗》云：‘谈笑无河北，心肝奉至尊。’故东坡亦云：‘似闻指挥筑上郡，已觉谈笑无西戎。’盖用左太冲《咏史诗》‘长啸激清风，志若无东吴’也。”^⑬指出苏轼《九月十五日，迓英讲〈论语〉，

终篇，赐执政讲》诗，亦化用杜诗语典，并溯源自西晋诗人左思《咏史诗》……

此外，苏轼作为宋代词坛的代表人物，以其广阔的题材视野和独具的豪放超旷之艺术风格，开宋人豪放词的先河，在两宋词史上具有转关意义，向为历代文人所称道，如宋末刘辰翁所谓言：“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辛稼轩词序》），南宋大诗人陆游也称：“试取东坡诸词歌之，曲终觉天风海雨逼人”（《渭南文集》），其词作中亦大量化用杜诗语典，如下表所示：

苏轼诗词名句 ⑬	篇名	杜甫诗句⑭	篇名
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又有何难！	《沁园春》	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致君尧舜上	《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
大江东去	《念奴娇》	大江东流去	《成都府》
樽酒何人怀李白？草堂遥指江东	《临江仙·夜到扬州席上作》	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樽酒……	《春日忆李白》
岷峨雪浪，锦江春色	《满江红·寄鄂州朱使君寿昌》	锦江春色来天地	《登楼》

综上所述，苏轼不仅对于杜诗从艺术批评角度加以推崇，并首倡杜诗“集大成”说，对后世诗人影响深远，而且在其诗词创作实践中，切实对于杜诗的艺术表现手法加以学习，且大量化用杜诗语典，验证了“子美集开诗世界”⑯的诗学论断，在杜诗学发展史以及杜诗艺术接受史上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论文注释：

①、②、③ 苏轼著、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2206页、第2143、2100页。

④ 李学勤《十三经注疏》（标点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69页。

⑤ 元稹《元稹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600~601页。

⑥、⑦ 何文焕《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303~309、666~670页。

⑧ 徐培均《淮海集笺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版，第751~752页。

⑨、⑩ 吴文治《宋诗话全编》，江苏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854、822页。

⑪ 张忠纲《杜甫诗话六种校注》，齐鲁书社2002年版，第44~5页。

⑫、⑬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279、57页。

⑭、⑮ 丁福保《历代诗话续编》，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456~457、141页。

⑯ 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版，第191页。

⑰ 葛立方《韵语阳秋》（影宋刻本），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版，第7页。

⑱ 陈述冬《苏轼词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版。

⑲ 清·仇兆鳌《杜诗详注》中华书局1979年版。

⑳ 吴淑玲《浙东学人仇兆鳌著述钩沉》，《保定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第99页。

（河北省保定学院中文系讲师）



常州苏东坡雕塑

苏研重镇是这样炼成的

方永江

“临大节而不可夺”的人格魅力，“东坡文章妙天下”的文化魅力，苏学研究在东坡当世就已蔚然成风，形成并推动了独树一帜的“蜀学”的横空出世，深刻地影响和改变了许多人的人生和命运。眺望北宋王朝的背影，南宋王朝对天下大势、基本国策和统治思想的检讨、反思、总结和变更，为苏学研究提供了机缘。全面深入研究苏轼的生平事迹，南宋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高峰。可以说，两宋是苏学研究的确立期，元明清是其传承期，二十世纪为弘扬期，改革开放30年掀起了苏学研究的热潮。特别突出的是，1980年9月，四川大学中文系、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和眉山三苏祠在全国率先成立了苏轼研究会。学会每两年召开一次研讨会，迄今，已在苏轼遗迹遗址地的眉山、凤翔、郾县、杭州、黄州、烟台、诸城、徐州、惠州、儋州、栾城等城市召开了16次学术研讨会，数千名苏学专家、教授、学者和党政领导、机关干部出席会议，发表了上千篇的学术论文。学会联络了国内外数百名苏学专家、学者、教授、研究员，具有很强的研究能力和凝聚力，已经成为了中国目前研究苏学的一支重要力量。

2005年，苏学研究迎来了她的辉煌期。年初，经中共眉山市委常委会会议讨论议定、省社科联同意，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址由四川大学迁来了眉山。翌年，市委常委会会议议定，成立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该院于2007年3月16日挂牌；2008年1月1日，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挂靠研究院。这些举措，无一不是眉山文化建设史上的大手笔、大制作。由此，眉山以苏轼大江东去、卷起千堆雪的豪放气派，浓墨重彩地书写出苏学研究重镇的磅礴篇章！

机制创新开创苏学研究新局面

市委、市政府立足打造东坡文化品牌，紧紧围绕保护、发展、继承、弘扬东坡文化，做了大量富有成效的工作。投巨资改扩建三苏祠，新修三苏纪念馆，改造通惠河，重修“中国名楼”远景楼；组织“东坡足迹万里行”活动，对东坡先生曾经为官、生活的16个城市进行了学习考察，将活动情况排成了18集专题片；与央视联合录制了7集电视纪录片《走进中国·眉山》；以东坡遗迹遗址地为名新命名了城市街道，将东坡半身像作为城市标志，以“东坡老家，快乐眉山”为城市名片主题词；继2007年成功举办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之后，2009年又成功举办了了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并于今年隆重举行了庆祝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30周年系列活动。这些举措有力地推动了东坡文化在眉山和全国各地的传承和弘扬，宣传和展示了眉山，提升了眉山在国内外苏学研究界的影响力，在海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

成立直属市委、全额拨款的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受到苏学专家、学者的充分肯定。学术研究机构大都是民间社团，创新机制，提供了组织保证，改变了过去游兵散勇、各自为阵的状况，开创了苏学研究的崭新局面。三苏文化研究院一成立，即聘请了21位省内外苏学专家为三苏文化特约研究员，着手实施《三苏文化研究规划》和《三苏文化创作规划》。《三苏文化研究规划》饱含专家学者、党政领导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心血，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市委书记蒋仁富亲力亲为，为《规划》制定了研究的方法。指出，研究工作要紧紧依靠苏学专家、各大专院校、各专业学会，搞好学术性研究；研究工作要体现开放性，不能只局限于本市，要依托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力量，借鉴前人、国内外人士的研究成果，同时，要紧紧依靠社会各阶层的力量，包括市民的作用，组织文化沙龙，从中吸取有益的

东西；研究工作要注意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结合，不局限于规划，要在规划的基础上大胆创新，大胆突破，让研究者充分发挥其创造性、主动性。从此，苏学研究从无序、散乱到科学、有序，面貌焕然一新。

拨出专款创办《苏轼研究》季刊，每期12万字，发行1000册，免费赠阅全国相关大专院校、图书馆、苏轼遗址地党政领导、苏学专家学者和广大爱好者，实现了几代苏学专家、学者多年的夙愿。设立眉山市文学艺术体育突出贡献奖，每年拿出100万元重奖有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2010年奖额翻番，增加至200万元，体育、社科单列），激励着苏学同人不断出成果、出人才。

2007年底，眉山宣传文化系统有关人员赴泉州学习考察，在与当地党政领导的学习交流中，得知“官办”的泉州闽文化研究院刚成立不久。而泉州的党政领导一听说眉山早就成立了全额拨款事业单位的三苏文化研究院，由衷地赞叹道：“想不到身处内陆的眉山比领改革开放风气之先的泉州，还要先行一步。由此可以看出，眉山党政领导的高瞻远瞩，抓文化事业大发展大繁荣的气魄和决心！”

着力应用开拓苏学研究新领域

机制创新，面貌一新；思路创新，应用研究风生水起。

自宋以来，东坡研究成果迭出，汇成浩瀚无垠的苏学海洋。编辑出版了一大批包括苏东坡诗词、书画、散文、政论等的著作、传记和年谱；成立了多个层面的苏东坡研究机构，发表了一大批研究苏东坡的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大力保护利用和开发东坡遗址、遗迹、遗物，大力发掘东坡文化资源，用东坡名字或诗词命名了一大批城市建筑、旅游景点、企业商铺商品；涌现出了一大批称颂苏东坡生平事迹的小说、诗歌和影视等文艺作品；东坡文化热潮从国内走向国外，欧洲、美国、日本、韩国等国家和地区活跃着一大批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爱好者。这些基础性的研究，为苏学发展打下了坚实基础。

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迁眉、市三苏文化研究院成立以来，创新课题研究方法，采用了网上招投标等方式，顺利推进市委批准的《三苏文化研究规划》，出版、发表了《苏轼为官之道》、《清廉东坡》、《三

苏文化的核心》等一大批高质量的学术成果。

在市委、市政府的关心支持下，我们始终把服务于苏学专家、服务于苏学研究和创作化为自觉行动，致力于服务市委、市政府工作大局，强化应用性研究，相继完成了《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东坡符号与产业创意》、《苏轼遗址地缔结文化旅游联盟的战略构想》等省、市重点社科课题。这些课题综合采用历史与现实相结合、文化与经济相结合、符号与创意相结合、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紧扣东坡文化产业发展主题，揭示了文化产业发展带规律性的东西；既有精辟的论证，也不乏精彩的个案分析，具有很强的可读性；从基础知识普及入手，说理叙事，深入浅出，具有很强的操作性；理论创新，填补了东坡产业发展研究的诸多空白，体现了作者理论创新的智慧和勇气。《概论》获四川省第十四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科研成果奖三等奖；《符号》结项被省社科联专家组评定为良好；《构想》获眉山市第五届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奖二等奖。

深化合作畅通苏学研究新渠道

2007年11月18~25日，中共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与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四川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共同主办了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东坡国际文化节发表了《眉山宣言》。《宣言》指出：“‘合作发展，和谐共进’，是中国·眉山东坡文化节的主题。围绕主题我们继承好、保护好、弘扬好东坡文化，坚持在继承中创新，在弘扬中继承，不断赋予其新的内涵，永葆民族性，体现时代性。我们要定期举办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东坡文化学术研讨活动，不断出成果，不断增强东坡文化的国际影响力。我们将加强国家之间、城市之间的文化交流，扩大经贸合作，促进共同发展。”集约各方面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形成强大合力，互助互补、共建共赢成为苏轼遗址地党政领导、学术研究机构、专家学者和各方有识之士的共识。

这些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热忱服务走出去：向苏轼遗址地有关单位，发放资料收集函50余封，委托代为收集资料；拟出《三苏文化产业研究会章程（草案）》，发出预约函50余封，引起相关企业关注。指导徐州成立“苏轼文化研究会”；参加“第七届苏姓恳亲大会暨首届武功文化

艺术节”，发表《武功感受》。指导常州成立苏东坡研究会，黄冈成立东坡文化研究会；与徐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了“第十六届苏轼学术研讨会暨全国苏轼遗址景园旅游发展论坛”。与广州从化市文联、广东苏氏联谊会联合主办了“首届广州从化苏东坡国学论坛暨纪念苏东坡诞辰 973 周年活动”；参与、支持儋州东坡文化节恳谈会和儋州东坡文化研究会成立大会；积极与常州市联系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筹备事宜，受邀赴常州调研，商讨研讨会的时间、主题、议程等会务；与黄冈市委、市政府共同举办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与海南省政府共同举办首届海南儋州东坡国际文化节，刘小川、方永江受邀专题演讲。

这些年，按照市委、市政府的要求，我们敞开胸怀迎进来：在隆重举行中国·眉山东坡国际文化节的同时，还主办了“苏东坡的民本思想”学术研讨会，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乐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杨胜宽教授评述这次研讨会“深度和广度是空前的”；“酒香醉十里，东坡竞风流”，邀请知名学者康震（央视百家讲演苏东坡讲述者）等来眉参加苏东坡人文精神暨苏东坡酒文化研讨会；在苏洵诞辰 1000 周年之际，成功组织了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出版了《苏洵研究——全国首届苏洵学术研讨会论文集》；以三苏文化为载体，举办了“2010 眉山诗魂音乐会”；成功举办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成立 30 周年系列活动和“苏轼创新理念与实践”研讨会，出版了《三十年回顾》和《学术研讨会论文汇编》；连年举办“品三苏”中秋沙龙活动，邀请苏学专家、知名作家、业余作者参加，从内容到形式都广受好评。

点点滴滴，映照当下，昭示未来，是落实和强化《眉山宣言》的具体体现。由此发轫，苏轼遗址地的合作交流更加深入，层面得以提升。政府间缔结友好，企业间签署协议，景园间互通有无；徐州倡导旅游联盟，黄冈召开市长峰会，儋州举办协作论坛。

《苏轼遗址地合作机制研究》已被省社科联确立为 2010 年度四川省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我们正按省上要求，精心组织，深入研讨，力争交上优异答卷。广泛合作，正按政府主导、全社会参与、市场化运作的理念，平稳推进。

眉山实力铸就苏学研究新地标

在“苏东坡的民本思想”学术研讨会述评中，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乐山师范学院副院长杨胜宽教授对“眉山实力”有着精辟阐释和深切的期许：眉山本地的研究力量正在壮大，体现了苏轼故乡这些年在抓“东坡老家，快乐眉山”的文化建设工作中，重视研究队伍的培育和研究机构的建设，展示了东坡故里研究工作的乐观前景。

苏轼是四川的、全国的、世界的，但首先是眉山的。作为眉山人，在弘扬东坡文化、丰富东坡老家的文化内涵方面，有着义不容辞的责任。从那次提交大会的论文看，包括退休居眉山的赖正和先生，共有 7 篇论文，占到了文章总数的四分之一，并且作者面也有所拓宽，除眉山三苏祠、三苏文化研究院、市委宣传部的老研究者外，眉山高等职业技术学院有 2 位作者提供论文，表明当地高等学校正在发挥其人才和研究的相对优势，以作者群的姿态介入三苏研究，这是一个值得欣慰的现象。

苏学研究汗牛充栋，眉山品牌脱颖而出。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现有领导成员中，眉山占有半数以上，展示了眉山组织领导苏学的力量；在市委宣传部批准的特约研究员队伍中，眉山同样站到了半数以上，展示了眉山担纲重大课题和创作任务的人才保障。尤为突出的是，在市委、市政府举行的苏洵诞辰 1000 周年系列纪念活动中，组织眉山籍作家完成《三苏传》并举行首发式暨读书征文活动。《三苏传》包括《眉山苏洵》、《眉山苏轼》、《眉山苏辙》，丛书以全新的视角阐述了三苏生平，填补了苏学研究和创作的一项空白。张志烈先生以《现代视野中的宋代剪影》为序给予了极高评价：第一，这是眉山当代作家写三苏。三位作家都是眉山人，东坡故里的文化血脉在他们身上流淌。他们对三苏的钻研理解中包含着对乡邦文化的传承和发扬的激情。他们的文字中使人感到有一种东坡式的灵秀之气，有东坡情韵荡漾其中。第二，视角新颖，鲜活通透。三苏的基本材料，学人们也讲得不少了，但这三本书却以新时代、新学人、新艺术见解、新审美观念来作新的审视。对历史材料，是“活生生地带到当下”，而通过深刻的历史透彻，进入人物的内心，且又以发散性思维纵论现实，精辟画面与精彩点评层出不穷。第三，立体用笔，多种色彩。三本书的格局大体属于评传一类，然而思想解放，行文突破常规，有史笔的叙述，有小说的描绘，有散文的咏

叹,更有饱融哲理的诗意的点评。语言新鲜、犀利、机趣、幽默。在短小精悍的篇幅和挥洒自如的文字中展现中华文化如何造就了三苏,三苏又如何增添了中华文化的光彩,启迪我们今天该如何立足现实去认识与弘扬三苏精神。

三苏文化研究院创作室负责人刘小川创作的《品中国文人》更是在全国影响广泛,书中有大量涉及苏东坡的文字,使国内外读者对苏东坡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起到了传播三苏文化的作用。著名评论家、著名作家雷达、张颐武、李建军、张炜等从不同角度给予了解读:“品中国文人”不自刘小川始,刘的独创性在于现代性眼光与平民情怀,心理透视与才气之融会;刘小川的风格兼有余秋雨和于丹两位老师的长处,以娓娓道来的笔触,探究历史的奥秘,为我们写下了一部中国文人的心灵史;小川的文字,融诗情、史识、哲思于一炉,表现出对古人文化风度的追怀与向慕,执着地追问与人格尊严密切相关的问题,是值得关注的文学收获;刘小川从古人身上看到的是世间之奥秘,是逼人的生命光辉,是无法言说的天地奇迹……可谓好评如潮。《品中国文人》荣获了巴金文学奖、四川文学奖两个大奖,为东坡老家争得了荣誉。刘小川也由此奠定了自身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地位,北至吉林,南达惠州儋州,东部问鼎“上图”,四面来邀,八方讲座,受到了广泛追捧。

一路走来,一路担当;开拓创新,终见成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会长、川大教授、博士生导师张志烈赞叹到:“眉山是当之无愧的苏学研究重镇!”

基本经验及“十二五”展望

眉山之所以在较短时间内成为苏学研究的重镇,其基本经验有三:

一、市委、市政府的大力支持。市委、市政府通过行政的力量,出钱出人出力,提供优质服务,保证了苏学系列活动的顺利开展。这些活动不仅解决了诸多学术问题,更重要的是宣传、普及、弘扬了东坡文化,推动了东坡遗址的保护,促成了三苏祠成功申报为“国重”,扶持了本土苏轼研究学者队伍。

二、有一批知名专家学者在学会中发挥领军作用。大专院校科研单位和党政机关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积极提供高质量的学术论文,积极参加苏学研

究各项活动,他们的参与大大提高了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的凝聚力、号召力、影响力。

三、有广大苏学爱好者的积极参与,有热心公益事业的企业的友情赞助。历次苏轼学术研讨会,吸引了国内外苏学爱好者的广泛参与,得到了有关企业的大力支持,星星之火渐成燎原之势,眉州大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苏学研究热潮。

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是国家发展和民族振兴的强大力量。要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充分发挥文化引导社会、教育人民、推动发展的功能,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增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在全市上下认真贯彻落实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精神和眉山精心编制、强力推进“十二五”规划的大背景下,苏学研究必然更上层楼,铸就新的辉煌:

一、中国苏轼研究学会组织学术活动的核心作用进一步发挥。

二、眉山苏学研究重镇的地位进一步彰显,眉山逐步建设成为苏学研究中心、信息中心、资料中心。

三、眉山本土的苏学研究和创作力量进一步加强,眉山实力成为宣传眉山、展示眉山形象的亮丽窗口。

四、东坡文化更加普及,群众参与热情更加高昂,东坡品牌价值得到进一步提升,交流、合作的层面更深更广。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院长)

幽梦惊断，寄慨万千

——苏轼词《永遇乐》读解

汪光大

明月如霜，好风如水，清景无限。曲港跳鱼，圆荷泻露，寂寞无人见。惝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天涯倦客，山中归路，望断故园心眼。燕子楼空，佳人何在，空锁楼中燕。古今如梦，何曾梦觉，但有旧欢新怨。异相对，黄楼夜景，为余浩叹。

苏轼诗词颇好言梦，这首词作于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十月，词首小序云：“夜宿燕子楼，梦盼盼，因作此词。”“盼盼”，唐代节度使张建封爱妾，燕子楼即张氏为其所筑。张氏亡故，盼盼居是楼十年而不嫁，引发后世骚人墨客无限感叹。苏轼任徐州知州时，曾寻访旧地，翌日写作此词。词方定稿，尚未示人，此词却不胫而走，哄传于城中。苏轼甚讶异，试一探究，竟是一巡逻小卒夜间歇憩于燕子楼，听得有人歌咏此词，记而传之。苏轼一笑置之。这首词由深秋夜色写起，以梦为线索，按梦断、寻梦、释梦的心理行为变化铺排，簸之揉之，一波三折，寄慨万千，情致缠绵而清丽可人。前人谓此词“绝去笔墨畦径间，直造古人不到处，真可使人一唱而三叹”，是为至评。

上阕从深秋夜景写起。月色如霜，怡人的轻风宛如清凉流水，无限美好的夜景清幽宁静。蜿蜒的小河游鱼跳跃，圆圆的荷叶露珠滚动，沉寂的夜色里无人观赏这美丽的景致。周遭一片安详，作者便在这如画的燕子楼下流连盘桓，他的心境亦如这片夜景平和安宁，心迹双清。蓦地里，三更之鼓咚咚响起，一枚树叶砰然落地，将我前去会见盼盼的好梦惊断。夜色迷茫，急切中，重寻梦境却无处可觅，令人黯然伤神。醒来后，沮丧地独自走遍庭园。上

阕写景，细致入微，月色轻风，鱼跃露泻，渲染出一片极富幻想的清幽宁静的理想境界。写梦断、寻梦，极尽夸张，迷离恍惚，尽显作者若有所失的怅惘情怀，流露出作者不可排解的现实焦虑，表现出他内心对人生产生的一种幻灭感与空虚感。

下阕抒写由梦境引发的深沉感慨。苏轼于宦途沉浮中多寄托了对故乡的思念，这种思念饱含悲凉。游宦多年的天涯行客，已深感疲惫和厌倦，山中归途迢遥，无限向往的故乡啊，望穿秋水，想断愁肠。作者借思归故里表达梦境幻灭的苦闷。燕子楼如今空空如也，佳人今在何处？尚存的燕子楼不过空锁着楼中的飞燕。此三句历史上颇负盛名，前人评其“三句说尽张建封燕子楼一段事，奇哉”，又云：“用事不为事所使，自不落呆相”，“以示咏古之超宕”。此三句概括力极强，既叙事，又暗寓时空有限的慨叹，为后文铺垫过渡。于是，作者以日前之梦比况解说人生，古往今来犹如一场梦幻，有谁能从这场梦中醒觉？只留下许多昔日的欢娱和现时的愁怨。作者是清醒的，时空有限，身不由己，在不少词作中他都抒发过“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新凉”的感慨，他似乎是最能意识到时间与存在的尖锐矛盾。“后之视今，亦犹今人视昔”，苏轼想像着，将来，人们面对黄楼夜景，也会像我面对燕子楼一样，为我在徐州的作为感慨长叹。黄楼，系苏轼为镇黄河水患在徐州城东门之上修筑的一座城楼，是他徐州治水政绩的象征。

这首词回环往复，结构严谨，自然天成。写景生动细腻，抒情悱恻缠绵，内蕴深刻哲理。悲慨苍凉，表现了深沉的人生忧患，也反映出苏轼超迈的人生态度。

（眉山市东坡区教育局教研室中学高级教师）

“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

——《苏轼全集校注》编辑札记

王书华

金秋十月，橙黄橘绿。在这“秋日胜春朝”的美好时节，由四川大学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张志烈、马德富、周裕锴先生担纲，由20余位学者、经20余年潜心编撰的煌煌巨著《苏轼全集校注》，由河北人民出版社出版。该书体例精密，校勘谨严，是迄今为止国内最为权威、功能最为齐全的苏轼全集校注本。

苏轼（1037～1101），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四川眉山人，是我国宋代杰出的思想家、文学家。苏轼在中国文学史和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是中国文化史上一位极其罕见的全才，是人类知识和才华发展到某方面极限的化身。苏轼的一生，始终保持着独立思考和勤奋写作的习惯，无论在朝在野、处顺处逆，他都笔耕不辍，可以说，写作已经成为他的一种生活方式。正是由于这种习惯，他才为中华民族文化的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为中国历史留下蔚为丰厚的文化遗产。

苏轼具有多方面的文学艺术才能，在许多领域都富有创造性，均堪称开宗立派的人物，无论是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皆有极高的造诣。论书法，苏轼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宋四家”，且苏轼居四家之首；论绘画，苏轼善画枯木竹石，是宋代文人画的代表画家；论诗词、文赋，其成就更是令人叹为观止，数量之巨为北宋著名作家之冠，品质之优为北宋文学最高成就之代表。

苏诗内容丰富，境界开阔，格调清新，与黄庭坚一起并称“苏黄”。苏诗现存约两千七百多首，内容丰富，题材广阔，概括起来，大致包括以下几类：社会政治诗、山水田园诗、风土民情诗、咏物寓志诗、抒情述怀诗、咏史怀古诗、评书题画诗、谈禅说理诗、赠答酬唱诗。苏诗风格多样，而以豪

放为主，笔力纵横，穷极变幻，具有浪漫主义色彩，为宋诗的发展开辟了新的道路。清代叶燮《原诗》云：“苏轼之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而适如其意之所欲出。”揭示了苏轼诗歌气象恢宏、意蕴充实、形象丰富的特征。清代赵翼《瓯北诗话》云：“以文为诗，自昌黎始，至东坡益大放厥词，别开生面，成一代之大观。……胸中书卷繁富，又足以供其左抽右旋，无不如意。其尤不可及者，天生健笔一枝，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显之情，此所以继李、杜后为一大家也。”苏轼诗风清新豪健，善用比喻，在艺术表现方面独具风格。例如，他写徐州百步洪：“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百步洪》其一）四句诗连用七个比喻，真可谓妙“喻”连珠，趣味无穷。

苏轼在我国词史上也占有特殊的地位，苏词一洗五代绮丽柔靡的词风，开创豪放词派，并提高了婉约词的境界，与辛弃疾一起并称“苏辛”。苏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熔铸了广阔的社会内容。在苏轼之前，诗、文的发展都已达到很高的水平，而词则不然；苏轼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更为重要的是，苏轼有意识“以诗为词”，开创了词的豪放一体，对词的“雅化”做出了重要贡献。南宋胡寅《酒边词序》云：“词曲者，古乐府之末造也。文章豪放之士，鲜不寄意于此者，随亦自扫其迹，曰谑浪游戏而已也。唐人为之最工者。柳耆卿后出，掩众制而尽其妙，好之者以为不可复

加。及眉山苏氏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使人登高望远，举首高歌，而逸怀浩气，超然乎尘垢之外。于是《花间》为皂隶，而柳氏为舆台矣。”南宋刘辰翁《辛稼轩词序》称：“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的数量虽远远少于苏文、苏诗，但在两宋词坛也名列前茅，蔚为大家。清人陈廷焯认为苏词是“此老平生第一绝诣”。就艺术开创性而言，苏词的贡献应在苏文、苏诗之上。

苏文汪洋恣肆，明白畅达，挥洒自如，雄辩滔滔，与欧阳修一起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他的文学思想强调“有为而作”，崇尚自然，摆脱束缚，“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书吴道子画后》）。他自称“吾文如万斛泉源，不择地皆可出，在平地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自评文》）他传世的散文有四千多篇，文体包括论议、赋铭、书牋、杂著、笔记等。苏轼散文的最大成就，在于集前人之大成而又有独特发展，“雄视百代，自成一家，浑涵光芒，至是而大成矣。”（《经进东坡文集事略》引《御制文集序》）苏文风格平易流畅，豪放自如。明代杨慎称：“东坡文如长江大河，一泻千里，至其浑浩流转，曲折变化之妙，则无复可以名状。”（《三苏文范》）同时，苏文又具有兴会淋漓、活泼灵动的特征。南宋罗大经《鹤林玉露》云：“《庄子》之文，以无为有；《战国策》之文，以曲作直。东坡平生熟此二书，故其为文，横说竖说，惟意所到，俊辩痛快，无复滞碍。”苏轼议论文的代表作如《留侯论》、《平王论》，都表现出翻空出奇、随机应变的特点。苏文善于随机应变、长于无中生有的特点，非常适合科场士子仿效，所以苏文成为后世士子参加科举考试的范文，南宋初期有“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之说。

《苏轼全集校注》是集几代学人之功而完成的一项艰巨而浩大的文化工程，是对苏轼及苏集的总结性而又同为开创性的集大成之作。该书被列入国家出版基金项目、国家“十五”规划重点图书出版项目、国家古籍整理出版资助项目、全国高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资助项目、燕赵精品工程重点项目、四川大学“九八五工程”文化遗产与文化互动项目、四川大学“二一一工程”中外文学与俗文化重点建设学科项目、《巴蜀全书》精品系列项目。

该书三位主编，来自三苏故里，执教四川大学。锦江水碧，峨眉山青，钟灵毓秀，才思泉涌，其才学令人佩服；二十余人、二十余年，焚膏继晷，兀兀穷年，提要钩玄，含英咀华，集苏轼诗、词、文研究之大成，其功力令人钦佩。主编张志烈，1966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师从著名诗人、文史学家庞石帚教授。毕业后留校任教，1995年被聘为博士生导师，并获国务院颁发的政府特殊津贴，是中国苏轼研究会会长。撰著有《初唐四杰年谱》、《历代文化名人在四川》、《先秦史传散文选》、《唐诗三百首注释》等。主编马德富，1978年考取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研究生，1981年毕业后留院工作，1983年调入四川大学，现为中国古代文学专业博士生导师，编撰有《唐宋八大家书系·苏辙卷》、《中国古典文学名著集成·宋文卷》，与人合作校点有《栾城集》等。主编周裕锴，1984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文系古代文学专业，获硕士学位，同年留校任教。1993年5月晋升为教授。1994年2月在职攻读中国古典文献学专业博士学位，师从著名敦煌学家、文献学家、语言学家和文学史家项楚先生，1997年6月通过博士论文答辩，获博士学位。现为中国古代文学、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古典文献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著有《中国禅宗与诗歌》、《宋代诗学通论》、《文字禅与宋代诗学》、《禅宗语言》、《中国古代阐释学研究》等专著。

《苏轼全集校注》以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苏轼文集》和龙榆生笺《东坡乐府笺》为底本。由孔凡礼先生点校、刘尚荣先生任责任编辑的《苏轼诗集》，1982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孔本以王文诰《苏文忠公诗编注集成》为底本，在校勘和辑佚上下了很大功夫，所收诗两千八百二十多首，辑佚二十九首。由孔凡礼先生点校、刘尚荣先生任责任编辑的《苏轼文集》，1986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孔本以明末茅维刊本《苏文忠公全集》（七十五卷）为底本，孔先生在点校时，还搜集苏轼佚文，编成《苏轼佚文汇编》七卷、《苏轼佚文汇编拾遗》二卷，是收集苏文最全的版本。龙榆生笺《东坡乐府笺》，1936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该书由清代著名学者朱孝臧编年校注，近代词学大师龙榆生作笺，是当今研读苏词不可或缺文本。书首汇集《东坡先生墓志铭》、东坡词评等苏轼研究资料，正文包括本文、校记、朱注、龙笺等内容。苏词本身之优美精彩固不待言，朱、龙二位大家的笺注，考证详实，注解

精到，真可谓珠联璧合，锦上添花。《苏轼全集校注》以上述三书为底本，广泛参考其他版本，择善而从，校必有据，对苏轼的诗、词、文作了“五通”工作，即通收、通校、通注、通编、通评。由于这“五通”工作，使得该书不仅为读者提供了一部可靠的苏轼诗、词、文全集，同时也为苏轼研究、宋代文学研究提供了一部可资凭借的资料。

一、通收。在中华版苏轼诗文及商务版苏词的基础上，又做了辑佚工作，补充了一些前人未曾发现的苏轼作品，剔除了一些误入苏集的作品；凡他人文字混入苏集者，经辨订考实，则出注说明。

二、通校。底本校勘成果卓著。该书承用底本校语处，一律加以说明；凡于异文判定有取舍不同处，皆出校记。在继承底本校勘成果的基础上，又校正了底本的不少失校之处。

三、通注。苏诗、苏词是在旧注基础上另作新注，苏文绝大部分为自作新注。注释范围包括人名、地名、典章制度、史实、事件、典故、僻难词语以及与解读该篇内容有关之一切因素。对于前人注释，既有继承又有创新，并且订讹匡谬，补罅删芜，在编年考订、征典释义、探究本事、交待背景等方面创获颇多。

四、通编。编年考订为本书重点。注释之第一条，先提出系年结论，然后详列理由和证据。该书在参考前贤时杰相关著述的基础上，如王宗稷《东坡先生年谱》，傅藻《东坡纪年录》，王文诰《苏诗总案》，孔凡礼《苏轼年谱》，薛瑞生《东坡词编年笺证》，邹同庆、王宗堂《苏轼词编年校注》等，对苏轼绝大多数作品进行了编年，其中有相当多的作品属首次编年，发现颇丰，堪称一部北宋中期的文学编年史和文人交往录。

五、通评。自宋以来，各种著述中对苏轼作品作记述、议论、评价、赏析之文字繁多，于解读苏轼作品，颇有裨益。该书在博览前人评析的基础上，对其中见识卓犖、富有代表性者予以采集，凡涉评析鉴赏者为“集评”，凡记述相关背景有助理解者为“附录”，这些对于进一步研究苏轼及其作品，颇具参考价值。

该书甫一出版，既获得学界的广泛好评。著名学者许嘉璐先生称赞该书嘉惠士林，为功匪浅，是苏轼在世和身后最全、最好的本子。清华大学教授傅璇琮先生称该书学术价值很高，校勘、注释、集评都有很高水平；其最大的特点是，每一篇作品都

尽可能注明写作时间、地点和背景，纠正旧注之误，并提供了不少材料。北京大学教授孙钦善先生称该书在异文判断方面有新见解，考辨伪作方面有新发现，在作品系年上有因袭，更有发现，对于苏轼作品的整理堪称上了一个新台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陶文鹏先生称该书是古代作家别集校注中规模最大、难度最大的项目，浸透了作者的心血，体现了作者的学术眼光，对于推动苏轼研究和北宋文学研究、推动其他古人别集的整理出版都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南开大学教授张毅先生称该书为“金声玉振之作”，是“中国文化的大雅之音”，称赞其在校注、编年、辨伪、集评方面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清华大学教授刘石先生称该书具有多功能性质，不仅有资料汇编，而且注释有时串讲文义，编年、校注也很有价值，对于推动苏学和宋代文化研究的发展很有意义。

（河北出版传媒集团编审）



黄冈苏东坡主题公园“遗爱湖公园”石碑

潜心研究，独出奇谈

——赖正和先生研究苏东坡的艰辛历程

柳絮

二十几年前，赖正和先生还在主持文学季刊《沫水》的工作，我捧着创作的小说初稿去登门求教。他叫我把稿子留下，抽时间帮我看。闲谈间，我看见他的书架上插着十来本有关苏东坡的书，忍不住走过去抽出几本来翻翻。那本《苏轼文选》和那本《苏轼诗选注》里面的文字都是竖排的，一看版权页，竟是五十年代出版的。封面已经磨得很旧了。书里有不少用红、蓝两种颜色画的圈圈杠杠，还有为生僻字注的拼音，天头、地脚也有用红、蓝两种颜色批的文字，短的只有几个字，长的竟有四五句，我认得是正和先生的笔迹。这使我很是惊讶——我知道正和先生一直从事文学期刊编辑工作，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辅导、培养业余文学作者，还挤时间进行文学创作，已经够累的了，没想到他还这么认真仔细地阅读苏东坡的著作。

我问他：“您喜欢苏东坡的东西？”

他说：“我是地道的眉山人，比眉山先贤苏东坡恰好小九百岁。小时候常随父兄拜谒眉山三苏祠，听讲三苏的故事，学读三苏祠里的楹联和碑文，在稚嫩的心田里播下了崇敬三苏的种子。稍长，学了苏东坡的‘大江东去’，对苏东坡的崇拜竟急剧升温。慢慢地，便产生了阅读苏东坡著作的渴望。参加工作后有了工资，见到有关苏东坡的书就想买到手，你翻的这六七本就都是在五十年代买到的。有空，就读它几页，这已成为我的一种习惯。”

我在书架上抽出林语堂著的《苏东坡传》，想借回去读读。历来很大方的正和先生却吝啬起来，要我打借条，要我限期归还，还一再叮嘱我爱护书，千万别弄脏弄破弄丢。我心里明白，他是把这些书当宝贝的。

九十年代初，我突然在一张报纸上看到一篇仅有两千多字的文章，却标着一个很长的标题：《苏

东坡不仅是文学家而且是具有革新思想和主张的政治家》，作者竟是正和先生。这使我再次惊讶——这阵正和先生同时主持着旅游文化杂志《峨眉山与乐山大佛》和《乐山文化艺术报》的工作，也还继续创作文学作品，时间十分紧迫，可怎么一下子写出了这么一篇带有学术价值的研讨文章来了？后来见了面，他告诉我，他一直没有中止搜集和研读苏东坡的著作，原本打算在素材积累够了也思索透了之后，以苏东坡为主人公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谁知在研读一些资料时发现，人们比较一致地承认苏东坡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可从政治角度评说苏东坡的意见就众说纷纭了，竟有不少人认定苏东坡在政治上是保守派，是改革的反对派。他在苏东坡著作的多年研读中，总觉得只把苏东坡看作伟大的文学家是很不够的，苏东坡在政治变革方面的思想、主张及其实践也是很值得肯定的，苏东坡也是封建时代的一个进步的政治改革家。所以，他写了这篇短短的论文，抛出他的观点。我说，用这么一个递进复句做标题显得太冗长了。他却说，标题就是他的观点，也是论文的结论，就是要直白而明确地告诉读者。

九十年代末期，眉山地委宣传部约刚刚退休的正和先生写一部关于苏东坡政治主张的书稿，他欣然应允。他在多年积累的基础上，又用了半年时间专心专意地研读苏东坡的原著以及相关书籍，待有了自己的较为成熟的基本符合历史的认识之后，才动笔撰写。这时，他所在的单位重新调整了住房，他家的上下左右邻居一户一户地接着装修房子。从早到晚，电钻、电锯的刺耳尖叫和铁锤砸墙的撞击声接连不断，别说写文章，就是喝茶打麻将也不行。可他别无选择，他只能在各种噪音的包围攻击中提起笔来。经过半年的艰苦笔耕，书稿终于杀青。我

是这部书稿的第一读者。读完后,我第三次感到惊讶——我原以为正和先生作为一位作家,形象思维应当是他的强项,没想到他的逻辑思维也竟然如此严密,推理竟然严丝合缝,把一部论著写得这么有说服力。这部书稿在2001年出版时定名为《苏轼与北宋政治变革》。我认为正和先生的这本书对当时的苏学研究作了一定的贡献。什么贡献?其一,他全面系统地论述了苏东坡的政治变革主张,肯定苏东坡“是一位具有民本思想的有一整套政治变革主张的政治改革家”。别以为这一点“不新鲜”,前两年还有个名校教授在央视《百家讲坛》大讲苏东坡是反对改革的政治保守派呢!其二,他将苏东坡与王安石两人的政治改革主张作全面比较分析,归纳出他们的“一同三异”。“一同”是他们都认识到当时的政治非改革不可,都主张改革,而且都提出了各自的改革主张。“一异”是苏东坡强调富民,王安石强调富国。王安石变法的核心是“取天下之财,以供天下之费”。正和先生比喻说:“苏轼与王安石抱着对时局的相同认识,一同站到改革的起跑线上,但他们跑向的目的地不同,一个跑向‘裕民’;一个奔向‘富国’。”“二异”是苏东坡强调“任人”,王安石强调“任法”。“三异”是苏东坡主张“渐变”,王安石主张“急进”。当下出版的好些苏学著作,也还往往仅说到苏、王改革主张在方式方法上的差别,没有看到在改革目标上的根本不同,而正和先生在十年前就论证了这一点。其三,正和先生“胆大妄为”地提出了“苏轼反王正确说”。他写道:“王安石变法的目的是为国家兴利敛财,对人民没有多大好处,也并没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不能一看到‘变法’二字就高唱赞歌,要看变法的实质,要看变法对人民是否确好处,看是把人民的生活变好了还是变差了。”“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集中于一点,那就是反对新法‘向人民要钱’,加重人民的负担,所以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其实质是为人民代言,根本没错。”“如果站在神宗、王安石一边来看,肯定会说苏轼反对新法是反对错了;如果站在受害的老百姓一边来看,就肯定会说苏轼反对新法是反对对了,而不是反对错了!”十年前我读这些文字时,还替正和先生捏把汗,担心会被人指斥为“奇谈怪论”。就今天来看,恐怕也没有几个人敢这么说。因此,我一直认为这本书具有超前的思想观点,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

正和先生退休后,将大部时间和精力用来研读

苏东坡的原著。他说,做学问必须重视“第一手资料”,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只能作参考。如果不研读原著,轻信第二手、第三手资料,往往会“上当受骗”。真正做学问,应该从原著中去发现、挖掘一些新的独到的东西,不去吃现成的馍,更不去吃别人吃过的馍。这样做,当然很费劲,也不可能在短时间里写出很多有独到见解的文章。所以,追求快速出名的人不肯这么做,追求经济效益的人更不会这么做。有些人找到了捷径,那就是充分利用第二手、第三手资料,挑挑拣拣,拼拼凑凑,修修补补,便弄出一本书来。这样的作品有何价值?自欺欺人罢了!正和先生这么说,也这么做。他把《苏轼文集》翻来复去地研读,绿色封皮竟磨出了不少白色来,内页的白色边沿也因翻的回数太多而变黑了。近几年他发表的有关苏东坡的论文,都是以苏东坡的原著做根据的,所以很有说服力,别人很难驳倒他。他在《苏东坡与王朝云》一文中,用苏东坡自己的说法来论证王朝云是不是苏东坡的“第三任妻子”,在《再说苏东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吗》一文中,用苏东坡自己的话来论证苏东坡当没当过常州团练副使,就是很好的例子。

几年前,我在正和先生的书架上看到一本奇怪的书——64开的,有一寸多厚,周边没有切整齐,书脊上用胶粘贴着黄绫。这是什么书呀?我好奇地抽出来看,原是一册手写本,封面上写着“苏东坡从政年谱”七个字,内文依年次列出苏东坡从政的主要活动和业迹。我一看就认出这是正和先生的手迹。我说,“您怎么不买一本,却花这么多工夫来抄写?”他笑道:“花多少钱也买不到呀!这是我自己编纂的,便于自己使用。”他接着告诉我,多年以来不少人研究苏东坡的文学作品,取得很多很好的成果,但苏东坡反对王安石变法,这个问题不好回答,又没法回避,所以好些学者便不去研究苏东坡的政治立场、政治主张。而他却“愿意蹚这潭浑水”,一直把苏东坡的政治思想、政治立场、政治主张、政治实践(简称“四政”)作为研究重点。最近几年他写了30多万字的苏学论文,其中多半是讨论东坡“四政”的,其中一些论文受到好评。例如,《读〈康震评说苏东坡〉后与康震先生商榷》发表时,编者在《本期导读》中评介说:该文“言之有理,持之有据,不落言筌,振聋发聩”。全国第16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综述》则说:该文“用大量事实,对北师大教授、文学院院长康震关于

苏东坡政治保守、反对改革以及打击报复改革者的观点，提出了不同看法，实际上是对苏东坡、王安石二人的政治主张进行了比较研究，更加突出了苏东坡政治主张的合理性。这样的文章针对性强，观点鲜明，可读性强。”《综述》还对正和先生的《苏东坡一生为民请命》一文作了评述：该文“用大量史实论证了苏东坡的为官之道和做官原则，揭示了苏东坡亲民爱民的这一高尚品质，这无疑对今人不无借鉴意义。”最近在黄冈举办的“东坡文化国际论坛”上，饶学刚教授握着正和先生的手称赞他是“苏东坡的卫士”。从这些评介、评价可以看出，正和先生的苏学论文是有一定质量和影响的，也反证他在苏学研究中的认真和严谨。

近日，正和先生对我说，安徽有个叫史钧的大学教师出版了一本《苏东坡这个人》，用十分下流的语言给苏东坡泼脏水。正和先生非常气愤，想把自己近几年写的苏学论文结集出版，以对抗史钧散播的坏影响。可是，现在的出版社多以求利为目的，不肯出版这种赚不到钱的纯学术著作，有关部门又不肯给予补贴，“难产”就在所难免了。但他并未放弃结集出版的想法。他打算自己筹措一些出版经费，再求苏东坡的铁杆粉丝（有钱的）资助一些。我听他这么说，既佩服他的执著，心里也涌起阵阵难言的酸楚。但愿他的论文集能够面世。

（四川省乐山长征制药厂）

发掘开拓与利用这一价值丰厚的文化资源和历史遗产，不仅从学术上为开展东坡的研究增添题目，同时也值得考虑提高黄州旅游资源的品味与质量，从而在经济上获益。这些课题上，笔者均属外行，但千虑一得，仅愿提出下面建议以供研讨。

第一，在观念上宜明确认识：其一，中国有独特的历史悠久内涵丰厚的亭文化；其二，北宋艺文大师，顶级世界文化名人苏轼，以其在开拓亭文化上的业绩，成为中国亭文化的当然代表；其三，黄州在东坡亭文化的课题上，具有无可替代的独异优势。

第二，黄州为传承东坡文化，弘扬东坡精神，打造文化名城，宜发挥东坡亭文化的优势，研讨实际措施，设立开发项目，恢复即重建东坡居黄州时期的诸亭，建设成永久性东坡亭文化园区。这项建筑可有两套方案供选择。其一是经过专家勘察，尽量将纪念亭建在原址或附近，如此可以使观光者重温当年东坡生活亲历的场所，体验“神游”之乐。倘若无法再现原景原貌，便采取其二，即可大抵以已有的如东坡赤壁规模建制东坡亭文化园区，将有关东坡的亭（或包括其他建筑），集中地建在一处，供游者一次性专题观赏。

第三，如此一个项目，规模较大，所涉问题繁杂，在实际运作层面，当然需要相关部门与人士，对其必要性、可能性，集思广益，进行细致研讨。目标应是建造成令国人乃至世人瞩目的黄州标志性文化园区。

（首都师范大学教授）

（上接第 46 页）

第一组临皋亭、四望亭，是同东坡和家人生活密切相关的设置，不同寻常建筑。第二组九曲亭、快哉亭，是东坡筹建和朋友特为他建造的亭，均有作品传世。第三组任公亭（含师中庵）、遗爱亭，是东坡为乡贤与挚友修造的纪念亭。第四组万松亭、岐亭，是黄州地域之外或表友谊或因故事而成的亭。十座亭可以构成东坡亭文化群落，足证明将黄州称作东坡亭文化之奇葩名副其实，而这在全国是绝无仅有的。

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问题，是如何认识，如何

日本苏轼研究述略（五）

〔日本〕池泽兹子

题下注（5）是《蕉雨余滴》，先翻译一下：

一云此诗元祐六年在颍州作。到元祐八年改元为绍圣元年，到了绍圣元年，对元祐党人的形势愈趋不利。苏轼作诗的元祐六年已经有苗头，因此诗中可以看出苦闷的心情。

从这可知《蕉雨余滴》的特点之一是参照当时苏轼的处境，在诗中揣摩出作者的真情，在注里详细地解释。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四河入海》卷三之三《西斋》诗中有“病夫朝睡足，危坐觉日畏。昏昏既非醉，踽踽亦非狂”句。在这里《蕉雨余滴》解说：

这“病夫”是作者苏东坡。他睡饱之后起来在那个床坐着。苏轼这个人应该是承担“致君尧舜上，救民涂炭”使命的人，但是现在没有事做，睡一大觉。因此可知他正处在不得志的环境里。

这里也是解释苏轼深深藏在诗句中的苦闷心情。值得注意这个解释中，他用“致君尧舜上，救民涂炭”的句子。《西斋》是苏轼在密州时作的诗。同时在密州苏轼作《沁园春·赴密州，早行，马上寄子由》词。那个词的后段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用舍由时，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闲处看。身长健，但优游卒岁，且斗樽前。”当然这个句子据《孟子》“伊尹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应据《与弟书》“思致君于唐虞，济斯民于涂炭”的，其他的诗人也用①。但是我觉得《蕉雨余滴》在这里用这个句子不是偶然的。苏轼在密州作的《小儿》中也用这个句子。因此我觉得《蕉雨余滴》也参考了苏轼同时代作的其他作品（包括词在内）②，所以注释的时候利用了苏轼其他作品里的句子。

现在看第一段和第二段的注释。这里值得注意

的是，五山僧对助词很注意。比如说，第一段的笑云清三（《三》）解释“十日来”的“来”字说，这“来”字不是动词而是“十日以来”的意思。在二段《天下白》解释“老而痴”的“而”字，说在这首诗中的“而”字都是和《论语》“学而”之“而”字一样的用法。到了江户时代（17世纪~19世纪）日本对助词的研究深入，陆续付梓了关于助词的研究专文专书。《四河入海》对这些助词解释可能为后代研究打下了基础。

在第一段“我性喜临水”，《天下白》着眼“水”之重要性，云“儒释道之三教共受此性者从水而得之”。然后介绍三教之尊重水的例子。最后云：“先生能会得三教一致之理，其性喜临水也，有深意。”③苏轼文学和“水”有很深的关系，在他的诗文里可以看到以水为主题的作品④。因此《天下白》注意“性喜临水”是很好的着眼点。

再加上从这里的“先生能会得三教一致之理”的解释里，可以看出注释者万里集九对苏轼很尊敬。在下面第六段“同参天人师”，他注释说：“天人师是谁欤？即先生也。先生能知生之为水，转脚跟于三教之本源，文章面前先生自称天人师不为过当”。《天下白》有时候有他独特的看法。在这儿把苏轼认为是“天人师”，或不能完全赞同。但在这注释中也可以看出他对苏轼的景仰。

第三段《脞说》解释“上流直而清，下流曲而滴”云，“此下二句盖言上流直而清似君子，下流曲而滴似小人也”，这样他把“上流”和“君子”，“下流”和“小人”联系起来解释。他的这种看法给予《天下白》、《蕉雨余滴》很深的影响。

《天下白》更进一步跟具体的人联系起来解释说，“上流”是“元祐之诸君子”，“下流”是“熙丰诸小人”。在《天下白》的解释中往往看到把诗

的本文和在苏轼周围的具体人物联系起来的。比如说在《四河入海》卷一六《再用前韵寄莘老》诗“君不见夷甫开三窟，不知长康号痴绝”句，《天下白》解释说，“夷甫，白云比荆公，盖取其氏同。长康，比孙莘老，并先生不遇时之者也”。

第四段值得注意的是《脞说》对“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的注释。在这儿，他用黄庭坚的赞：“此以下二句，盖坡言水中影随波分散，然推其意，坡言熙丰以来是非万端，此即为百东坡也。虽然毕竟唯一东坡，此即忽然在兹也。盖山谷赞所谓‘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之意也。”这里的“山谷赞”是黄庭坚《东坡先生真赞三首》其二（《全宋诗》卷一〇二三）：

岌岌堂堂，如山如河。其爱之也，引之上西掖奎坡。是亦一东坡。槁项黄馘，触时干戈。其恶之也，投之于鲲鹏之波。是亦一东坡，非亦一东坡。计东坡之在天下，如太仓一稊米。至于临大节而不可夺，则与天地相终始。

黄庭坚此文有助于理解苏轼的这些诗句。《脞说》的作者瑞溪周凤除了东坡之外，还精通黄庭坚的诗文，注释的时候可以自由自在地引用。《天下白》用《东都事略》等资料收集姓名之上冠“百”字的例子。《天下白》的注释跟东坡没有直接的关系，但这些注释者的博学多识令人惊叹。

下面看第五段。在这里应该看《脞说》注释“薄相”的地方。宋代、清代中国的注释本里没有找到注释这个词的地方。在宋代、清代以出示典故为中心注释苏诗，好像这个词不能找到明显的典故，因此历代注释者不注释这个词。但是在《四河入海》里，《脞说》的解释很详细。

他首先注意在苏轼其他诗中用“薄相”的例子。他说包括这首在内一共有三个。其他两首诗如下：

（1）“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天公”，脞云，“薄相”之解见于《脞说》第一。

（2）“偏界南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脞云：此二句，盖浴时貌也。薄相言赤肉轻薄之相也⑤。从这里可以知道《泛颖》诗的“薄相”意义跟（2）的不一样，跟（1）的“薄相”一样，可以互相参考。然后他引用佛书的例子（《佛本行经》“世传”），他说这些用法跟《泛颖》诗的“薄相”不一样。然后他从其他角度分析这个词。“薄相”是“轻薄”的“相儿”，因此他引《太平广记》和《海录碎事》的“轻薄门”以及杜牧的诗，先分析一下“轻

薄”的含意。《太平广记》卷二六五《轻薄一·盈川令》的原文如下：“县令杨炯，词学优长，恃才简倨，不容于时，每见朝官目为麒麟楎。人问其故，杨曰，令舖乐假美麒麟者，刻画头角，修飭皮毛，覆之驴上，巡场而走。及脱皮褐，还是驴马。无德而衣朱紫者，与驴覆麟皮何别矣。”《太平广记》卷二六五《轻薄一·杜甫》又云：“杜工部在蜀，醉后登严武之床，厉声问武曰，公是严挺之儿否，武色变，甫复曰：‘仆乃杜审言孙子。’武少解矣。”

从这里可知道，“轻薄”是嘴不严，没有好好考虑、轻率发言的人。《脞说》说《海录碎事》的“轻薄门”的意思跟《太平广记》不一样，“才之轻薄”，也就是说浪费才能的人。从杜牧的诗来看，“轻薄”是“爱色逸游”。根据这些例子，《脞说》下结论说：“由是观之，则人之好戏剧，盖非敦厚端重之相，则亦可谓之薄相。然则坡所用盖言戏剧而已。”最后《脞说》引用苏轼以后杨万里的两首诗。在这两首诗中的“薄相”词和苏轼《泛颖》诗用法差不多。读者可以参看杨万里的这首诗，更进一步了解“薄相”的含义。

大概苏轼以前没有“薄相”这个词的这种用法，比较接近口语，因此中国历代注释没有注过。但是对外国人来说还是难懂的词。因此《脞说》为了解词的意义，甚至利用苏轼以后的诗进行分析。这是《四河入海》和中国注释不一样的地方之一。

在第六段，《天下白》关于“天人师”的解释占了很大的篇幅。《天下白》往往有关佛教的词注释得很详细。

以上介绍的是《四河入海》的比较典型的注释方法。《四河入海》是用王状元本，但是他的注释和王本完全不同，它用的都是日本人的注释。那么从上面的分析可以知道，《四河入海》引用的四个人的注释方法是各有各的特色。

论文注释：

①比如杜甫的《奉赠韦丞相二十二韵》中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

②日本中本大氏在《在本邦禅林〈韩王堂雪〉诗中怎样接受李煜诗——“五山文学和填词”续貂》（《国语国文》1994年第63卷第10号）论文中提及五山僧接受填词的情况。其中中本氏提及禅僧通过《冷斋夜话》、《全芳斋祖》、《事文类聚》等诗话、类书看到苏轼的《西江月》词（素面常嫌粉浣）的例子。（下转第77页）

苏东坡的政治人生（七）

——吏之不正，政之不行

雷金贵

二二 干部是决定因素

哲学上讲，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又反作用于经济基础，某种时期，其反作用力甚至要大大地强硬于作用力。

开国领袖毛泽东讲过，路线方针确定之后，干部是决定因素。

我们这些后来人，为苏东坡戴了很多个“家”的帽子，惟独没有把哲学家的大帽子戴在苏东坡的头上。但是这没有关系，他深知作为上层建筑的官吏队伍，在国家生活中的重要性，所以在革命的举措上，他首先要开刀的，是包括自己在内的“百官”队伍。范仲淹行庆历新政，也首先从吏治开始，捅破了大马蜂窝，而被老迈的仁宗皇帝腰斩了；神宗皇帝和王安石急速推进的新法，不能说没有美好的预期，问题之一是被一批钻营者“臊了堂子”。

吏之不正，政之难行。

这就是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

苏东坡意图从六个方面，变革北宋吏治，曰“厉法禁”、“抑侥幸”、“决壅蔽”、“任专使”、“无责难”、“无沮善”。苏东坡在上书当朝皇帝的皇皇《进策》中，说得很细致。

北宋的官吏制度和队伍，苏东坡为什么希望彻底整治，根子也有北宋治蜀的弊政。

宋太祖兵变立国后，采取虚外安内之策，中央政权一经建立，就迫不及待的发兵，收拾南方诸国。宋太祖乾德二年公元964年，立朝仅仅四年多，就组织六万大军，以王全斌为首，分兵两路，一路走秦岭栈道，一路走长江水道，向四川进军，收拾了后蜀，收复了四川。问题在于得胜的将领们，再也不管军务政务了，整日的放浪声色；兵士为所欲为，抢掠财物，霸占妇女，搞得蜀中百姓人心惶惶，积愤难平。皇上为了釜底抽薪，要征调蜀兵入京，王全斌又纵令手下将领百般的凌辱蜀兵，终于惹出了祸端，十万大军中途反水，是为蜀之起而抗宋之肇始。王小波李顺乱蜀后，宋太祖派出宦官王继恩入蜀招安，此王与前王也是一路货色，任令其部下烧杀抢掠，无所不为。后来不好收场，居然搞到皇帝诏告天下责己“朕委任非当”。

饱读历史的苏东坡，对本朝发生在身边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

官吏队伍的我行我素，有令不行，有禁不止，说明制度建设有问题，管理也同样有问题，监督更有问题。一个地方官员，号为父母官，他如果为非一方，是要失掉一方民心的，是要动摇全局的。到苏东坡踏进官场，有宋已经百多年了，日积月累的官场弊端，已经显露无遗。皇帝自己都认识到了“委任非当”，可以说，北宋王朝的吏治，确实已经到了非整治不可的时候了。

苏东坡的吏治变革，自然就不是书生意气。

二三 厉法禁自大臣始

苏东坡吏治之首策，谓之“厉法禁”。

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我们常常挂在嘴边的话，有法可依，有法必依，违法必究，执法必严。

苏东坡希望皇帝和朝廷，赏罚要分明，因为天下人都“乐乎赏而畏乎刑”。皇帝和朝廷，该奖赏一定要奖赏，该处罚的一定要严厉处罚。

北宋的现实是，法令众多，稍不小心，就踩了红线。即便如此，一些小官小吏，贪赃枉法了，或被除名，或被鞭打，还是不断的有人要冒险。

这是为什么？

而且大官吏根本就不怕。

这就成了一个问题。

苏东坡说，问题在于制度的漏洞，在于当朝的一法二用，甚至于一法多用。同样的一个法，对小人物，一律的重刑侍候；而对重权人物，即使罪大恶极，却是网开一面，处罚是敷衍而过，对公卿王子，更是蜻蜓点水，走的是过场。

拍死一只苍蝇，老虎可能眼都不会眨一下；杀鸡给猴子看，猴子是不会害怕的。

所以苏东坡的依法治理官吏队伍，其锋利的矛头，直指高层，尤其对权豪显贵中的违法犯罪者，必须要依法惩处，而且从严从重，以服天下人心。苏东坡反对“刑不上士大夫”，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厉法禁自大臣始，则小臣不犯矣。”自上

而下，是打老虎给苍蝇看，杀猴给鸡看，才能威慑天下。

前面我已经说过，苏东坡在杭州，严厉惩处颜氏兄弟，在密州，对执法犯法者的坚决打击。苏东坡最后一次回朝廷，负责皇帝郊祀，皇后和皇帝的奶妈，不守祭祀规矩，只有苏东坡一人上奏，要求予以处罚，相关人员因此受到惩处。相关人员当然也给苏东坡记了一笔。

但是苏东坡太理想，皇权社会里，法不是法，皇帝才是法，即使皇帝是信口雌黄，也是法，尤其到哲宗亲政后，这个任性癫狂的小皇帝，随心所欲，无以复加；他二十六岁短命死了，也是报应。继位的徽宗皇帝，风流成性，无心朝政，一班小人，肆意妄为，朝局之乱，不见也可想。

苏东坡的遭遇，就是大宋律历是如儿戏的写照。

苏东坡用奏章和诗歌，反映了现状，就被逮捕入狱；离开黄州，还没有赶到先安排的地方，途中又变了；贬谪岭南，十天之内，三改谪命。如此朝政，朝令夕改，甚至朝令朝改，夕令夕改，有律其实等于无律。

王安石变法，凡是持不同意见者，通通被赶出朝廷，完全就是癞头打伞——无法无天了。司马光尽废新法，同样强硬打击不同意见者。权重者是为法的化身。哲宗皇帝亲政后，任凭章惇们对“元祐党人”的打击，已经没有章法，完全地打击报复，不仅有当权者对“元祐党人”报复，更有皇帝对太皇太后垂帘听政的报复，才有林希代皇帝草拟苏辙的谪词时，“垂帘之初，老奸擅国”之语，皇帝照样御批发出。

从熙宁变法，到北宋灭亡，北宋朝廷，人事沉浮，如同杂耍的戏台一般，乌烟瘴气，所谓大宋律，连摆设都不是了。

苏东坡想在这样的环境里讲依法办事，自然是对牛弹琴的结果。

二四 才者常用

苏东坡吏治之二策，谓之“抑侥幸”。

用现今的话来讲，就是要严格选拔制度，任用制度。

当时是，官员太多，而位子有限，常常是，一个位子，三人共之，其中有一人，无事而食；用现代语言说，做了在册的官员，就是要起，俸禄也是照拿的。好象是，在北宋，只要你入了仕，乌纱帽就戴稳当了。所以就都心安理得，反正都是有官做的。而且，宋朝官员，三年一换，居官时间短，要的时间多，所以在位的时候，不少的人，就拼命的用权，就拼命搜刮，保障自己要的时候能够潇潇洒洒，完全是有权不用过期作废的心态，遇到贪得无

厌的官员，想尽一切法子，搜刮民脂民膏，直接遭殃的，当然是老百姓，而最终遭殃的，当然是赵宋朝廷。

老百姓是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无须大风大浪，就是水被抽干了，舟自然就搁浅了。所以苏东坡主张要打破老规矩，搬掉官员的铁交椅，不要不管需要不需要，只要有了资历，联络了有足够的人举荐，就可以升官了，就可以移位了——这就为拉帮结派者，铺排了好象很堂皇的理由，我推荐了你，你总得记我一份额情吧——苏东坡看见了它的危险，所以反对因此而一味的提拔。根本的，是反对这种任人方式，虽然，苏东坡在当年进京考试的时候，也是托人写过推荐信的，比如张方平等，他参加制科考试，也是欧阳修推荐的。

苏东坡主张，在干部的选拔任用上，既要考察其人其德，还要考察其人其才，有德才兼备的意思，这就很有现代意识了。而且，必须根据岗位有无空缺，而选拔任用官员，这有定岗定员的意思，是因事设岗，而不是因人设岗，避免人浮于事。苏东坡的理想是，由此而使“天下之吏不敢有必得之心，将自奋磨淬”。

苏东坡当年参加制科考试，就提出了干部管理的意见，主张掌管干部任免、升降、调动、考核等职责的吏部，以及各路主官——北宋当时是把全国分为若干路，相当于现在的省的建制——苏东坡建议吏部和各路主官，在干部管理方面，要做好三件事情：第一，掌握干部的德能勤绩；第二，排定各路州、郡、县治理的难易；第三，根据干部的能力大小，安排他们到难易不同的地方去任职，能力强的，去治理重要的和难治理的地方。苏东坡的理想是：“才者常用，不才者常闲。”

苏东坡对北宋当局无限制的官员选拔制度，造成的人浮于事的现状，一直都是耿耿于怀的。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苏东坡在翰林学士的高位上，向皇帝呈报了《论冗官札子》的专题报告，提出了通过考试解决冗官问题的具体措施。前面我说过，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苏东坡负责主持省试，对于有关部门推荐的免试人员，极为不满，但是他又无权阻止，虽然他们只上报了五百来人，但是最后张榜中第者，竟然翻了倍，苏东坡也只能仰天长叹，徒唤无奈。

二五 省事而励精

苏东坡吏治之三策，谓之“决壅蔽”。

用现在的通俗语言来说，就是要政令通畅，日事日清，各司其职，阳光行政。

苏东坡渴望的天下治平，最理想的是“天下不诉而无冤，不谒而得其所，此尧舜之盛也”。退

而求其次，也要“不能无诉，诉而必见察；不能无谒，谒而必见省”。

苏东坡认为，做到这样的境界，朝廷与官吏的关系就很亲近了，官府与老百姓的关系就密切了。而当时的现实是，有冤屈要上诉的，比向上天申诉还难，有什么想法要报告的，比给鬼神报告还难。这里面就必然有猫腻，有很多暗箱操作的潜规则。苏东坡就很愤慨，“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芝麻大一点事情，也是要用钱才搁得平的。因为如此，“政令壅遏而不行也。”

他的父亲的遭遇，他一定记得清楚，兄弟二人没有考中进士前，张方平、雷简夫，甚至欧阳修，都向有司上过推荐书，但是都石沉大海杳无音信，以至于老苏在回乡为妻子制丧时，因为欧阳修一而再的力荐，朝廷才两次诏他进京，“试策论于舍人院，仍令本州发遣”。老苏于是很愤然，称病请辞。他上书欧阳修说，不敢以匹夫而要君命，也不敢自求高名而得罪你，但是自从你把我的一系列策论推荐上去，迄今已经七百多天。按照这样的效率，我再回京，再考试，在等待奏请，又不知要折腾几年，到时候，我老都老得不行了，再拿一官半职，又有什么用呢。果然，之后仅七年，老苏就谢世了。

老苏其实是很想有益于朝廷的，却到了半百之后，还是因为借了欧阳修韩琦的器重，才在五十三岁那一年，挂了霸州文安县主簿的名，在欧阳修手下负责编纂礼书的工作。苏东坡所抨击的“凡贿赂先至者，朝请而夕得。徒手而来者，终年而不获。”是否就是从父亲之际遇而起的。

为此，苏东坡主张“省事而励精”，要省事，就要任人，任者，信任也，该谁做的，就放手让谁做，就要各行其职，要充分发挥各部门的作用，不能做了和尚不撞钟，不能和尚做了道士的活，更不能大权独揽，为所欲为，让人做了和尚，却不让和尚撞钟。

当时是，中书和三司两个要害部门，一个是管帽子的，一个是管票子的，却把本该下面的权利都收尽了。中书省不等有关部门报告，就把官员的任免调动决定了，直接行使了专职部门之职；三司把财政收入算到分毫不差，命令各州县照章执行，这其实是剥夺了各路主管的权力。说穿了，这是独断专权，这是对下面的人不信任，这是对下面的部门不信任。这就麻烦了，互不信任，就会互相拆台，互相诋毁，甚至互相打击，这支队伍，也就乌烟瘴气了。

苏东坡希望，励精图治，皇帝要带头。苏东坡说，你皇帝还在操劳国是，高堂里的宰相，自然不敢回家享乐，宰相还在用心工作，其他百官，哪个敢跑出去喝酒打牌唱歌洗脚呢。从皇帝到一般官

员，都勤勤恳恳，都兢兢业业，“则纤悉隐微莫不举也”，由此而壅蔽决也。

这就是上行下效，上面带的什么头，下面就会怎么做。一个部门，一个单位，也是如此。你做一把手的，整天漂漂浮浮，下面肯定会用漂浮来糊弄你；你变着花样中饱私囊，下面肯定要千方百计钻你的空子。甚至，一个家庭，也如此。你做家长的，天天在外面喝酒打牌，要让儿子或者女儿，专心在家读书，那是很难的。

二六 官员任职如同操作机器

苏东坡吏治之四策，谓之“任专使”。

用明明白白的话来说，就是要用人之所长，就是不要频繁调动官员。

不用官员的长处，这个官员在其岗位上，当然就不懂业务，当然就只能被下属任意糊弄，被下属牵着鼻子，东走西走，自己却不辨南北东西。官员好像也无所谓，反正也干不长的，宋朝官员，不管你干得怎么样，三年后，都要被交流轮换。任期短暂，他当然不会“为长远计”，苏东坡希望一个地方的主官，能够干上五、六年或者七、八年，才根据其政绩情况，升迁调动，他用了操作机器的例子，做出形象的说明，官员任职，如同操作机器，他刚刚操作熟练了，还没有发挥其作用，马上就让他去操作另一台新的机器，他当然就操作不好。如此频繁的调动他，他哪里还有心思去用心呢，反正操作熟练了也没有用。

苏东坡说，现在的问题，就是择人不精、用人不专、用人不久。他说，一种情况是，有些想有所作为的官员，很想有一番长远打算，长远作为，因为不能短期见效，朝廷就认为他没有能力，把他换了；再一种情况是，也有因为有能力，刚刚在施行长远计划，马上就被提拔走了，计划也就泡汤了。造成的结果，不管是有能力的，还是没有能力的，在一个地方任职，都干不长，很多事情就有头无尾，甚至无头无尾。苏东坡二次莅杭，拿出了治理三吴水利的长远方案，也上报朝廷批准了，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实施，他就被调动了，方案也就搁浅了。如果苏东坡再多干一年或者半年，三吴水利的治理，就不会黑色幽默到几百年后的明朝来实施。

再看苏东坡的仕途经历，除了在贬谪之地的黄州、惠州和儋州，没有在哪个地方，任职超过了三年的，“五日登州府，千载苏公祠”，你看看，苏东坡在登州，居然仅仅干了五天。苏东坡是个勤勉的人，虽然在登州时间很短，却干了一件让人民一辈子感恩的事情，上奏朝廷废除对该地盐业的垄断，让利于民，所以留下了千载依然的苏公祠。

宋皇帝的心思，说起来很大，为的是赵家的天下，其实很小心眼，而且防范，而且不信任，而且害怕，怕官员们在一个地方呆得久了，要演前朝的藩镇割据。这是问题的要害。你干出名堂了，可能要功高盖主，皇帝当然就害怕了，怕你变了他的天下，所以就频繁的调动你。苏东坡屡被人攻击，有一原因就是名太盛，不仅文名盛，政声也盛。

用人不专，用人不久，官员们为了乌纱帽，当然就只能搞短期效益，做面子活路。这样哄来哄去，当然只能是哄了朝廷，哄了高高在上的皇帝。做短期效益，他总还在做，更多的人，就是在混日子，混满了三年，说不定还要换个好地方，要去干这样那样的事情，费力或者还不讨好。

新法的失败，有一个原因，就是下面哄上面，明明有问题，而且很严重，却不报告，晓得当政者要听顺耳的话，恭维的话，就一味说好，而且夸大，说得当政者飘飘然，以为天下的形势，硬是欣欣向荣莺歌燕舞。

宋朝，拥有那么多世界级别的发明，为什么没有将其转化为生产力，我们好像从中找到了一丝线索。

二七 无责难是要深追究

苏东坡吏治之五策，谓之“无责难”。

“无责难”，不是不追究，不问责，恰恰相反，“无责难者，将有所深究也”。

苏东坡是针对当朝的立法现状而言的，应当是“使人可以过而不可以不及”。

说得通俗易懂，就是立法不能想当然，立法要合乎实际。立法的目的，是要规范社会行为，不能众人都做不到。各级官员，必须模范地遵守纪律，奉公守法，知法犯法、执法犯法者，要严惩不贷。

当时的宋朝立法，与苏东坡推崇的立法恰恰相反，“责人以其所不能，而其所能者不深责也”。结果是“其法不可行，而其事不立”，有法等于无法。苏东坡的意思，用现代汉语来表述，就是要立众人都做得到的法，众人都做得得到，你做官的，却偏偏要有法不依，要知法犯法，要执法犯法，当然就要“深惩而决去之”。

苏东坡还对当时的株连之法令，予以严厉批评。

宋朝的官员，有向朝廷推举官员的义务，但是如果被推举者“他日有败事”，不管是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推举者都要连坐，在苏东坡看来，这对推举者是不公平的，有的人“今日为善，而明日为恶，犹不可保，况于十数年后，其幼者已壮，其壮者已老”，这样还要揪住当时的举荐者，就是冤枉过正了。

人，尤其是官人，地位变了，环境变了，权力观就要变，有的往好的方面变，有的却要以权谋私，这是举荐者控制不了的。这一点，苏东坡说得不够全面，应该从两方面来说，如果你收了人家的钱财或者美色，而举荐他，用现今的话说，就是你做的是带病举荐，你当然要负责任。另一方面，你举荐他的时候，他确实是清正廉洁，确实是勤奋工作的，确实是才干过人的，他后来堕落了，腐败了，再要株连举荐者，那是毫无道理的。

苏东坡主张减轻对举荐者的处罚，而重处考察提拔的失职者。

人家推荐了，但是并没有决定使用和提拔的权力，你负责考察的，才能左右朝廷和皇帝的任免决定。在当时，被推荐者出了事情，考察的人只是“失察”而已，但是“失察”的罪，却轻之又轻。该负重要责任的，却被轻描淡写地放过了，不该负主要责任的，却被浓墨重彩地处罚了。

这是把本和末倒置了。

苏东坡希望对考察者，也就是那些郡、州、县的长官，若在用人上失察，要坚决的予以重罚，督促他们用心督察其属下，这样的话，“贪吏小人无容足之地”。

二八 让天下之才板援而来

苏东坡吏治之六策，谓之“无沮善”。

就是要不拘一格降人才，就是要广开选人任人之路，让一切有才能的人，都能为朝廷效力。

苏东坡的理想是，“设高位重禄以待能者，使天下皆得踊跃自奋，板援而来”，这样的话，即使是民间百姓中，或者小官小吏中，那些有才干的人，就不会被埋没；而那些无才无德者，也没有空子可钻的。苏东坡还主张改革对官员的提拔、使用、考核办法，不能让官员们感到，官位和俸禄，轻而易举就可以捞到手，干与不干，干多与干少，干好与干坏，官还是照样的做，俸禄还是照样的拿，妄图侥幸。

苏东坡毫不留情的批评，当朝以其陈规，阻绝了三种人的上进之路。

一种人是州县之吏。他们一旦犯事了，就被一棍子打死了，因为这种打死政策，让一些官员破罐子破摔，反正都是永世不得翻身，所以就肆意妄行而无所顾忌，苏东坡主张罪要分大小轻重，如果只是一般的罪，尤其是工作中的过错，应该允许他们做好事来自赎，也就是要给他们以改过自新的机会，也就是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人无完人，金无足赤。人非圣贤，孰能无过。面对这些至理名言，有的人嘴巴上说得溜顺，用起来却南辕北辙。

再一种人是地位卑微的“府吏贱吏”，也就是官府中的一般工作人员。他们永远都得不到升迁的

机会，一辈子就只能做一般工作人员，即使再有才干，还是枉然；他们仕途无望，转而开拓财路，贪赃枉法，也就顺理成章了。苏东坡主张打破“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娃儿打洞洞”的老规矩，破除身份论，而对其中的“出群之才”，予以提拔使用。的确，这些人参加科举，确实考不出好成绩，但是他们善于实际工作，善于处理实际问题，而且很可行。苏东坡在杭州上报的三吴水利治理方案，就采纳了基层官员的意见，为了朝廷重视他们，重用他们，苏东坡把他们的方案原稿，全文附在报告后。

第三种人就是拿钱买官做的。朝廷允许买官，却只派他们做郡县之吏，终身得不到升迁的可能，因为如此，他们就会为所欲为，不但要把买官的钱找回来，还要有大大的利润。所以苏东坡主张要给他们当中的能干者上进之路。

“绝之则不用，用之则不绝。”这就是苏东坡的主张，很简单，不给人上进之路，就干脆不用，要用人干事，就要给人上进之路，颇有些用人不疑疑人就不用的思想，也颇有放手使用保护使用的意识。

安石变科举的时候，苏东坡还主张，不能完全用文化考试取仕，他主要是针对选拔武将而言的，他说，南方人崇文，而北方人尚武，如果仅仅用文考，就阻绝了北方人的仕门。他主张选拔任用军队将领，要以考察其作战能力领兵能力为主。

二九 有什么样的人就做出什么样的事

即使用今天的眼光看，苏东坡的吏治之策，治官之道，既是先进的，也是可操作的。在我们五千年的文明历程中，作为世界的文明古国之一，拥有可以改变世界的四大发明，拥有若干世界第一，拥有智慧勤劳的人民，如果历朝历代都能如此治官治吏，我们一定不会在农业文明中作漫长的踟躇徘徊，而早早的迎来工业文明的辉煌。

这是我们至今落后于西方的根本原因。

如果我们不把火药仅仅用来放鞭炮，如果我们不把指南针仅仅用来看风水，如果我们把造纸术不断的更新进步，如果我们把活字印刷术不断的领先世界，如果我们不把那么多世界第一永远就停留在起初的水平，泱泱中华，今天将是什么模样！打开中华屈辱之门的鸦片，流得进来吗？八国联军，敢在中华大地上肆意妄为吗？小小日本，敢在中华大地猖狂八年吗？

有什么样的人，就做出什么样的事情。历史不是英雄创造的，但是英雄在创造历史的过程中，其英雄的作用是不可替代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官吏队伍当是排头兵，吏治的成败，所以关系重大。

苏东坡以史为鉴，针对现实，力图振刷大宋没落的官吏政策，最终的目的，还是想要撕下北宋百年承平的面纱，想要治理日益严峻的经济社会危机，救黎民于水火，挽大宋之颓废，其耿耿忠心，坦荡如砥，其磊落情怀，日月可鉴。

可惜得很，苏东坡的主张，没有被神宗皇帝看中。

而神宗后期，哲宗亲政后，北宋的朝政，已经被小人所把持，所谓革新，已经成为他们捞取个人利益的幌子。

（未完待续）

（眉山电视台副台长）

（上接第72页）

③原文一部分用日文，池泽按照原文翻译。

④小川环树氏在《东坡之散文》（《小川环树著作集》第3卷，1977年筑库书房）里举《苏氏易传》等例子，苏轼的以水为“道之似”的看法。他还介绍有时候苏轼把自己的文学比作“水”的例子。

⑤《四河入海》卷五之一《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未完待续）

（日本中央大学教授）

王世德教授来信

尊敬的《苏轼研究》编辑：

您好！

《苏轼研究》是我最喜爱的杂志，收到后，每期从头到尾细读，很愉快，得到很多教益。等不到杂志，便会思念若渴。

拙作《激情讴歌东坡精神》在《苏轼研究》（2008年第1期）发表，得到苏轼研究学会的很多鼓励。改写后又发表于徐州市苏轼文化研究会《放鹤亭》（2010年第1期）、四川省文史研究馆《文史杂志》（2010年第5期）。现在题目改为《论苏东坡精神》，内容也有大的修改，强调了从新时代高度论东坡精神的特点，重新传送给你们审阅。

衷心祝《苏轼研究》杂志越办越好！

四川大学：王世德

2010年11月4日

从“权发迁”谈到东坡宠妾

郑秉谦

编辑同志：

寄给我的2009年贵刊，全部收到，谢谢！

见其中2009年第1期的《苏东坡谪居黄州时期的家庭人员考》一文，觉得颇有意义。类似文章的发表，说明当代对苏轼的研究，正在逐步深入。作者王琳祥同志在其中《侍妾王朝云》及《侍女采菱、拾翠》两节中，均引东坡致鄂州太守朱寿昌信中数语：“所问菱、翠，至今虚位。（朝）云乃权发迁耳，何足挂齿牙！呵呵。”并且认为：①“‘至今虚位’，意思是（菱、翠）尚未找到夫婿”；②“‘云乃权发迁耳’，意思是自己已正式将王朝云纳为侍妾了”。在后一节中，作者还转引刘崇德《苏词编年考》中对东坡此数语的解释：“当时菱（采菱）、翠（拾翠）位空人去，‘（朝）云乃权发迁耳’，可能有两个意思：一是暂去又回，一是有此意而没有实行。”

王、刘两位同志对此数语的理解，或不准确，或不到位，关键是未弄清什么叫“权发迁”。按：“权发迁”一词，系宋代政治专门名词；东坡此处是戏用。赵匡胤解除藩镇兵权后，大量任命文人为州县长官，其中有不拘铨选常规、资历低而任重者，隔一等资历的叫“权知”，隔两等资历的叫“权发迁”。东坡写此信，乃在元丰三年四、五月之间，此时他刚到黄州贬所两三个月。他说朱太守“所问菱翠”已离他而去，侍妾至今“虚位”，现由18岁的家养小鬟朝云“权发迁”而就此位。朝云是东坡所素钟爱的侍女，所以他接下来既谦称“何足挂齿牙”，又自得地“呵呵”作笑。

而“菱、翠”可能是两个人，更可能只是一人（孔凡礼主此说）。她素来得东坡宠爱，长朝云至少四岁，在东坡长期调教下，琵琶技艺极高。作为北宋高官，东坡未能免俗，一生侍妾想来不少；但

出现在他笔下的，除红颜知己王朝云外，最多的就是这个“胡琴女”了。东坡的《减字花木兰·赠小鬟琵琶》、《采桑子·润州多景楼与孙巨源相遇》以及七古《和蔡景繁海州石室》中，均写到这位“胡琴女”或“琵琶女”（宋时所说的胡琴，即今琵琶）。东坡在致书鄂州太守朱寿昌后三年，元丰六年又致信淮南转运副使蔡承禧（景繁），说：“前某（我）尝携家一游（海州石室）。时家有胡琴婢，就室中作《渡索凉州》，凜然有冰车铁马之声。婢去久矣，因公复起一念。”去了多久呢？在同年的和蔡的七古中说“前年开阁放柳枝”，这“前年”若是提前两年，就无法解释他在前三年就说“所问菱翠，至今虚位”。因此，看来应为泛指“前几年”。按元丰二年，苏轼在“乌台诗案”中下狱，他的家也由湖州任所迁到离汴京很近的南都（今商丘，当时苏辙的任所）；次年他到贬所后，家再由南都迁黄州。看来，苏家“开阁”放伎，应在南都时。而菱翠去了哪儿呢？据东坡此后写的《皂罗特髻·采菱拾翠》，云“待到京寻觅”，则是到帝都去“发展”了。

以后，那个“权发迁”的朝云，就成了东坡的宠妾；而他原来是将她作为王夫人的孩子看待的（《南乡子·有感》中，有“爱被西真唤作儿”一语）。

以上看法，未知对否？请你与王琳祥、刘崇德二同志以及广大读者指正。

此祝
编安！

郑秉谦

2010年4月30日

（浙江省作家协会原副主席、温州大学兼职教授、国家一级作家）

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隆重召开

本刊讯(流水)10月26日至27日,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在古城黄州隆重召开。中国苏轼研究会名誉会长邱俊鹏、曾枣庄,副会长王希龙,秘书长蔡心华,大陆和台湾地区苏学研究学者,美国、英国、俄罗斯、新加坡、加拿大、日本、西班牙、南非等国家的学者等100多人参加了会议。

在26日的开幕式上,黄冈市委书记刘善桥代表东道主致辞,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曾枣庄代表中国苏轼研究学会讲话。会议通过了《黄冈宣言》,这对于进一步推进东坡文化研究和发展,具有积极意义。

27日上午,曾枣庄、惠光启、饶学刚、内山精也(日本)、赵慕媛(新加坡)、陈慧君、涂途、衣若芬(新加坡)、闵凡路、江澄格(台湾)、刘清泉、赵军、李志会13名国内外学者在大会上交流了研究成果。27日下午,分组讨论会每个小组又有10多名学者交流发言。在闭幕式上,由一组召集人刘清泉、二组召集人雷于怀分别小结分组交流

情况,由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会长涂普生作论坛总结报告。此次论坛主要讨论了以下问题:一是关于东坡文化这一文化概念建立的问题;二是关于东坡文化发源地的的问题;三是关于东坡文化研究成果物态化,进而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的问题;四是关于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的问题;五是关于东坡文化在国外、境外影响问题。本次论坛收到来自1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118位学者提交的106篇论文。52篇优秀论文被收录入2010中国·黄冈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文萃《东坡说东坡》,香港科技大学出版社2010年9月第1版。

这次“东坡文化国际论坛”,是全国红色旅游工作协调小组办公室、国家林业局、湖北省人民政府主办,湖北省旅游局、湖北省林业厅、黄冈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承办,光明日报《光明讲坛》、黄冈市东坡文化研究会、黄冈市赤壁管理处协办,主题是“东坡文化产生及其影响,建设中国东坡文化名城的构想。”

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 社科优秀成果丰硕

本刊讯(白水)今年,眉山市三苏文化研究院在三苏文化课题研究方面,成果丰硕。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8年度项目成果专著《东坡文化产业发展概论》今年获四川省第十四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三等奖。四川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十一五”规划2009年度项目“东坡文化符号与文化产业创意研究”上半年顺利结项,鉴定等级为“良好”。11月11日在眉山市第

五次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颁奖大会上,研究成果《苏轼遗址地缔结文化旅游联盟的战略构想》(学术论文)获二等奖、《苏东坡与中国餐饮》(学术论文)获三等奖、《东坡文化概述》(学术论文)获社科联奖。这些成果在学术上具有理论性、实践性、系统性,在社会价值上具有现实性、针对性、操作性,对眉山、对四川、对全国东坡文化产业的发展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创作研讨会召开

本刊讯（流水）为了更好地发掘巴蜀文化名人和展现优秀的历史文化题材，四川决定创作一部反映苏东坡艺术成就和精彩人生的电视连续剧《苏东坡》。11月11~12日，由四川省委宣传部、四川省文联、眉山市委、眉山市人民政府主办的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创作研讨会在成都四川宾馆召开。

四川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四川省文联主席郭永祥，中共眉山市委宣传部长、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副会长周成仕，四川大学文新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

究学会会长张志烈，四川大学古籍研究所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名誉会长曾枣庄，吉林大学文学院教授、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常务理事王洪，湖南省衡阳市地方志办公室离休干部、副编审李时英等23位同志参加了会议。四川省文联党组书记、常务副主席黄启国主持会议，会议着重讨论了《电视连续剧〈苏东坡〉创作方案》中剧本的定位和招标问题。一致认为剧本应定位为：精品、正剧、一生（要有重点）、好看（雅俗共赏）。

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 征文启事

为了纪念苏轼仙逝910周年，常州市人民政府、中国苏轼研究学会将于2011年8月在江苏省常州市共同主办“纪念苏轼仙逝910周年暨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现面向国内外征集研讨会论文。

一、征文范围

全球从事苏学研究的专家学者和苏学研究爱好者。

二、征文内容

这次研讨会的主题为“苏轼和谐理念与实践”，以下研究选题仅供参考：

1. 苏轼的和谐理念与儒释道
2. 《东坡易传》的和谐思想
3. 苏轼变革主张的社会和谐
4. 苏轼从政实践与和谐理念
5. 苏轼作品中和谐思想评析
6. 苏轼的社会人际和谐举隅
7. 苏轼的家庭和睦之道
8. 苏轼的内心调和之道
9. 苏轼的环保意识
10. 苏轼的生态意识
11. 苏轼的人生追求

12. 苏轼的社会取向
13. 苏轼的人生姿态
14. 苏轼的生命观
15. 苏轼文学作品中的生命情怀
16. 苏轼养生的基本理念
17. 儒释道与苏轼养生
18. 音乐与苏轼养生
19. 美食与苏轼养生
20. 茶、酒与苏轼养生

三、征文时间

即日起至2011年5月31日截稿。论文请发《苏学通讯》电子邮箱：CZchenbi@126.com 或者寄至：江苏常州市大观路10号（市文联内）常州市苏东坡研究会王润收，邮政编码：213003。

四、征文说明

论文要求有内容提要50-100字和关键词3-5个。在文稿末注明真实姓名、通讯地址、邮政编码、联系电话、电子邮箱或QQ。优秀论文将收入“论文集”，部分作者将邀请参加本届研讨会。

联系电话：0519-86075567 0519-86683641

全国第十七届苏轼学术研讨会筹备委员会

2010年10月